

斯大林时代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THE STALIN ERA

K 512.5/4

斯大林时代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

石 人 译

裘克安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730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79年·北京



737306

出版说明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在这个时候出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九五六年写的《斯大林时代》中译本作为纪念。

这本书篇幅虽小，却成功地描绘了千军万马的壮阔场面。在斯特朗笔下，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首创精神跃然纸上。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在战后的重建，书中也有出色的生动描绘。

斯特朗没有回避斯大林的某些错误，但是她采取了公正的态度。凭借她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在苏联长期居留及广泛旅行中的亲身观感，她平心静气地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原因。

我们读这本书时必须记住，它是在一九五六年写的。至今，二十三年已经过去了。苏联和世界都起了许多巨大变化。斯特朗在本书结尾部分提出，苏联内部的缺点固然严重，苏联能否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句话不幸而言中。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倒行逆施，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扩张政策。这已经不是

什么缺点问题，而是赤裸裸的社会帝国主义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一八八五年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一九二一年她参加美国公谊会服务队把救济品送往苏联伏尔加河灾区。她在苏联留下来做新闻工作，和一个苏联人结了婚，并创办和编辑了英文的《莫斯科新闻》。一九四九年，她和《莫斯科新闻》的编辑人员一起被捕，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关入监狱。一九五五年，才被释放，驱逐出境。然而她对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斯大林本人的感情并未因此而改变。

斯特朗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也一直抱有深切的同情。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三八、一九四〇年她四次访问中国，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所接触。一九四六年她访问延安，毛主席同她作了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九五八年，她在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决定离开美国，定居北京。直到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她逝世为止，斯特朗一直为在国际上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进行努力的工作。今天我们出版她写的《斯大林时代》中译本，心里是缅怀这位美国友人的。

目 录

出版说明	1
作者前言	1
第一章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4
第二章 五年计划	23
第三章 农业革命	40
第四章 新人	59
第五章 大疯狂	76
第六章 争取和平的斗争失败了	97
第七章 使希特勒止步的条约	109
第八章 全民战争	125
第九章 第二次建设	145
第十章 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	162

作者前言

我想，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将把它叫做“斯大林时代”。千百万人民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他则是工程师。是他首先道出了这样的想法：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从那时起，这一切，包括所有的成就和所有的坏事上面，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总结这一时代还嫌过早，但是总得试一下。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引起了争论，世界各地许多人的信念发生了动摇。赫鲁晓夫所揭露出来的在第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发生的千百件残酷的冤案和粗暴的镇压行为，恰恰使那些最优秀的人们最感不安。他们问道：这是必要的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始终都将是这样的吗？或者这仅仅是由于一个人的邪恶的天性呢？

我相信俄国人是不会问这些问题的。他们的建设已经远远超过了斯大林的时代。他们在分析这一过去的时代，那是为了达到更美好的未来。他们知道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他们也知道：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一些坏事，不论是产生

于必要、错误或者罪恶，都远远不及西方世界在武装干涉和希特勒侵略中蓄意加于他们的祸害，甚至也不及美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他们将弥补他们自己的缺陷，而无需由我们来出主意。

对我的西方朋友们，我得说：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它使一切参加创造这个时代的人都发生了改变。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顾这个时代并且列举出它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的一部分代价。

我们难道能够忘记一九四〇年的欧洲吗？那时法国的军队在希特勒面前十一天就垮了，那时欧洲害怕要有一个新的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我们难道能够忘记那些自称为相对于所有奴隶种族的一个主宰种族的人们对全人类的进攻，能够忘记这一进攻是怎样在斯大林格勒的儿女们面前被粉碎的吗？他们狂热地、浪费地建设着，但是他们建设成了当全世界摇摇欲坠时能够昂然屹立的力量，为此今天全世界都应该感激他们。

还不仅是为了这一点。斯大林时代不仅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足以制止希特勒的力量，它还建设了今天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基地；创造了富余的力量，让亚非前殖民地人民能有自由

在公开市场上选择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说，它建设了许多国家能够赖以获得多样发展、取得自由以及在持久和平中团结起来的基地。这一时代发生的一些坏事有许多原因——由于俄国过去的习惯，由于敌人包围的压力，由于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以及部分地由于那个领导人的性格。它们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民主的、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把带头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让给了一个文盲的、技术落后的国家的农民去做，而这些农民虽然自知对于这样一个任务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却仍然进行了这一建设。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第一章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建成的。根据所有过去的理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或曾被认为是意味着，一种更富足的生活，建立在充裕的财富的基础上，有着日益扩大的自由和日益提高的文化。人们曾预期它将在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了生产结构但不能很好地分配剩余产品的时候到来。它意味着拥有熟练技术的工人看到资本主义的缺陷，而且意识到自己具有使全社会富裕的集体力量。他们将取得政权，把生产机器国有化，并利用它来创造共同的财富。关于接管政权需要用多少“强力和暴力”，曾经有过争论。

沙皇俄国并没有现代的生产机器，也没有充裕的财富。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垮台时，那里既没有多少工业品，也很少粮食。同时，也没有熟练工人；农民还过着中世纪的生活。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这并非由于人民广泛要求社会主义，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是表达了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要求的唯一有纪律的组织。那时整个国家处在混乱中——农民夺

取贵族的土地；工人由于工厂缺乏原料停了工而挨饿；前线士兵开小差。这些工人和士兵选举了苏维埃——代表会议——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列宁说这些苏维埃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是当时布尔什维克据以取得政权的口号。

接管政权是简单的。士兵和工人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和政府机关，并攻下了冬宫。当时已经召开的全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宣布它本身成为政府。它迅速地通过了三项法令：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国家权力法令。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提出谈判和平的建议。土地法令宣布一切土地归为国有，劳动农民对它有使用权。国家权力法令规定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国各地发出电报宣布地方苏维埃的选举。各地农民苏维埃举行了代表大会，并参加了新政府。这个政府自称为苏维埃共和国。

取得政权是容易的；这在一天内就完成了。保持政权就比较困难了；这经过了许多年的斗争。被剥夺的贵族和前政府高级官员在外国帮助下组织了军队。德皇夺取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派军队到芬兰帮助曼纳海姆男爵建立了一个反动政权，并派兵到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去抢粮食、煤、铁和石油。英、法、日、美派兵到北冰洋各港，从海参崴进入西伯利亚，并进入高加索和中亚细亚。武装干涉一直延续到一九二〇——二一年。当武装

干涉最后结束时，芬兰、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都已作为单独的国家分离了出去。比萨拉比亚已被罗马尼亚所吞并。俄国余下的地方则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所统治。

这个俄国已经破产了，没有粮食，没有原料，也没有机器。农民的牲畜被宰杀了，农具在七年战争期间已用坏了。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两个饥荒的年头夺去了成百万的生命。我在一九二一年访问过的那一度曾是肥沃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乡村，即使当时有学校，也没有一个农民的儿童能够上学。农家儿童既没有鞋子也没有衣服；他们穿得单薄褴褛，整个冬天蹣跚在炉灶顶上，出不了门。为了刺激经济的恢复，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容许各种各样的生产——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甚至资本主义的。国家保留了矿山、铁路和重工业——这些都已破坏得很惨——而在小工厂、商店和农庄中私有制继续存在着。

生活复苏了，但是列宁的生命终止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他逝世时，生活水平甚至仍然远低于战前沙皇统治下那种贫乏的状况。工农业都还没有从七年战争的灾难性减产中恢复过来。虽然执政党在倡导社会主义，国家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工业是国有的，并且正在依靠工人的自我牺牲修复着。工人们只领很少的工资，开始甚至除了食物以外不领工资，而且还利用假日来制造机车、电车和其他公共福利的设备。列宁正确地指靠了工

人对公共财产的热爱。但是很多工商业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特别是农业还在小私有者手中，其中最有势力的是叫作富农的小资本家，他们靠了剥削旁的农民和欺骗国家而获利致富。列宁本人曾说过：只要这种情况还存在一天，就只有为资本主义服务而没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济基础。

然而人民跟从列宁看到了一个远景：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成为世界上最进步、最繁荣的国家。人人都知道道路是漫长的，但是他们认为俄国并不需要单独去完成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人们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疲惫和俄国的范例将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引起革命。他们以为，有了远较俄国工人阶级教育和技术水平更高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帮助，欧洲的新的社会形式将会建立起来。不止一次地，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三年，这个革命看来在德国一触即发了。因而当列宁在世时，关于在没有先进国家的帮助下俄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并没有作为实际政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当这个问题后来在一九二四年开始的讨论中被提出来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是约瑟夫·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八月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仅仅几个月之前，他还说过恰恰相反的话。他曾说：“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的一

个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①然而，在八月里，在同托洛茨基争论时，斯大林却说即使没有任何外国工人阶级的援助，苏维埃政府也能够开发俄国并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它将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看来斯大林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前后不一致，并且大概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公式后来所获得的重要性。前后一致对他来说并不需要，因为那时他并不被人看成是一个首要的理论家。他的才能是在组织方面。那时他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在这一岗位上，即使他并未接触到全体工人和农民，他至少经常听到国内人民最强烈的要求。

因此斯大林所提出的，虽然还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却表达了人民对于建设自己国家的日益强烈的要求，以及他们对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日益增长的信心。十月革命后七年以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树立了管理国家的自信心。那种认为他们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应该寄托在革命迟迟不发的欧洲工人身上的想法，已经开始使他们感到不愉快。因而当斯大林宣布俄国人能够自立，能够建成他们所选择的任何经济制度时，这就使革命取得了一个继续前进的目标，而且能够鼓舞人们进行爱国的努力。当时公认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季诺维也

① 一九二四年四月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初版（引文见人民出版社《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六〇页——译者）。

夫和加米涅夫简直没有认识到，一个新的有力的论点已被提出。当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请求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这一论点时，他毫不费事地就得到了批准。几个月之后，那两位理论家才省悟到这一新论点的意义，并批评它以“民族共产主义”代替了正统观点。后来，托洛茨基也参加进来攻击这一理论。

斯大林就这样几乎是不经意地形成了俄罗斯人民据以生活了二十五年的论点，而他并不是一个俄罗斯人。他是格鲁吉亚人，属于被俄罗斯帝国主义所征服的南方民族之一。他的父亲是鞋匠，生来就是农奴。斯大林不同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出身于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被压迫阶级。九岁时他进了一家不久前才向出身微贱的儿童开放的教会小学。教师发现他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有一点自以为是，并富于好胜心”。校长和一位当地的神父为年轻的约瑟夫在梯弗里斯的正教中学获得一笔奖学金，那个中学是专为使优秀的格鲁吉亚青年俄罗斯化而设立的。他在一八九四年快满十五岁时入学，发现学校里存在着专横的校规，教员监视学生的私生活，连世俗书籍都不准读。年轻的约瑟夫在三年级时由于被发现阅读雨果的著作而被罚过禁闭。不久之后，他就读起更加犯禁的书籍来。在一本马克思的著作中，他读到了：“哲学家只是解释了世界，我们的任务在于改造世界。”他参加了一个秘密的社会主义团体，协助组织过铁路工人，随后在一八九九年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许多年后，斯大林说：“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由于我的社会地位……也由于在正教中学中无情地压制着我的那种严酷的戒律。”

这个格鲁吉亚青年成了一个工人组织者，他使用许多不同的名字，过着危险的生活。“斯大林”——钢铁的人——是同伴们给他取的并被保留住了的一个名字。他一读到列宁的著作马上就接受了列宁的观点，此后一直坚定地支持列宁。他时常被捕，并有四次被流放到北极圈内一些地点，但每次他都逃掉了。第五次是在一九一三年，这次他被送到亚洲最北部，叶尼塞河流入北冰洋的地方；从那里他无法逃出，直到十月革命把他解放了出来。在流放中他学习并从事写作，特别是分析民族问题。这是他作为俄罗斯统治下的格鲁吉亚人所面临过的问题。他关于民族问题的著述在布尔什维克伙伴中出了名；当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权之后，就任命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负责处理新国家中的非俄罗斯民族的问题。

一九二二年，斯大林就任共产党总书记，这一重要岗位所能起的作用只是由他发挥之后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选择他来担任这一职务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在沙皇统治时期都生活在欧洲的外国，并且在那些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发展成为作家和演说家。斯大林则在沙皇俄国从事地下的组织工作。他所使用的武器不是语言文字，而是紧密的有组织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

人们的生命掌握在自己同志的手里。

作为总书记和党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成为制定政策的五个人之一，这五个人是：列宁、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列宁是公认的领袖，加米涅夫是他在好几项工作中的副手。托洛茨基负责指挥内战，布哈林负责报刊和宣传。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这些领导人似乎谁也不羡慕斯大林所担负的烦琐的日常组织工作，这项工作最初很少带来声誉。他们似乎也没有感觉出斯大林逐步建立起党对国家的控制以及他个人对党组织的控制的这种变化。甚至斯大林也不象是事先把这一切计划好了的。然而，由于受权掌握党的机构，他就逐步建立了党的权力，同时也建立了他个人的权力。

过去二十年中曾出现过许多书，例如伊萨克·德意彻的论著，试图详细地描述斯大林在列宁领导时期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在后来孤立和击败自己的竞争者所采取的政治手段。然而，我只指出少数几件预示了斯大林以后工作的权力和限度的事。一九二二年，他被指派草拟宪法，通过这部宪法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列宁看到并同意了的原草案中，中央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国防、外交、对外贸易、铁路和交通。包括政治警察在内的治安工作是放在地方政府权限之下的。在那一年的年尾，斯大林派到格鲁吉亚去的人同强大的反对派进行了斗争，并且运用政治警察把反对者监禁起来。同年十

二月所通过的宪法的定稿中给了莫斯科一支中央集权的政治警察，并在各个共和国内设立分支。

因此斯大林应对政治警察的中央集权负责。他对待格鲁吉亚反对派的残酷无情导致了他和列宁之间的唯一的冲突。这事发生在列宁去世前不久。

列宁的著名的“遗嘱”必须同他在病中听到在格鲁吉亚的残暴行为的消息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列宁曾三次发病。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末，这次他康复到能够恢复工作的程度并同意了宪法的第一个草案。在秋末，他第二次发病，但是在十二月里有所恢复，能够口述指示给他的秘书。由于感到死亡在即，他口授了关于“不久将来发生分裂”的危险性的备忘录，其中提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位最干练的领导人”是主要的竞争者。这个备忘录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甚于对斯大林的批评，它并没有指责他们两人抱有恶意，也没有提出什么忠告。几天以后，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就是在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的那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胜利地使他起草的宪法获得生效的同一天，列宁口授了一些记录，指出斯大林应对在格鲁吉亚的过火行为“负政治责任”。六天以后，一月四日，他在对遗嘱的补充中使用了比前此所写的一切都更强烈的辞句：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则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代表大会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并另外指定

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要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并且更关心同志。”^①

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就这样在两个星期中加重了，可能是由于他从参加制宪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那里听到的消息。列宁没有公开这个备忘录，只有他的妻子和他的秘书知道它。因为列宁的健康好转了，他开始亲自处理事务。他派加米涅夫到格鲁吉亚去进行调查；他告诉格鲁吉亚“反对派”他将亲自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他们的控告。正在采取这些行动的过程中，他在三月八日第三次发了病，这次病使他脱离了政治活动，虽然死亡在将近一年之中并未到来。当一九二三年四月党代表大会召开时，他未能出席大会向斯大林提出非难。托洛茨基也没有攻击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已表现出和解的精神，他在许多问题上让了步。

在那次大会上有两件事显示了斯大林的力量和做法。他在代表书记处作报告时，说明党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控制地位。共产党员的比例在地方工会干部中已从百分之二十七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七，在合作社管理人员中已从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在军官中

① 见人民出版社《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二辑第三三——三四二页。（按上面所引一段的第二句“我建议……担任总书记”下面在原文中还有这样几个字：“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译者）

从百分之十六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四。一切组织都逐渐处于党的控制之下。第二件事是斯大林对于一个要求在党内有更多讨论自由的批评者的回答。斯大林说：“党不是辩论会”。他说：俄国正处在“帝国主义豺狼的包围之中，而在两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中讨论一切重要问题，就会把我们手中的牌都摊在敌人面前”。这次大会斯大林在每一点上都取得了胜利。大会以后，当罢工爆发或者秘密组织被发现的时候，持不同政见者就遭到政治警察的逮捕。

这样，甚至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已经发展了这样一个党的机器，它不仅在取得对政府的控制，并且在取得对所有群众组织的控制，它把本身的权力同革命和国家的利益等同了起来。同时，通过宪法，他也建立起了一支权力十分集中的政治警察，并且表明每当自由讨论和他关于国家安全的概念之间发生冲突时，他总是选择安全，先于自由。

当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时，斯大林主持丧礼，他在执绋者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他还不顾列宁的未亡人和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抗议，把列宁墓安置在红场上。在这一点上，他违背了列宁的谦虚和简朴的原则，可是他比任何欧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更懂得，大部分仍旧是农民的俄国人民会被一个圣所和“有着永不败坏的肉体的圣人”所感动。后来千百万的老百姓走过这座陵墓并从参谒列宁而“获得力量”这件事，证明了这

一点。

尽管有着列宁的“遗嘱”，斯大林却有许多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和当然的继承者。他已经是一个有二十年党龄的布尔什维克，作为列宁时期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已有十年，并曾在六个暴风雨般的革命年头中直接在列宁手下工作。他可以很容易地把那次最后的冲突看成是由于列宁生病而产生的误会，而如果列宁康复了的话，这是可以弄清楚的。所有其他的领导人都曾有过更严重的冲突。托洛茨基反对了列宁许多年，只是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才和他联合起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武装起义的时刻曾经是叛徒，他们反对起义并在反对派的报纸上透露了起义的详细计划。列宁都原谅了他们。同这些人对列宁所负的罪过比较起来，斯大林的罪过在他自己看来很可以算是微不足道的。

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当列宁的遗嘱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宣读，并要决定是否把遗嘱向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公开时，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建立的联盟拯救了他。这两位老布尔什维克都害怕托洛茨基，担心他可能成为“拿破仑”；他们把斯大林看成一个比较谦逊而无需害怕的人。斯大林谦虚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列宁的继承者只能是一个委员会，而不是任何个人。因此季诺维也夫谈到最近几个月中的“和谐的合作”并且“很高兴地说，列宁的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他提议不把遗嘱公布，而只秘密地告知一些经过选择的代

表。这个提议以四十票对十票获得通过。对斯大林的权力增长的最后一个威胁就这样过去了。

这以后的几年中，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权力。在一系列关键性的决策中，他逐个击败了他的敌手——托洛茨基，然后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后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最后并把他们从政治局赶了出去。每一个反对者都斥责过斯大林的“专制”，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同时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然而，随着每一个反对者的失败，提出不同政见的权利愈来愈受到了排斥。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宣称：“附和反对派是……和党籍不相容的。”在每一次胜利之后，斯大林都向被击败的反对者伸出手去，如果他们“悔过”，就把他们接纳回来。当托洛茨基表明决不退让时，斯大林建议把他从俄国驱逐出去。这件事照办了。反对“党的路线”就这样成为一种罪行。不过各种不同的“反对派”的大部分成员都“悔过”了，都恢复了地位，并在斯大林分配给他们的职位上工作。

以上关于手腕运用的概括历史只谈到一些表面现象。这样的手腕在国家和工会的政治斗争中都是常见的。斯大林是善于运用手腕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他的上升和他的伟大工作。我认为，他的上升是由于他具有两个一切领导人都具有的特点，和另一个只有最伟大的领导人才具有的特点。他对于那种我只能称之为“人民的意志”的东西有深刻的感觉。他有把这种意志转化为

行动的无比的技巧。最后，他坚决相信他的行动能把人类带向更美好的将来，并且善于使旁人感染上这个信心。

我所说的“人民的意志”是比我们美国人在十一月进行大选时所行使的选择权远为强烈的东西。我珍视我的一票；我可能愿意为保卫它所代表的某些权利而死去，但是我不愿为了共和党候选人和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差别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两党之间我可以作“我的选择”，可是我不会把它称作“我的意志”。然而也存在人们甘愿为之而死的某些目的，特别是在紧急的时刻。这些目的是和集体的需要、国家的利益、或者和为孩子们争取的更美好的将来相一致的。这样的目的才配称为“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愿意为它们而斗争，为它们而死，为它们而遭受冤屈。

在俄国当沙皇统治垮台时，“和平、土地和面包”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列宁表达了这个目的，就成了当时的权威。在二十年代中期的俄国，对于一个拥有富饶的但是疮痍满目的国土的人民，看不到能够从其他国家得到任何帮助但是意识到自己的集体财富的人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斯大林表达了这个目的，毫不在意地推翻了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他不是从理论中，而是从人民的意志中挖掘出这个目标，并且当人民团结到四周来的时候，他感到他的理论和信心都增强了。这就是那粉碎反对派的东西——不仅是手腕的巧妙，而是他比旁人更能亲切地觉察并表达人民的意志。他更贴

近人民的意志，首先是由于他的社会出身，由于他是被压迫民族中被压迫阶级的儿子。他贴近人民的意志，还由于当其他领导人从国外向国内写信的时候，他却多年从事着地下斗争。最后，他贴近人民的意志，还由于他担任了党的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每天都倾听着国内最强烈的愿望和不满。

他待人是谦虚的、直爽的、朴实的；他对问题的分析异常明确。他判断集体意见的技巧是从早年就学会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告诉过我：“我清楚地记得，他是一个安静的年轻人，坐在委员会会议室的边上，说得少，听得多。会议快要结束时，他提出一点看法，或者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逐渐看出来，他把我们共同的思想总结得最好。”这段描写是任何曾和斯大林一起参加过讨论会的人都会承认的。这说明他是怎样保持他的多数的，因为他首先估量了多数人的意见，然后才制定路线。因此，他的头脑并不是一个相信一道命令可以违背多数人的意志而付诸实施的专制者的头脑。但也不是一个等待投票结果并且把它看成最后决定的被动的民主主义者的头脑。斯大林知道多数人的支持对于健全的政治行动是必要的；同时他也知道多数是怎样形成的。他首先试探一群人的想法，然后用他自己的话把决定推向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最大的极限。

对于全国人民他也使用同样的方法。斯大林和俄国人民都不知道西方在选举中运用的方法；当他知道了这

些方法的时候，它们也没有给他很深的印象。然而在我认识他的整个时期中，他经常注意并且仔细考虑一切推动人们去行动的愿望。各种在生产中有成就的人——打破了挤牛奶记录的挤奶姑娘，或者是分裂了原子的科学家——都会被邀去和斯大林谈谈生产，并且告诉他是怎样和为什么达到这些成就的。正如美国政治家们所说的：“他把耳朵贴在地上”。俄国的农民们说得很诗意，他们说：“甚至草的生长他都听见”。斯大林自己是这样来谈他的领导方法的：“不能落在运动的后面，因为要是那样就会陷于孤立……可是也不能跑在前面太远，因为这就会失去与群众的联系。”这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目标，而且他的努力经常是成功的。

一个领导人不但必须觉察到人民的意志，而且应当把它转化为行动。不论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身上，意志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可能被遏制而变成失望，也可能被鼓舞而去完成伟大的业绩。斯大林唤醒和解放人们意志的能力达到了天才的高度。我在这方面有过亲身的经验。

我创办了英文的《莫斯科新闻》，后来和它的俄国编辑发生了恼人的纠纷，以致我想要辞职，甚至在失望之余想要离开苏联了。经一个朋友劝告，我向斯大林提出了申诉。他的办公室打电话来，要我“到这里来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谈这个问题”。这说得很随便，因此当我发现自己同斯大林、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以及我所控诉的那

些人坐在一张桌前时，我简直吓呆了。小型的政治局，全苏联的指导委员会，在处理我的申诉呢。我真感到羞愧了。

斯大林先问我是否听得懂用俄语进行的讨论，从而消除了我的紧张。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大家去发言。他自己比别人都说得少，他甚至没有坐在桌子头上当主席，而是随便地坐在一旁，能够看见所有人面孔的地方。起初，我感到失望，因为他是那样的没有威仪，但在迅速进行的谈话中我就把这一点忘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斯大林正是用偶然插一句话，提一个问题，或者着重地重复别人的话，来引导讨论的进行并使它不离开主题。当他把所有的看法都汲引出来的时候，我开始对甚至那些我所控诉的人都产生了了解。我曾想我要辞职并一走了事。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可是当斯大林重复问道：“这就是全部吗？你在其他方面很满意吗？”我内心潜在的愿望苏醒了，我发现我所真正要求的乃是一张更大、更好的报纸，而有了已经达到的新的了解，这件事现在看来已是可能的了。我说出了这一点，而这正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东西。

从那时起，我就把斯大林看作我所遇到过的最善于主持会议的人，他能够以达到天才程度的速度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引向和谐，并且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间指出正确的道路，从而唤醒和鼓舞要求行动的愿望。我想，这就是五年计划的最初年代中他给予别人的印象吧。当他后

来离开了这种方法，他也就背弃了他自己的理论，抛弃了那最初使他上升的方法。

不管他后来的实际行动如何，斯大林曾经经典地说明了不受集体思想控制的个人决定的危险性。当埃米尔·路德维希，以及后来罗埃·霍华德要求知道“这位伟大的人物怎样作出决定”时，斯大林不耐烦地回答说：“在我们这里，个人不能作决定……经验已经向我们证明：没有经过旁人修改的个人的决定，错误的百分比是很大的。”他接着说，苏联取得胜利，是由于一切领域——科学、工业、农业、国际事务——中最好的智囊在中央委员会中集合起来了，而决定就是通过中央委员会作出的。

他比任何人更多地把这个标准灌输到苏维埃人民中去，因为他总是“通过组织途径”并且在建立起多数之后才行动的。如果他也通过中央集权的政治警察采取行动去镇压反对者的话，这种在西方看来好象是自相矛盾的两重性，对于二十年代末的俄国思想却并不是陌生的。这是一种他们所熟悉的警察，首先是在沙皇统治之下，后来是在列宁领导之下。因为尽管列宁是那样民主，他却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契卡——来不按正常法律程序地对付反革命分子。如果斯大林把一切“反对者”都划归反革命从而扩大了保安工作的职权，只有那些比较西方化了的布尔什维克才提出反对意见。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是处在全世界敌人的包围之下。

我住在苏联的所有那些年月里，从来没有听苏联人谈到过“斯大林的决定”或者“斯大林的命令”，而总是谈到集体作出的“政府的命令”或者“党的路线”。当谈到斯大林时，他们称颂他的“明确”，他的“分析”。他们说：“他不是个人在想。”他们意思是说，他不是独自一个人去想，而是同科学院的智囊团、企业和工会的负责人一起商量而思想的。即使到了后来，当人们过度地把他神化了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把他称为“伟大的统治者”，而是把他称为“伟大的导师”，分析道路的领导人。这就把他同历史上的专制者区别开了，虽然他也有许多专制的行为。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用这种商量的办法，凭着斯大林所唤醒和加以组织的千百万人的愿望和智慧，通过一系列的五年计划而实现的。

第二章 五年计划

苏联以外的世界在最初听到五年计划时，把它看作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我们这些曾经在苏联的边远地区旅行过的人，看到它在村庄、工厂、城市和各州中逐步成形。我们看到它产生于雇农对谋生的要求，产生于失业青年对创造的渴望，产生于公共财产的主人翁对享受自己的财富的愿望，这种财富包括着广大的未被探测、未被开发的草原和山脉的资源。然后，我们又看到千百万人的热情被当地共产党人的头脑和国家计划委员会锤炼成为一个使国家工业化和使它不依赖外国的计划。

我第一次听说五年计划是在苏维埃中亚细亚，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塔什干的报纸刊出一条宽达七栏的标题：“过五年你将认不出中亚细亚了”。跟着是一幅占半版的这一地区的地图，上面布满了新的工程、铁路和工厂的标记，每一处都标明了计划开工和建成的日期。这是中亚细亚各机构的联合计划，它还有待综合到莫斯科的中央计划里面去。

第二年我再一次访问了中亚细亚，骑马到帕米尔去。帕米尔就是那块处在俄国、印度和中国中间，被称为“世

界屋脊”的荒野的高原。在火车所不达的小路上走了几天之后，我和一个乌兹别克修路工人聊起天来。他会三个俄文字：“公路”、“汽车”和“五年计划”。用这些字和许多表现自豪的手势，他告诉我这条走骆驼的小路将要变成一条汽车大道，一直通到边界上，而在当时骑马到边界要走十天。五年计划将会做到这一点。

又一年后，为了给新创办的《莫斯科新闻》写稿，我在一九三〇年五一节去参加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车典礼。铁路当局在旗帜上和报纸上宣布它是“五年计划落成的第一个巨大工程”。一千英里的铁轨已在荒无人烟的平原和沙漠中铺成了一条南北线路。我的老朋友毕尔·沙托夫是工程负责人。他曾是在美国的上百次争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老战士，同时也是俄国内战中的老战士。他们在创记录的时间内完成了建设，比“计划”中预计的时间快了一年半。因此，他们遇到了财政危机；他们必须付给工人完工的工资，而在政府的预算中却只拨了下一年的款项。沙托夫急催着莫斯科，从各方面去讨钱，嚷着：“难道为了等待预算追上来，我该把胜利的工人们解雇吗？”

所有这些都已是过去的事了。四列专车将开来参加通车典礼。我们的一列载着上百个工厂中选出来的代表，因为工作优秀而获得这次旅行的机会作为奖励的“选手”。苏联记者从几十个城市赶来；从世界各地来的外国记者挤满了两个车厢。我们都知道这一条铁路改变了亚

洲的历史，把西伯利亚的小麦和木材同中亚细亚的棉花联系起来，使苏联贸易达到了中国西部的边缘，并且用一条细的钢铁国防线把苏联的东南边疆连结了起来。

我们的列车不按任何时间表开行，因为我们坐的是第一次列车。一节节车厢由一台漆成绿色的披着节日盛装的机车拖着，象酒醉了似地在新铺的路轨上摇晃着前进。这台机车是奥利·阿塔机车修理厂的礼物，是志愿工作者在工余时间义务修理出来的。机车上象吐着火焰似地满飘着红旗。一个由志愿修理工人中推选出来的机车组日日夜夜地在“他们的机车”上工作。土西铁路的通车也是他们的胜利。

新的市镇已经开始在沿线生长起来，这是一些拓荒者的简陋的住宅。沙托夫在每一个车站的集会上对拓荒者讲话。他追述了他们的斗争的细节，在沙漠中的饥渴和冬季漫天蔽日的大风雪，而官僚主义者却供应不上暖和的衣服。他提到“还在母亲的怀抱中，然而却比这个市镇年纪大”的婴孩。他谈到他们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新世界，一个为了全世界的工人的更美好的世界。我听见一个瘦削的妇女眼中含着泪喃喃地说：“我们的负责人真是个好汉子！”

在铁路的接轨点，在烈日下进行着一个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的狂欢节。游牧的哈萨克人从几百英里外骑着马来迎接伟大的“铁马”。根据它的商标“俄·马里昂”而被称作“马里昂”的巨型起重机把一对对的人吊起来在空

中兜风，每次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哈萨克人。年轻小伙子在铁轨上跳舞，唱着关于那“比一百匹马都快的黑骏马”的新歌子。这匹骏马的到来带来了工作和学校，并且把这些小伙子从部落的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但是当时部落的酋长们还掌握着权力。当青年要想自己保留因工作优秀而得到的奖品时，同部落的人却把他们摔在地上，并把奖品拿去给酋长们。这是部落的风俗，然而现在终于遇到新的铁路的挑战了。

在一万个从各处来到这片荒野的人的注视下，南北两个铺轨队铺设了最后一根铁轨。打下最后一根道钉的是俄罗斯和哈萨克的高级官员、代表建设者的沙托夫和代表共产国际的七十高龄的日本共产党领袖片山潜。片山潜在连接铁轨的道钉上的一击，意义是很明显的。这条铁路的意义不限于把小麦和棉花联系起来，不限于为拓荒者开辟新的土地，也不限于是年轻牧民反对部落压迫者的武器。这条铁路意味着世界革命穿过亚洲继续前进。

沿路工人认识到这条铁路的巨大的重要性，都问我们车上的人谁来主持通车典礼。不是斯大林吗？不是加里宁吗？不是吗？当他们知道了从莫斯科来回是两个星期的路程，并且在整个国土上到处都是尚未完成而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工程时，他们就满足于较次要的人物了。远在西方，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正在第聂伯河上赶着完成。远在北方，新的钢铁城库兹巴斯正在斗争中诞生。在斯

大林格勒，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厂即将开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世界上最大的重型机器制造厂正在修建。

土西铁路自夸为“第一个完成的巨大工程”。然而它只不过是轰轰烈烈的五年计划所培育的数十个巨大工程之一。

* * *

根据合同前来协助执行五年计划的美国工程师们喜欢说，这根本算不上一个“计划”。从技术上来说，他们是对的。五年计划从来也不是一个必须严格遵照行事的蓝图——它是一个需要予以应战并且超额完成的挑战书。它不仅是由莫斯科制定的，而且是由莫斯科和这个国土上最遥远的地方同时制定的。在工厂和农村里，人们讨论了他们要什么，他们能够造什么和为了造它又需要些什么；他们的地区性的计划经过一定的途径到达了“中央”，被协调之后再送回来由地方上通过。

在整个国土上，从列宁格勒到海参崴，响起了建设的强大声响。一九三一年我曾为《莫斯科新闻》去采访这些工程。二十年后，当我在莫斯科被捕时，警察没收了我在这些采访旅行中所写的所有的笔记本，作为“间谍活动”的证据。这些五年计划的巨大工程突然变成了军事秘密。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他们却曾把这些巨大工程向任何愿意去看的人炫耀。

在一九三一年有些人说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是

一个失败；另一些人又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两种说法都不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在当时还既不是失败，也不是成功。它是一场战争，为了苏联的第一条传送带而进行的战争。在美国，传送带经过一个世代才成长起来。在这里，它是通过战斗很快就赢得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耗费了生命和青春。在炎热的夏天，健壮的男子晕倒在熔铁炉旁。季夫柯维奇、柯维特和宁楚克这三个美国人连续工作了六十个小时不睡觉去修理那使“装配线”陷于停顿的第七号机器。他们达到胜利时，已经是摇摇幌幌有气无力了；他们受到了欢呼，得到了奖章。那不是工作。那是战争。

强壮的汉子忍泪看到自己的车间上挂起了“骆驼”——笑着的骆驼是给落后车间挂上的标志。那些已经尽了自己最大力量的人们因为自己的车间没有尽到它最大的力量而暗泣，然后回去使车间再多做一点活。仅仅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组织。他们刚征服了一个细节，另一个细节又出现来阻碍他们。在同一个时候有上千的细节需要集中注意。这在俄国是从未做过的事。

这个工厂在城北离城二十分钟路程的地方，由一条极坏的路联系着。这条路是工厂的一部分；它损坏机器。一条新的输水管已经铺设了，因为在依靠市内的给水系统时，他们在炎热的七月中曾经断过水。一年之后，他们还在修建新的仓库。因为缺乏合理的仓库安排，没有人

知道到底厂里有哪些零件。装配线会因缺少某一种零件而停顿；然而可能有成百的这种零件在一个月以前被存在什么地方了。这就很明显，斯大林为什么要强调：“制度、核算和责任制”了。

每一个车间都有它的“生产会议”。在机器车间里他们讨论“质量”问题和“缺乏小型工具”问题。一个工人说：“零件乱摆在风砂里，然后带着脏东西装入马达；零件应当先在煤油里洗刷一下。”另一个工人要求注意调整不恰当的检查时间；冷却器应当在安装到拖拉机上以前进行检查，避免以后白花劳动再把它们取下来。

所有的人都称赞《真理报》的一位记者，他查出了一个使六十部马达报废的错误。他并没有技术知识，可是他发现装配线因缺乏马达而中断了。他查到了六十部有“缺陷”的马达，发现这些马达的同一个部件都是坏的，并且一直追究到制造这种部件的车间。他了解到出问题的原因是一件切削工具有着很大的缺口，而一个新工人却认为这没有关系，一个粗心大意的工程师没有注意这件事。“你，你，你已经使六十架拖拉机不能出厂了！”他指责这位工程师说。工具改装之后，部件就合格地运到了。这不过是该做的万事当中的一件而已。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谈到象破坏之类的更险恶的困难，这种困难也打乱生产的组织。

万事都能在同一时间正确地完成吗？是的，生产曲线有时上升，有时下降，但是大体上趋势是上升的。工厂

的主人们曾有两次团结在一个战斗口号下，不计代价地进行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第一次，他们为了迎接一九三〇年六月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争取工厂提前开工，这是不顾困难而进行得难以置信地迅速的工作。第二次，他们争取在第一年年底制成第五千架拖拉机。这两件事，许多上层职员和几乎所有的美国专家们都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工人的意志，特别是共青团员的意志，使这两件事都胜利地完成了。

工厂的党组织书记特里古宾柯在接见我时躺在病床上，一面还用电话处理着工作，他说，“我们有着他们所不知道的力量可以动员”。他强调计件工作、制度，以及各部门之间的严格核算——列宁所要求的，也是斯大林所要求的，“制度、核算和责任制”对于一个尚未机械化的国家来说，是最难学习，同时又是最必要的。

到处都有迹象说明他们是在进行学习：在修理从城市到工厂的道路的时候；在工厂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头几批学生身上；在新开设的一天可供一万一千客饭的“工厂厨房”中；在美国专家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善中；甚至在设立小卖部供应苏打水和冷啤酒，使那些又热又渴的工人不致再象前一年那样去喝伏尔加河水而患伤寒病这件事上。

在我八月访问后四个月，工厂已经达到稳定地日产一百一十架拖拉机了。它“达到了计划指标”。争取苏联第一部传送带的战争算是打赢了。十二年以后，斯大林

格勒拖拉机工厂的工人驾着自己的坦克把希特勒的军队从工厂的炸毁的场院里赶了出去。

* * *

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每一个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美国人——都说，这厂比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改进有多么大呀！这样说是真实的，但是这不公平。斯大林格勒厂开辟了道路，它的痛苦对所有后来的人都有帮助。

美国专家拉斯金带我参观了工厂。在斯大林格勒，翻砂厂是个落后的车间，挂着“骆驼”牌子；在哈尔科夫，翻砂厂有二十多种改进。斯大林格勒厂有漂亮的机器，这些机器直接来自美国，但是没有经验的农民把它们毁坏了一半。哈尔科夫的工人们懂得多一点；他们向斯大林格勒学到了东西。所有部门，象运输、仓库、福利等等都从经验中得到了益处，在哈尔科夫做得更好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进是迫于竞争才采取的，在苏联改进已经是自由交换的了。哈尔科夫从斯大林格勒接受了整整一年的经验。

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有一个特殊问题。它是“在计划外”建立的。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比预料的要快；他们对拖拉机的需求不能够得到满足。自豪的乌克兰城哈尔科夫“在五年计划之外”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美国人不能够设想这里的困难。所有的钢、砖、水泥、劳动力都已经按照五年计划分配掉了。哈尔科夫只能靠说服某些钢厂进行

“超计划”的生产来得到钢。为了补足非熟练工人的缺乏，成千上万的人——机关工作者、学生、教授——在假日来参加义务劳动。由于当时采取交叉的五天工作周制，每天有五分之一的人是闲着的。

拉斯金先生说：“每天早上六点半钟，我们看到专车开来了。他们来时带着乐队和旗子，每天的人群都不同，而且总是兴高采烈的。”据说建筑这个工厂的非熟练工有一半是义务劳动者。

* * *

库兹涅茨克建筑工程可以从两个地方去眺望。你可以从大街望过去；那里你看到一片混乱。你也可以从小山上俯视它；那里你才能够看到已经建成的东西。以下是我的笔记本上的描绘。

“大街”是我对这条路的称呼。它现在还没有名字。它从建筑工程中心穿过去，很狭窄，两旁是垃圾堆、铁管和长长的钢梁，两辆大车勉强能够通过，在很深的沟畦上磕碰着前进。中午你沿着这条路走去。“嗨！不要把我碾死了！”你用劲把马头推开，钻到木材堆当中的角落里去。有二十个人抬一条重铁轨走过，他们把大车队拦住了一会儿。步行的人找到了一条更好的路，他们闪入一列和路平行排着的齐腰高的水泥管那里。他们弯着腰匆匆穿过管子。

有十二条铁路线横过大街。在装着建造鼓风炉用的大钢板的货车来回走过的时候，大车就停下来了。他们

在这片乱物堆里找地方卸下钢板；可是这样的地方很少，所以火车在轨道上来回，大车就被拦截了达二十分钟之久。火车走了以后，一辆巨大的装干草的车堵住了路；为了绕过它，大车挤在一起了。这里又有一辆大卡车停在路正中，十来个健壮的农村姑娘在电厂的排污管口用铁锹把垃圾装到这部车上，这些垃圾是一年前就该搬走了的。一百万立方码的垃圾仍然堆在不适当的地方。

从大街左右分叉出一些小路：一边到炼焦炉、鼓风机和电力站；另一边到锅炉间、翻砂间、平炉和将来的轧钢厂的骨架。这些都是危险的道路，靠着山边，爬过废物堆。随着建设工程每天的变化，这些小路每天也在变化着。只有在这里作工的人才认识路。

接连下了两天雨。大街上所有的杂乱东西都陷入了西伯利亚的泥滩。泥浆灌进了鞋口；山边的小道对大车来说已不能通行。所有的工作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效率。

美国工程师、俄国工程师、视察员和编辑们提出了一千条批评。为什么每件事都要绊自己的脚呢？为什么鼓风机、炼焦炉和电力厂要争通道、争人力、争一小块卸货的地方呢？为什么没有一条象样的道路呢？参加工作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告诉你这个钢厂应该怎样来建造。首先是修马路、铁路、木工厂、住房、堆货场、挖地基、铺水管、安下水道；其次是运走垃圾，然后才是建筑厂房。厂房建筑完工后再安装设备，然后是进行试制，最后是开工生

产。任何人都会告诉你这一些。

工程负责人法兰克弗特也告诉你：“在建设过程中，计划改变了。日本人进入了中国东北；我们需要更多的钢。按照有秩序的方式进行——这意味着要慢一年——或者是立即把所有的事都干起来，二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我们采取了第二种办法。还有，当时我们俄国工程师对于这种现代化的钢厂也缺乏经验。而且我们永远不能指望按计划取得原料。

“在美国你可以用电话订十车皮的耐火砖，并且在几天之内就收到。我们在一年半以前就已订了一些耐火砖。我们等了四个月，没有耐火砖来修鼓风机。后来这些砖一下子全运来了；我们没有地方摆这些砖，只好把它们卸在到处碍事的地方。我们的钢应该在五月来到；可是它却在九月才来。成车的设备来自俄罗斯各地和国外，车辆有时被耽搁在叉道上，拖延了时间。”

和法兰克弗特谈话后的第二天，泥泞干了一点，我们上山去了。我们爬到按计划盖的房子以上的高度，到达为了找工作而来的几万农民所建造的漫山遍野的小土屋。寻不到房子，他们就在山坡上挖洞，每家偷取建筑工地的一些木材、耐火砖、几块玻璃。这种现象愈来愈厉害，引起了无法解释的短缺现象，不得不要求采取警察行动。

从山边上我们俯视库兹涅茨克。未来的钢厂顺着山谷伸延了三英里长。正前方升起了八座鼓风炉的黑色巨

大的圆柱体。一年前，当我来这里时，挖地基的工作还刚开始，人们用小铲子挖土，靠古代亚洲的方法用木板或木箱抬土放上大车运走。现在第一号炉已准备开工了。从烟囱里冒出一缕蒸气，因为要几个星期的时间烟囱才会干透。这以后，铁矿、焦炭和石灰石将要吊到顶上，慢慢地从上向下烧。煤已经运来了。“铁在路上”，远在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乌拉尔区的磁山打电报来说。西伯利亚第一次在一个现代工厂里炼钢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在那八个大圆柱体后边有十来所巨大的建筑物：炼焦炉的高耸的黑色烟囱和巨大的混凝土墙；把六千个农民变成钢铁工人的工厂附设学校。发电厂有七层楼高；一个涡轮机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转动了。然后是有多棱屋顶的翻砂间；这个车间只挖了一半地基，盖成一半，却已经生产了两百吨铸件。左后方是平炉，它将在较晚的时候开工，是按世界上最大的规模建造起来的。再远一点是从混凝土的基础上升起的高耸的钢柱；它们是相当于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加里工厂的一个炼铁工厂的开端。

这还不是全貌。我们在远处左方的山崖下瞥见了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耐火砖厂，只是给熔炉制造替换的砖；斯达尔摩斯特的不整齐的工厂，它在给熔炉钉锅炉板；已经开工的锅炉厂和机器厂。在远处雾中隐约可见的是给新城市生产普通砖瓦的砖窑和制造标准房子的木工厂。

两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寂寞的山谷，只有一千五百人

口的沉寂的村庄。去年有了一些营房、地洞和挖掘的地基。现在新的城市已沿着山谷伸展,超出视线的范围了,有些人住在地洞里,有些人住在营房里,有些人则住在这个“社会主义城市”的四层楼的砖房里。世界上最大的钢厂之一已经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上出现了。

建设这个厂的不是法兰克弗特,不是美国专家,也不是这里现场上的四万五千名工人。建设这个厂的是全苏联;在列宁格勒的钢厂,在乌克兰的车间。到处都提出这个口号:“为库兹涅茨克加油干。”工人们加速并且加码地干工作。在我访问期间,从列宁格勒开来了一列火车;这列车出发时是一列,到达时成了两列。列宁格勒工厂的一个突击队护送列车来这里,为了监视他们的货物通过慢吞吞的西伯利亚车站。在每一个车站他们搜寻应该开往库兹涅茨克而被耽搁在叉道上的车皮。他们动身时是三十九节车,到达时是九十节。他们曾惊扰了沿途所有的火车站长。

这就是库兹涅茨克钢厂。沉睡的西伯利亚山冈,不熟练的农民,货物分散在二千英里的铁路沿线。另一方面,有着全苏联的工人突击队,他们下定了决心不让库兹涅茨克失败,因为库兹涅茨克开始了西伯利亚的工业化。这个工厂已经把几千农民变成了炼钢工人,并且使几百个工程师得到了经验。下一步,另外一个有这个厂两倍大的钢厂,就要在这个山谷往下不远的地方建造起来。“两倍大”,每个人都十分镇静地说。因为在库兹涅

茨克之后，在西伯利亚再没有其他工厂在建造时会象这个厂那样艰难了。

* * *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磁山——比库兹涅茨克还大。这里已没有篇幅来讲它的故事了。让我们只指出在乌拉尔山坡上一个十八万人口的城市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全成长了起来，它离最近的城市也有五百英里火车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设工地，拥有可夸耀的世界上含铁率最高的铁矿贮藏。这是一个青年城，富有青春的活力，工人中十分之六在二十四岁以下。这个城有三十五种民族，已经开办了十三所中小学校，一所高等技术学校，两所技术大学，一所是冶金大学，一所是建筑大学。这个城市已有一座市立戏院，六个电影院，一个“比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还要强”的马戏团。

这个城市的存在也是为了产生一个钢厂，这个钢厂对于乌拉尔就象库兹涅茨克对于西伯利亚一样。这个钢厂也是由于全苏联工人的紧张努力才建造起来的。这里也有年轻的工人发明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窍门，同库兹涅茨克厂进行创造纪录的竞赛。而这两个厂只不过是五年计划所产生的几十个巨大工程中的两个而已。

* * *

一九三三年一月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说，从前的落后的农业的俄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用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到一九三二年

十二月这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从一千一百万增加到二千二百万；生产量也增加了一倍。他报告说：

“我们从前并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汽车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机床制造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他接着谈到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并且说，“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工业部门，而且它们的规模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

这个计划使人口流徙和收获工作失调，代价很大。然而，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迅速这样伟大的进展。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步伐不是这样迅速，不但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推迟，而且国家的生存也会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在一九三三年日本已经从中国东北向苏联边境寻衅，而德国的纳粹党人已公开提出占有乌克兰的要求。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没有他们那迅速提高的经济力量，他们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西两面的入侵。

斯大林在一月的报告中说：“我们不得不鞭策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落后了一百年，并因落后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否则我们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 * *

在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苏联立刻投身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提出了五倍于第一个计划时期建设的新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然而，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这一任务“无疑是比较容易了”——今后的任何五年计划都不会有第一个那么困难了。五年计划成了这个国家前进的模式。

到了一九三五年，苏联领导人开始谈到社会主义已经“胜利”。那时它的经济基础已经稳固。

一年之前，在全国响彻着一九三四年的口号：“下一步争取质量和剩余”的时候，《莫斯科新闻》的一个记者从西伯利亚旅行归来。他说：“猜猜库兹涅茨克有什么新闻？他们正在同磁山比花圃呢！”

办公室里响起一阵笑声。库兹涅茨克，那个泥坑！那个在虱子窠、垃圾堆里建设钢铁城市的地方！鼓风机他们也许可以比赛一下。可是花圃，算了罢！

记者说：“这是事实！这里有他们的竞赛条件。条件中包括公园、林荫道、工人俱乐部。磁山有草地、树木和最好的公共汽车。可是库兹涅茨克有一条电车线和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剧团。麦耶霍尔德剧团正在那里上演。”

第三章 农业革命

在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那几年里，农业革命也同样迅速地发展着。在一九三〇到三三年期间，大约有一千四百万缺乏效率的小片农民土地合并成为约二十万个大农庄，这些农庄为集体所有和管理，并用拖拉机和机器耕种。为了农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安全，这样的改变是需要的。因为在一九二八年，旧式的俄国农业甚至不能供养城市；它当然永远无法为迅速发展的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提供粮食。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必须现代化。

一九二八年的时候，俄国的农民还在用中世纪的方法，甚至是公元前的方法耕种。他们住在村庄里，要走很长的路才到田里。一个农户的十英亩到二十英亩土地常常被分为十几块，散布得很广而且常常被分成连钉耙都无法转过身来的可笑的可笑的窄条子。四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半数以下的农民只有一对马或者牛。所以翻耕的次数很少而且很浅，通常用自制的没有金属铧的木犁。播种是用手，从围裙里把种子撒到地上，常常被鸟吃掉或者被风刮走很多。很少有机噐；我为伏尔加河岸的一个“儿童村”弄到的一架福特逊牌拖拉机，获得了二百英里

以内唯一的拖拉机的荣誉。

社会生活同样是中世纪的。家长统治着家庭。儿子结了婚，就把妻子接到父权制的家里，并且耕种仍旧属于他们父亲的田地。因此耕作方法保留着老样子，没有被年轻一代的观点所改变。它在很多方面是由宗教决定的。宗教节日固定了播种的日期，宗教的行列把圣水洒在田里来祝福土地肥沃，雨也是用宗教行列和祷告来祈求的。最虔诚的信徒把拖拉机看作“魔鬼的机器”——有时神父甚至带领农民向拖拉机掷石块。这样，任何为农业现代化的斗争便成了“反对宗教”的斗争。我还记得在伊凡诺夫省，共青团员为保证提早播种而反对圣海伦那的巨大的运动，在那里多少世纪以来，圣海伦那节的聚餐规定了播种的日期。

一九二八年，农业已经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总收获量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但是运给城里的粮食却少得多了。在沙俄时代，尽管农民在挨饿，还是把谷物运出口。苏维埃时代的农民比以前吃得好了，但是出售的谷物就少了。余粮常常落到富农的手里，这些农村小资本家不仅从自己的田里得到谷物而且还通过拥有磨坊和以收成作抵押而放债来获得谷物。他们同国家争夺粮食的控制权和农民的支持。

共产党内的右翼主张应该让富农发财致富，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工业国有化而取得胜利。左翼分子则主张强迫农民迅速地加入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实际

的政策在党内不同派别的压力下摇摆了好几年。最后通过的政策是用提供政府贷款和拖拉机来吸引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用高税政策来中立富农，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在理论上，加入集体农庄是自愿的；实际上，有时候使用了压力，发生了过火行为。

美国的评论家们常常讲到集体农庄是斯大林强迫组织的；他们甚至硬说他故意让成百万的农民挨饿使他们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不真实的。那几年我在农村里跑来跑去，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斯大林当然推动和指导了这个改革。但是集体化运动发展得远比斯大林所计划的为快，以致于没有足够的机器供农庄使用，也没有足够的会计和管理人员。徒有希望而缺乏效率的情况，加上富农教唆对牲畜乱加宰杀，再加上两年的干旱，造成了一九三二年的严重粮荒，那是所谓的斯大林的强迫措施以后两年的事。莫斯科实行了严格的全国的配给制度，使国家渡过了难关。

我在一九二九年秋天看到集体化运动像暴风雨一般席卷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那是一次比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更深入的革命，它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熟了的果实。贫雇农采取了主动，希望靠政府的帮助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富农想尽各种方法以至用纵火和谋杀来拚命地反对这个运动。作为农村中真正的骨干的中农，曾在升为富农和从国家得到机器这两种希望之间形成分裂。但是现在五年计划既已答应供给拖拉机，这一大阶层农民群众

便开始整村、整乡、整县地加入了集体农庄。

阿特卡尔斯克集体农庄协会的主席向我摇晃着一大叠电报——六个月以前这个组织还不存在。他非常兴奋地说：“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县集体化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十二月一日，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五。我们每隔十天收到一次数字报告。到十二月十日，我们预计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

早几个月，人们曾平心静气地辩论集体农庄的事，讨论播种面积的增加，和得到拖拉机的可能性。但是现在整个农村好像发生福音传道时的信教狂一样地来了一个突然的改变。一个村庄组织成为一个单位，然后又投票决定同二十个村庄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合作市场和磨坊。头几天，萨摩伊洛夫卡地方创造了一个“农庄”拥有三十五万英亩土地的纪录。过了几天巴拉科夫宣布了六十七万五千英亩；接着叶兰合并了四个大公社，共计有七十五万英亩。巴兰达的农民听到了这个消息，在会议上大叫道：“胆子大点嘛！把我们两个乡合成一个一百万英亩地的农庄吧。”在巴拉达一千匹马同时下了地，举行了“播种预演”。一个七十高龄的老人跑到照像机前面说道：“给我和那些马一起照个相吧；现在我可以死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天。”

党的组织者加入了这些讨论，有时候农业专家提出了意见，有时候还有那些对农业毫无知识而只是充满集体化热情的工人。“一千匹马在一块田里不是太多了吗？

这可能很壮观，但这是好的耕作方法吗？”讨论是热烈而对立的。后来，莫斯科谴责了“贪大狂”。但是在最初，热心分子把所有的谨慎都称之为“反革命”。家庭分裂了；青年跟随着热心分子跑，追求新的风尚。老年人则表示怀疑；他们看到自己对家庭的控制权随着土地一起失去了。妇女们担忧家里的母牛的命运。什么样的牲口将成为公共财产是不太清楚的；因为有着好几种集体化的方式。

富农和神父散布谣言来混淆问题，利用两性关系问题并制造恐怖。我到处都听见说集体农庄的所有男男女女将睡在“一条大毯子”底下。到处都谣传婴儿将被“社会主义化”。有些地方，富农加入了集体农庄——为了取得统治权或者为了破坏。在另外一些地方，他们被当做不受欢迎的人而开除出集体农庄。有些集体农庄接受了富农的马，但不接受富农，就像在革命的时候对待地主的财产一样。富农用烧毁集体农庄的仓库甚至用暗杀来进行反扑。在阿特卡尔斯克，一件十二个富农谋害一个党书记的审判案就要结束了。起诉书写道：“他代替我们大家死了”；农民听众都哭了。当农庄以烈士的名字命名以后，集体化的浪潮更加高涨了。

在我离开这个地区的时候，我问一位当地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件事，对于那件事，莫斯科说了些什么？”他匆忙地但是骄傲地回答说：“我们等不及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是根据我们做的事制订计划的。”

当我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听说莫斯科正在制订计划。来自所有的主要谷物区的消息都被综合到计划里去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曾提出到一九三三年集体化要发展到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这个运动，到一九三〇年某些地区就已经发展到百分之六十。根本没有设想到需要在这种规模上计划拖拉机和机器的生产。所以莫斯科尽可能削减了原棉的进口，让人民多穿几年破烂衣服。莫斯科取消了低价向巴西购买咖啡的一宗定货，因而得罪了巴西。莫斯科增加了农业机械的进口，而且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和亨利·福特交了朋友。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尔科夫决定了要建立起自己的“计划之外”的拖拉机厂，来满足乌克兰的需要。

仲冬，我到敖德萨地区去参观第一个拖拉机站。一个名叫马科维奇的农业专家设计了一个用拖拉机为农庄服务的有效而经济的方法。他没有把拖拉机卖给既不会使用也不会修理的农民，而是集中几十架拖拉机在一个中心站，配备了整套的机器设备、一个修配车间和一所驾驶员训练学校。这个站同半径二十多英里以内的集体农庄签订合同，派出拖拉机替他们做各种所需要的工作，收取谷物作为代价。这种安排是灵活的。一个相当富裕的拥有很多马匹的农庄，只有在开垦处女地的时候才租用拖拉机；而一个新近从国家得到土地但是非常缺乏牲口的第一个犹太人的集体农庄，大部分的耕作都是由拖拉机站完成的。国营的拖拉机站证明为如此有用，因而迅速

地推广到了全苏联。它们今天还是供应机器的主要方式。

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冬天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集体农庄的确切形式还不清楚。斯大林也是根据农民的行动制订计划的，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说，“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这只是正式批准了贫农已经在做的事，不过有了正式的授权以后他们开始做得更多了。揭掉富农的屋顶、乱流放富农的残酷消息传来了。同时，有一些组织者，因为急于要创造纪录，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威胁他们如果不加入就要被当作“富农”而放逐；他们把母牛、山羊、鸡，甚至碟子和衬衣都“共产”起来。富农大大地夸张了这些过火行为，并且煽动农民杀掉和吃掉他们的牲口，然后“光着身子加入集体农庄，反正国家会供给你一切”。

我问一个共产党员朋友：“为什么斯大林不加阻止呢？富农就没有权利吗？这太混乱了！”

他回答说：“真是太无政府主义了。这是由于党内的分歧而产生的；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引咎自责。斯大林已经指明了‘路线’——‘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可是那些控制了政府机构的右翼分子”——我知道他指的是李可夫——“拖延了法律的制定。这样，我们地方上同志们中的左翼分子没有法律做指导，就按照他们自己和贫雇农认为对的去做了。这是无政府状态。我们期望政府的法令很快就会下来；那时秩序就会好一些。”

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颁布了第一项法令，规定在“完

全”集体化了的地区，当农民大会讨论并决定要求驱逐某些指名的富农时，可以准许予以流放。可是名单须经州一级的政府审核，而且必须安排好富农应该迁往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是西伯利亚的建设工地或者处女地。法令颁布以后，无政府状态减少了，但是似乎仍旧有很多错误和过火行为。为什么斯大林不管呢？

我的共产党员朋友说：“在集体农庄的种子收进集体农庄的仓库，保证了播种以前，我们不能打击我们地方上的同志们。否则可能发生广泛的饥荒。”他的意思是说：已经吃掉了牲口并且盼望国家来养活他们的农民，也可能吃掉他们的种子。他补充说：“我们象一个穿着雪鞋在很陡的斜坡上滑雪的人。我们不能够停止，也不能够控制速度和距离。我们只能够注意我们的跳跃，设法使我们在落地的时候站住脚跟。假如我们不能这样做，那么一切都完了。”我明白他的话的意思，因为当我到里加去换护照的时候——那时美国在苏联还没有大使馆——我发觉美国领事馆的人员在用全部时间从几十种苏联地方报纸上收集关于苏联集体化的资料。他们送了上千页的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外国人预言饥荒将使苏联崩溃。据说不止一个邻国的军队已经准备好开进苏联。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当主要谷物区完成了“种子收集工作”以后，斯大林发表了他的著名的论文：《胜利冲昏头脑》。他说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速度使得“一些同志冲昏了头脑”。他提醒每一个人说，加入集体农庄是自愿

的，而且建议现阶段采用的集体农庄形式应该只把土地、耕畜和大机器社会主义化，而把母牛、绵羊、猪、鸡等家畜保留为私人财产。全国每一张报纸都刊载了这篇文章的全文；几百万册单行本在流传。农民骑马到城里去，不惜用高价购买最后尚能买到的一本，为了拿到当地的组织者面前摇晃，好象这是他们的自由宪章。斯大林突然成了千百万农民的英雄，支持他们反对地方过火行为的旗手。斯大林迅速制止了这种英雄崇拜，他发表了《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在这篇文章里他说道，“有些人以为《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是斯大林个人的创举。我们中央……并不允许这种个人的行为。这是中央所采取的……办法。”^①

* * *

快到三月底的时候，我到南方去迎接春天。在到斯大林格勒去的路上离莫斯科二十四小时路程的地方，我遇到了春天。半夜以后，当火车把我载到时，成群的农民把我吓坏了，他们包围住我，向我诉苦。“一个以前当过土匪的人钻进党里来了，在我们村里作威作福。”“斯大林说集体农庄是自愿的，但是他们不还给我们的耕牛。”

第二天早晨在乡镇的中心，从天亮到深夜我听见类似的怨言都投向一个疲倦的书记身上。他解释道，“主席

^① 见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一八七页。
——译者

不在这里，他到一个村庄帮忙去了，昨天晚上富农烧掉了那里的一所养有二十七匹马的马房，而村里是要靠这些马来播种的。他必须组织紧急的援助。”同时书记对所有来找他的人疲倦地重复说，如果他们决定退出集体农庄，他们当然可以收回他们的耕牛，但是他们不能够仅仅在头一天下通知，就要把牛从远在二十英里以外进行春耕的生产队里夺回来，从而破坏播种的工作。特别是，他们在一个星期内好几次改变着主意。

农庄面临重重压力——富农的暴力、神父的攻击、官方的愚蠢以及中世纪俄国的纯粹的低效率——似乎要崩溃了。然而，当我一离开铁路到了内地，这种混乱却被一种壮观的、群众性的播种场面所代替了。于是我认识到，那些靠铁路沿线和乡镇中心的情况来判断事情的记者们是一定要判断错误的。所有的怨言和冤屈都涌到铁路上来了，想从乡镇上寻求解决。没有一个能够耕地的农民到铁路上去——因为他正在耕地。在离开铁路的地方，人们正在为创造收获量的新纪录而斗争，以此来巩固他们使用土地和机器的权利。

他们称这为“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春天”，集体农庄的第一次播种。在一块田里就有着几英里长的肥沃的黑土，对这整片土地只要一个轮种计划就够了。每隔一定的间歇就有田间工作队——马、牛或者拖拉机——有节奏地穿过土地，进行着这里的土壤所未见过的最快、最深的耕作。晚上，土地上的营火星罗棋布，处处响起三弦琴的

音乐和男女的歌唱。有从莫斯科来的歌剧演员；他们带领了欢乐的人群到田里去，代替了旧式的宗教行列。一位从列宁格勒来的白发苍苍的天文学教授走遍了宿营地，用幻灯片向大家讲解星辰；对田间工作队来说这是“文化”，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反宗教”。城里的机工们志愿地来到这里修理农具。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播种。千百万农民第一次自觉地同城市生活，同工人、农业专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混合在一起，大家被一支伟大的洪流卷着往前走，在一个春天里建立起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

* * *

在那次伟大的播种中，有三个人突出在我的记忆中：集体农庄庄员乌斯季娜，新闻记者梅尔尼柯夫，乡党委书记科瓦列夫。

乌斯季娜是一个叫做“共产主义堡垒”的大集体农庄的养鸡员。她从八岁起就做了女仆。革命后加入了一个小小的艰苦奋斗过来的公社。她穷得只能用报纸来包裹她新生的婴儿。逐渐地，那些公社社员建设起一个成功的农庄，有拖拉机和—一个孵卵器——这是乌斯季娜因为工作优秀从莫斯科得到的奖品。过了两年比较舒适的生活以后，公社社员又闹了饥荒，因为很多饥饿的、分文不名的雇农挤着加入了农庄，而他们必须在收获以前供养每一个人。有些人主张，加入农庄的应该限于那些自带口粮的人。乌斯季娜坚决地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战

争。第一次是杀人的战争。这次不杀人，可是这一样是战争。所以我们必须帮助所有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

有一种在三节火车车厢里出版的名叫《旅行斗争报》的报纸，从斯大林格勒出发进行工作。它要在整个春天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调查和公布弊端，甚至从城市里请来法官设立特别法庭。这份报的最活跃的记者梅尔尼柯夫，每天能够消化十桩使人震惊的案子而不感到沮丧，反而更积极地投入斗争。他谈到了匪徒佐节夫，这人依靠家族势力设法当选为一个村庄的主席，然后企图把一个曾经揭露他的匪徒行径的红军老战士当做富农驱逐出去。梅尔尼柯夫谈到了一位热心的组织者，他在七个卡尔梅克人村落里一阵风实行了集体化，把村民的财产登记下来，在七天之后，告诉他们现在他们已经是一个农庄了。对于目不识丁的卡尔梅克人说来，政府的一纸命令是魔术和权威，他们甚至不敢把饥饿的羊群赶去进行夏牧，唯恐说他们“偷了政府的羊”。当斯大林的论文《胜利冲昏头脑》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所有的七个村落一夜之间全逃到沙漠里去了。

所有美国的反苏报刊合在一起都编造不出比梅尔尼柯夫在日常工作中胜利地记录下来的更多的“布尔什维克暴行”。这张《旅行斗争报》在那一季度内使得二百多名工作人员遭到逮捕，罪名从贿赂到盗匪行为都有。但是当我问起是否会由于这些骚乱而使收获减少的时候，梅尔尼柯夫惊讶地瞪起眼睛，好象我是一个疯子。

“少些？一定会多得多！你没有看见拖拉机使播种面积加倍了吗？你没有看见，即使没有拖拉机，雇农和农民怎样利用富农的马匹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的播种面积吗？富农害怕纳税，憎恨苏维埃政权，所以破坏了收获。但是这些新的主人象疯子一样长驱前进。”

贫农渴求改善生活的欲望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春天”所解放出来的力量。这支力量是共产党员领导的，而共产党员虽然没有经验并且要出偏差，但是却是有纪律的、不知疲倦的集体。我可以根据他们关心一切事情是否顺利那种紧张的神态，从田间工作队中把他们挑出来。我就是以这样的印象记得斯大林格勒以南一个小鞑靼区的区委书记科瓦列夫，以及他同十个没有办法的、想开小差的农民的谈话。

这些农民要离开集体农庄了。一个说：“我没有厚衣服，而他们要我在雨里放羊。”另一个说：“他们让我的骆驼饿着肚子干活，让它死在我的眼前。”第三个说：“自从我加入了集体农庄，我的婆姨都不愿和我一起过活了。”

在我看来这些理由是正当的，但是在科瓦列夫看来并不如此。他说：“这些情况你们向来都有的。没有人答应过你们，集体农庄会给你们一只金饭碗。管理方面的缺点是能够改正的。夜晚工作的人一定得有厚衣服。干草缺乏是由于去年的旱灾，但是在单干户的田里情况并不会好一些。谁离开集体农庄并不会使自己的生活会好些，因为整个苏维埃政权都在帮助集体农庄。一个农民

不是一个同别人无关的人；他的农田依靠着国家，同时国家也依靠着农民的农田。我们的国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我们必须迅速建立起大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否则我们就要灭亡。斯大林格勒的大工厂今年夏天将要把拖拉机供给你们的农庄。那座宏伟的发电站，斯大格勒，今年秋天将给你们家里照明的灯光。当这些还没有完成时，他们需要面包；因此必须大量增加谷物。假如每一个农民都坐在家里，考虑着是不是要耕种的话，这些能完成吗？今年每一个公民的任务就是加强集体农庄。”

这样地辩论了两个钟点以后，这些人的妻子在外面唤他们了。科瓦列夫请她们进来，但是她们不肯。她们已经打定主意，而她们的丈夫服从了她们。科瓦列夫没有浪费一句表示遗憾的话，就转过来动员还留在屋子里的五个共产党员，包括当地的几位教员和图书馆管理员在内。他指派他们立刻到田间的耙土队里去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士气。他打电话到斯大林格勒请求紧急供应干草，同时派一个鞑靼族的妇女组织者来到这些妻子们中间去做工作。他吩咐图书馆管理员把流动图书站送到田间工作队那里去。这简直是干练的将军的才能，该可以在更大局面的岗位上工作。而这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贫瘠的鞑靼村庄。党的组织工作者深入了每一个这样的村庄，为了那年春天的苏维埃麦子而斗争。

梅尔尼柯夫猜对了。虽然播种是在阶级斗争的混乱局面中进行的——播种的是那些在一年之内冲出中世纪

的人们——但是，他们觉醒了的意志是这样勇往直前，以致当收获来临的时候，苏维埃国家（还有那些象饿鹰般窥伺着的外国）知道，苏联已经达到了它所从未有过的最大播种面积和最高的收获量了。

那次的收获改变了世界的农业历史。

* * *

一次收获是不足以巩固集体化的。一九三〇年，集体化是靠组织得很差的、工具很坏的农民凭着强烈的意愿而实现的。此后的两年里面，他们遇到了组织工作中的困难。哪里去找能干的管理人员、会计、掌握机器的人呢？一九三一年，五个主要谷物区由于干旱而收获减少。一九三二年收成比较好些，但是收割得不好。农庄主席们不愿意承认失败，硬说他们正在收割进来。当莫斯科了解到真实情况时，一大批谷物已经埋在雪里了。

原因是很多的。一千四百万小农户合并成了二十万个大农庄，却没有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足够的机器。一千一百万工人已经离开农庄转入了新的工厂。农民的落后、富农的破坏、工作人员的愚蠢等也是原因。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事情很清楚，全国已面临严重的粮荒，而这是胜利地“征服了小麦”两年以后的事。

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代表党承担了责任；党打了瞌睡。当紧急情况已经发现时，采取的措施是迅速而有效的。为了解决急需，对农庄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要他们交出应向国家缴纳的谷物（赋税和机器租用费），不管

他们自己有没有口粮。他们被问道：“那些老老实实为你们生产拖拉机的工人，难道应该由于你们效率低而挨饿吗？”谷物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以后，就用来给全国配给口粮。甚至那些歉收的农庄也得到配给，方式是在播种时节，把口粮配给那些参加劳动的人。从东到西，全国都在挨饿——由此而产生了死亡率的普遍增长。但是饥饿是平均分布的——没有一处地方有“饥荒”这个字眼所包含的那种惊慌的混乱。在全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的情况下，一九三三年的农产物收了进来。

这期间为了防止将来的灾难采取了三项措施——收购谷物的新法律、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和在拖拉机站中设立“政治部”。在收购谷物方面，过去是对比较弱的农庄收购较少，现在改变为奖励丰收而处罚低效率的政策。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把最好的农庄里的“突击队员”带到莫斯科，并且把他们的方法在全国推广，让他们载着荣誉回家去领导整个地区取得成功。由于三分之二的农庄已获得拖拉机站的服务，这些拖拉机站又增加了两万名新的、有能力的人，他们是一种在以前的俄国农村所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工厂厂长、军队司令员、大学教授都自告奋勇地到政治部来工作，来提高农庄的“效率”。

外国报纸把这个叫做“斯大林对农民的战斗”。苏联的报纸把它叫做“我们争取丰收的战斗”。这是全国城乡一起进行的斗争。我的丈夫那时在《农民报》工作，他曾

带领一个由十名记者组成的“大队”，乘了双座位的飞机，花了四十天工夫在北高加索从一个农庄到另一个农庄地飞行。着陆之后，他就在已经收获过的田地上划出几块一平方公尺的地面作为典型，数一数其中浪费掉的麦穗，计算出农庄损失了多少，并且把最好的节省谷物的方法记录下来。这些由十个人收集来的材料被用电报发给所有的报纸登载，来指导正在向北推进的收割工作。在那四十天里，我丈夫的体重减轻了三十磅，他回家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而且长满了虱子。他估计他那一队人挽救了将近一百万蒲式耳的谷物。这只不过是那一年的全面斗争中的一个例子。

征服面包的斗争在那年夏天获得了胜利，这是从大灾难虎口里夺得的胜利。一九三三年的收获超过了历史上最高记录的一九三〇年。这一次，新记录不是由半组织起来的热情所突击出来的，而是由逐渐提高的工作效率和永久性组织所创造的。

在第二年，集体农民的伟大的抗旱斗争又巩固了这个胜利，那一次的旱灾遍及欧洲南半部。往年遭旱灾时，农民会吃掉他们的牲口，逃到城里去找工作。一九三四年，集体农民举行了区域性的代表大会，向旱灾“宣战”，并且制订了因地制宜的措施。有些人用救火机运水；有些人种植树木。在北高加索山坡上，他们挖掘了几千英里的灌溉沟渠，他们说：“我们有山；我们不需要雨。”在每一个冬麦歉收的地区，科学家研究出种哪一种二茬庄稼

最好；这些意见得到广泛的宣传，而政府则迅速地运来了种子。这种全国性的合作克服了一九三四年的干旱，使苏联的总收获量达到了最高的一九三三年的水平。即使在最差的地区，大部分农庄也克服了困难，使人和牲口都有粮食吃，同时还加强了组织。

一九三五年，新的农业巩固了；两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要离开集体农庄。示范农庄章程和示范“农庄计划”已经制订出来；轮种制和田地的位置固定了。连续三年，谷物收成比过去的记录提高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吨；甜菜的种植面积加倍了；棉花的种植面积是过去的两倍半。畜牧方面有重大的损失，因为在集体化的第一年里很多牲口被杀掉和吃掉了。（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从农民那里买进牲口。）

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的改造。农民不仅学习了读和写；他们还向科学和艺术进军。两年内单单在乌克兰就设立了七千所“实验站”，在那里农民研究他们自己的庄稼，同政府的试验站交换资料。几乎每一个农庄都有了自己的剧团、滑翔和跳伞俱乐部，甚至还有飞行训练班。农民把自己和国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国家也把自己和农民们联系在一起。一位苏联农学家对我说：“过去我们科学家常常感觉到不受重视，但是现在集体农庄需要我们的科学，我们看到了我们几千年也做不完的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国坦克被俘获或者德国飞机被迫降落在乡间的时候，当地农民游击队能够把坦克或飞机驾驶到后方去。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美国《生活》杂志的特刊写道：“无论农业集体化的代价是什么……这些大的农业单位……有可能使用机器……使产量加倍……（而且）解脱出几百万农民，让他们能成为产业工人。没有集体农庄……俄国不可能建立工业，制造军火，阻止德国军队的前进。”

* * *

大战以后，我在一九四七年飞经苏联，降落在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在机场的一端停着几十架小飞机，我以为这一定是个军事训练机场，而且表示奇怪，他们为什么会让我们在这里降落。

“哦，不，”一个俄国人说：“那些都是集体农庄庄员的飞机。他们由于各种任务而飞到城里来的。”

第四章 新 人

建设新工厂和新农庄的人的特点，是具有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每当美国人谈到苏联人民是“被编制得千篇一律”的时候，我总是要发笑。每一个国家和时代都有它自己的一定范围的一致性和容许变化的途径。但是，直到我后来访问中国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遇到过那么多象在苏联的五年计划中表现出创造精神的人。

比尔·沙托夫就是一个例子。我在新西伯利亚城一家旅馆里遇见他的时候，他正病在床上。当时他在建筑铁路，为了获得铁轨、水泥和工人而斗争着；由于过度疲劳，他的眼力已经坏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子接出来，使自己有一个舒适的家庭、正常的饮食和一些休息。比尔瞪起了眼睛。他说：

“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工作。不，不仅是工作，而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一段时刻，有着无穷无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

不但是领导人充满了这种创造的热情。就是在千百

万平凡的公民身上，由于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新道路，也产生着这种热情。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了那些从前曾经是文盲的农民怎样变成了农学家、业余演员、跳伞员和飞行员。在比较落后的民族里则发生了远为巨大的变化。苏联有一百五十多个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从豢养驯鹿的爱斯基摩人和牧羊的游牧民族吉尔吉兹人一直到象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那样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

苏联的政策是，只要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应该让一切民族文化都发展起来。但是五十八个小民族甚至连字母都没有，至于书籍那就更谈不上。因此，科学家就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在莫斯科，以上百种不同的文字出版书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书籍的发行已经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书籍发行量的总和。书籍仅仅是一种改造的力量；此外还有新的法律、科学和艺术。

最伟大的改造力量是人民自己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作家潘菲洛夫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工人阶级在汹涌的第聂伯河上建筑了一个水闸，使难以驾驭的河水为人民服务。工人阶级将多雾的乌拉尔变成了一个工业中心，并且征服了荒野而遥远的库兹巴斯。工人阶级在改造国家的同时改造了他们自己。”

在三十年代初期，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新人”。有一个俄国作家向《莫斯科新闻》提供了一些关于“新人”的短篇素描。他说，他大约有一千篇这样的素描。使我们惊

异的是，他接着又说：“这些素描还不足以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各种类型的新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家报纸辟了一个叫做《新人》的每日专栏，描述了人们习惯和看法改变的趣事。但是我担心其中有一些后来终于证明只是主观愿望；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既没有带来乌托邦，也没有取消罪恶。尽管这样，在人们身上的确出现了巨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在所有这许多变化之中，我将只谈三点：中亚细亚妇女的解放、孩子们选择未来职业的方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兴起——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说明那个时期生活的质量。

* * *

妇女地位的变化是苏联各地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革命给妇女带来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工业化为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经济基础。但是在每一个村庄里，妇女还得同几百年来的习惯作斗争。例如，来自西伯利亚一个村庄的消息说，在那个村子里，当集体农庄给予妇女独立的收入以后，妻子们曾经“举行罢工”来反对殴打妻子的行为，她们在一星期内就把那种由来已久的习惯粉碎了。

一位村主席对我说：“男人们全都嘲笑被我们选入村苏维埃的第一个妇女。但是在第二次选举中，我们选了六个妇女，这回轮到我們笑了。”一九二八年我在西伯利亚的一列火车上遇到二十个这样的女村主席，她们是去莫斯科参加妇女代表大会的。她们当中大多数是第一次

乘火车旅行，只有一个人曾经离开过西伯利亚。她们是被邀请到莫斯科去就妇女的要求这个问题“给政府提意见”的；她们是由各县选派的代表。

在争取妇女解放的一切斗争中，最艰巨的是在中亚细亚。在这个地区，妇女被当作财产，从小就卖给人做妻子，而且从此凡出来时必须戴着那可憎的“帕伦亚”——一种用马鬃编成的长形黑色面纱，它遮盖全部面孔，阻碍着呼吸和视线。传统使丈夫有权杀死不戴面纱的妻子；毛拉——伊斯兰教的教士——以宗教来支持这种风俗。俄罗斯的妇女将妇女解放的第一个消息带到了这里；她们在这里设立了儿童诊疗所，在诊疗所里，本地妇女彼此见面时都不戴面纱。这里，大家讨论着妇女的权利和面纱的坏处。共产党对党员施加压力，要他们允许自己的妻子除去面纱。

一九二八年，当我第一次访问塔什干时，女共产党员所举行的一次会议宣布：“在落后的农村里，我们的妇女在受着糟蹋、折磨和杀害。但是今年我们必须废除讨厌的面纱；今年必须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年。”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增加了这一决定的尖锐意义。一个塔什干学校的女学生利用假日在本村鼓动争取妇女权利。她的切碎了尸体被用大车送回学校，车上写着：“这就是你们妇女自由的报应。”另一个女人拒绝了一个地主的追求，和一个共产党员农民结了婚；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那地主唆使了十八个男人强奸了她，并且将她的尸体掷在河

里。

妇女们写作诗歌来表达她们的斗争。祖尔菲亚·汗，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被毛拉用火活活烧死之后，她村里的妇女写了一首挽歌：

“啊，女人，世界将不会忘怀你为自由而进
行的斗争！”

你身上的火焰——让他们不要以为它会将
你化为灰烬。

燃烧着你的火焰已经成为我们手中的火炬。”

正教压迫的堡垒是“圣波哈拉城”。在这里组织了一次戏剧性的摘除面纱运动。到处传播着这样的消息：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将要发生“一件壮观的事”。在那一天，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妇女大会。在台上讲话的妇女号召大家“一齐把面纱摘去”。于是妇女们列队走到台前，把自己的面纱掷在讲演人脚下，在街上举行了游行。街上已经搭有检阅台，台上的政府领导人向妇女们挥手致意。旁的妇女也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游行队伍，把自己的面纱向台上掷去。那次游行打破了圣波哈拉城的戴面纱的传统。当然，事后有许多妇女在发怒的丈夫面前又将面纱戴上了。但是从那时起，面纱就越来越少了。

苏维埃政权利利用了许多武器来争取妇女的解放。教育、宣传、法律都起了作用。对杀害妻子的丈夫举行了公审大会；新宣传的压力肯定了法官有权将那些旧习惯认

为无罪的人判处死刑。在中亚细亚，也和俄罗斯本部一样，争取妇女解放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工业化。

我在波哈拉老城参观了一家新的丝织厂。这家工厂的厂长——一个脸色苍白、精神疲惫、日夜不睡地建设这项新工业的人——告诉我说，他并不期望这个工厂在一个长时期内会赚钱。“我们正在把农村妇女训练成新的工作人员，以便建设将来的土尔克斯坦丝织厂。我们的工厂是有意识地运用来废除妇女的面纱的力量；我们要求妇女们在工厂里不戴面纱。”

纺织女工把她们的面纱换成俄罗斯式的头饰——头巾——的时候，写了歌子来歌颂生活的新意义。

“当我到工厂去的时候，
我在那儿发现一条新头巾，
一条红色的头巾，一条丝织的头巾，
它是用我亲手的劳动买来的！
工厂的吼声响在我的心里。
它给予我节奏，
它赋予我活力。”

人们读了这首歌以后不能不回忆起与此相对照的托马斯·胡德的《衬衣之歌》，那首歌描写出了英国早期的工厂的情形。

“拖着疲乏而磨破的手指，
睁着沉重而发红的眼皮，
一个女人坐着，穿着不象女装的破衣，

匆忙地穿动着她的针和线。
在贫穷、饥饿和污秽里，缝着，缝着，缝着，
然而不断地用哀伤的音调，
她仍然唱着衬衣之歌。”

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工厂是追求利润而进行剥削的武器。在苏联，工厂不仅是生产集体财富的手段，而且是被有意识地用来打破过去的枷锁的工具。

* * *

苏联每年都要产生许多的英雄，他们通常是在生产中打破纪录的人。在一九三五年，最出名的人有两个：煤矿工人斯达汉诺夫，他发明了一种更好的工作方法——他的名字被用来发起了一个运动。集体农庄甜菜种植员玛丽·捷姆琴科，她在实验站里研究甜菜，一九三五年春天，她向所有的甜菜种植员提出了挑战：“让我们用糖来铺满我们的土地；我这一生产队保证每英亩出产二十吨甜菜。”

几百个农庄接受了这个挑战。玛丽的生产队工作时，有几个千个参观的人去观摩；当她们在地里九次锄草、八次在夜间用火清除蛾子时，千百万的报纸读者都在跟踪着这次坚决的竞赛。当八月间不下雨的时候，全国都叹息着，而当玛丽请到消防队在她的地上浇了两万桶水时，全国都欢呼起来。她在全国喝采声中得到了每英亩二十一吨甜菜的产量。在一两年内，她的纪录被打破了，但是她的声誉还保持着。

她的故事的结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玛丽生产队被邀请到莫斯科去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她们站在领袖们站的检阅台上。玛丽激动地告诉斯大林，她曾经怎样梦想“看到领袖”。斯大林回答说：“但是现在你们也是领袖了。”玛丽想了一想，然后同意地说：“对，是啊。”斯大林问她要什么奖励。玛丽要求得到研究甜菜的奖学金。她得到了。一九三五年时人们理想的奖励和领袖就是这样的。

人们写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应该培养怎样的人的文章。当一群土库曼的骑手惊人地驰过两千六百九十英里的沙漠地带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赞扬了他们的“明确的目标、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强的性格”。《真理报》将这个主题发挥成一篇社论，论苏联人的理想性格。社论说，这种性格同不久以前希特勒要求于德国青年的盲目服从是“恰好相反”的。社论将“坚强的和独创的个性”称为苏联公民的本质。“不是顺从和迷信，而是自觉、大胆和果断……这种坚强的个性是和劳动者的坚强的集体精神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从千百万人所注视的明确的目标里，……产生了卓越的自觉的纪律。”社论这样着重地提出了和纳粹的理想针锋相对的一种理想。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开始震撼全苏联。在成百处地方同时发生了工人使用新机器突破生产定额的事，他们这样做常常受到管理当局的冷淡或反对，但是却受到工人伙伴们的紧张的关注。世界各国都

注意到了这一运动，并且把它称为“赶工”。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赶工”——而是在冲破世界生产率的界限。顿巴斯某些矿工的劳动生产率比鲁尔的工人高出了一倍；高尔基汽车厂的某些锻工打破了福特汽车厂的生产定额。列宁格勒的一些制鞋工人创造了比捷克斯洛伐克拔佳鞋厂工人生产率高出百分之五十的纪录。

五年前试图“教导俄国人”的几百名美国专家听到这种情况时，一定会抱怨的。“当我们指点他们怎样做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做呢？”理由是清楚的。苏联曾经用新机器装备了自己并且使用了一千一百万新手来操纵这些机器。这些新手弄坏了机器，但是他们却学到了东西。当老师在指点他们的时候，他们学不会；本领必须在他们的神经系统里扎根才成。但是他们所学到的不仅是美国人的技术。他们学到的是技术加上主人翁感——掌握了创造现代化世界的钥匙的主人翁感。

参加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的人——莫斯科的每一个人都想去参加——谈到会场上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报纸的报道都变成了抒情诗一样，谈到了关于“降服科学的烈马”，“为走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铺平道路”。会上的全部讨论都体现了新人的特点——愉快的首创精神、由于掌握了复杂操作方法而感到的自豪、自觉地同全社会合作、求知的渴望。

斯达汉诺夫谈到了他在创造纪录时的思想状况。“国际青年节快要到了，我想创造一个纪录来纪念它。过去一

个时期以来，我的同伴们和我一直在想着怎样来打破定额的束缚，让矿工们放手干，迫使钻机在全班时间不断转动。”锻工布塞根宣称：“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对学习梦想得那么多。我想知道汽锤是怎样造成的，并且想制造它。”斯拉夫尼科娃想在一种她曾经研究过但是从没有使用过的机器上“打破纪录”。工长反对她这样做。她对他说：“我是一个跳伞员。那个生产定额没有把我吓住，我要推翻它。”她做到了这一点。

瓦西利耶夫，一个曾经在锻造连结杆上创造过纪录的锻工，用“沸腾”和“爆炸”的字样来表达他的感情。当他在一九三四年创造的纪录被别人打破时，他“沸腾”起来了，在他的假日还没有结束之前四天，他就回到工厂工作。“我打破了安德里昂诺夫的纪录，但是随后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哈尔科夫的锻工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锻造了一千多个连结杆，于是我爆炸了。我在一班工作时间内只锻造九百四十五个。……我和小组商量怎样组织我们在工作时所站的位置；于是我们达到了一千零三十六个连结杆的纪录。我们和工长讨论，告诉他怎样改造熔铁炉。他给了我们一座在一班工作时间内可以加热一千五百个连结杆的熔铁炉。现在还有什么在阻碍我们呢？我们讨论了这一点，把要加工的材料按照比较容易拿到的次序安放。在十月二十七日，我创造了全苏的纪录——一班工作时间内生产一千一百零一个连结杆。同志们，我还没有用尽汽锤的可能性。但是我将要做到这一点。”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不屑延长工作时间的，认为这是承认工作效能不高的做法——他们坚持应该找出一种不太消耗体力的有节奏的工作方法。“如果工作做得对头，你会感到更舒适、更强健。”他们迫切地要把他们的技能传授给别人。火车司机奥密利昂诺夫创造了纪录以后，要求收“最后进的司机”做徒弟，把他也教成一个打破纪录的人。这些人的主张打破了技术上的规程。一个工程师告诉我：“我得夜里不睡觉来设计工作流程，以便赶上他们的步伐。”

一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我说：“十年以后，农业和工业可能不再成为我们的主要活动了。我们所生产的将能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了。但是我们将有其他的活动。人的发展、探索、科学，这些是无止境的。”他不承认人类的进步有任何止境，不论是在人类本身的性格方面或者是在时间和空间方面。

青年们尤其不知道止境。学校很早就帮助儿童发现自己的才能；夏令营和远足扩大了选择的范围。报纸上的讨论引导他们表达自己的才干。有一份报纸、《少先队真理报》的稿子几乎完全是由儿童写的。在梯弗里斯，铁路工人的孩子们在“文化公园”建筑和开办了一条半英里长的铁路；他们用火车载送乘客，卖票，用这笔款子来扩建铁路。在大部分“成年人的”活动中，都替孩子们保留了一定的位置。在一九三四年的“抗旱战争”中，儿童拾穗队跟在收割者后面，他们并且展开了节约谷穗的竞赛；

在北方的一个县里，孩子们自豪地告诉我，他们怎样拾了好几吨的鸟粪和柴灰在瘠瘦的田地里施肥。

一九三四年，在摩尔曼斯克的火车上，我遇到了二十个年龄全在十六岁以下的少年“北极探险家”，正到北极地区去。他们对地图、北极探险队和北方人的兴趣使他们获得了组织这次探险的机会。他们将会见成年的北极探险家，后者将笑容可掬地把他们作为可能的未来同事来看待。在同一个夏天，十个最好的植物课的学生得到了远征阿尔泰山的机会，他们在那里徒步旅行了一千二百英里，发现了二十七种新的黑色复盆子，和一种能抗霜的葱头。在这些“青年植物学家”中有两个被选为代表将这些植物送到年老的植物育种者米丘林那里去。

那个时期苏联青年的感情可以由两件事情表现出来。莫斯科新的十年制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代表安娜·穆里尼克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她的毕业演说中说：“在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时代，……生活是美好的。我们——国家的年轻主人翁，有使命去征服空间和时间。”毕业演说词是容许有些夸张的，但是过去青年是帝王的臣民或者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他们从不敢将自己称为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主人翁”。同一年，妮娜·卡缅诺娃从比雷尼埃山高一倍的寒冷的高空中跳伞下来，创造了世界纪录。她在着陆后所讲的话是：“我们国家的天空是世界上最高的天空”，这句话立刻被苏联青年抓住当作了口号。

正在他们愉快地讲大话的时候，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调查，这种调查把一九三五年的胜利气氛——当时乌托邦好像就在眼前了——转变成为一九三七年的“大疯狂”。

* * *

那一段快乐的日子为历史留下了一项成就——在那几年里诞生了新的苏维埃宪法。

苏联一直自称是民主的；而西方总是否认这一点。这里没有多余的篇幅来详细叙述苏联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不论美国人对苏联的选举有怎样的想法，苏联人民至少是同我们一样起劲和带着希望地参加选举的。他们不但投票选举候选人，而且还将自己的要求写成“纳卡兹”——“人民的指示”，这些指示就成为新当选的政府的首要任务。

在一九三四年的选举里，我的丈夫，作为一个选区的工作者，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每天晚上去访问他那个选区的每一个选民，鼓励他们不仅参加投票，而且将他们要政府做的事情一一提出来。他向我谈到一个以前从没有投过票的老妇人——她说：“我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在他的督促之下，她环顾了晾满湿衣服的厨房之后，决定要求政府开设更多的公共洗衣房。她也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一年，莫斯科市苏维埃一共接到了四万八千条“人民的指示”，而且必须在三个月内就这些要求作出交代。当然，有许多是重复的，或者是必须

提交中央政府的，但是其中有大量的的是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向人民提出答复的。市苏维埃说，如果提出这些要求的人肯义务工作的话，这些要求就能够得到解决。“苏维埃民主”不但表现在参加选举的人数上——这从一九二六年占具有投票权的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一增长到了一九三四年的百分之八十五——而且还表现于一个代表所能征集来志愿帮助政府完成任务的人数。例如，在税收和住房问题委员会方面的许多工作都是由人民志愿来做的。霍华德·克·史密斯在三十年代的后期注意到这种情况所创造的气氛，并且谈到他在莫斯科的访问说：“你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每一个小人物都感到自己在建设国家的相当重要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气氛使我想起了一个词……就是‘民主’。”

但是，自从一九二二年宪法制定以来，苏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国家的基本财富已归公有；人民不再是文盲了。间接的、受工作单位限制的不平等的投票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各地的人民都知道他们的全国性的英雄，能够直接投票选举这些人了。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宪法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国家生活。以斯大林为主席的，由三十一名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指定草拟一部更加符合人民意愿的、更加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宪法。

通过宪法的方式是很有意义的。专门委员会花了一

年功夫研究了人们为了共同目的把自己组织起来所曾经采取过的一切历史形式——国家形式和自愿结社的形式。随后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宪法草案由政府试行通过，并且印了六千万份提交给人民。这个草案经过了三千六百万人参加的五十二万七千次会议的讨论。好几个月里，每一张报纸都载满了人民的来信。提出的修正意见约有十五万四千条——当然，其中有许多是重复的，还有许多是更适用于法典而不适用于宪法的。但是宪法草案的确根据人民的创议而作了四十三处修正。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两千零十六名代表在克里姆林宫的雄伟的白色大厅里举行了制宪大会。这是在工业、农业、科学工作中涌现的杰出的“新人”的大会。到这里来的农民不再被列在一般化的“谷物生产者”一类了，而是作为专家、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手出现的——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曾经创造过纪录。这里面有大工厂的厂长，著名的艺术家和外科医生、科学院院长。这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近结束时苏联的新代表。

新宪法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变化。它一开始说明了国体和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土地、资源、企业是“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集体农庄的公共财产和公民在收入、住宅和家庭日用器具方面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之保护”。“凡年满十八岁之公民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用秘密投票法”进行选举。

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章，逐条都受到了欢

呼；这包括以前任何国家所保证过的最广泛的权利。生活的权利包括在四条里：“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物质保证权”。自由的权利被扩充为六条，包括信仰自由、宗教仪式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和结社自由、不受任意逮捕的自由、住宅和通讯不可侵犯的自由，“不分民族及种族”。

这部宪法是对当时在德国执政的纳粹法西斯的直接挑战。纳粹分子宣称民主已经过时；而所有苏联发言人都高呼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希特勒宣传“优等的和劣等的种族”。斯大林却以关于人类平等的空前概括的语句向希特勒进行了挑战，他说：“不论是语言，或是肤色，或是文化的落后，或是政治的发展阶段，都不能够成为民族和种族不平等的理由。”

千百万人民涌到苏联的严冬的街道上，奏着乐来欢呼这一重大事件。全世界的进步分子也为它欢呼。在遥远的中国，孙逸仙夫人说：“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罗曼·罗兰在平静的日内瓦湖畔发表谈话说：“这在生活中实现了直到今天为止始终不过是人类梦想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这部宪法甚至在起草的时候就遭到了破坏。这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很少宪法是受到严格遵守的。但是苏联宪法是受到它的作者斯大林自己的破坏，而斯大林显然是以他的“民主宪法”自豪的，然而他却犯了一种奇怪的两面做法的错误。因为，当这部宪法仍然是苏联的根

本法，被人民、政府部门和普通法院自豪地遵守着的时候，它却没有受到政治警察的一顾。由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给予集中的权力的这个机关，已经成了国中之国。它既不尊重宪法，也不尊重苏联任何其他法律。从这里出发就产生了以后这些年的黑暗事件。

第五章 大疯狂

我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一九三六——三八年间在苏联发生的那些过火行为的全貌，也不能够恰当地评断其责任。不知确数的人，无疑地有好几万人，在没有预先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被捕，并且不经审判就被送到北部和远东的罪犯营中去。成千的人被处决，他们的遭遇甚至连他们的朋友也不通知。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报告说，过去两年里已有七千六百七十九个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最惊人的透露是，在一九三四年号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一百三十四个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九十八人，即占全部委员的百分之七十，多数在一九三七——三八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反苏报纸找到了容易的结论，它硬说社会主义的本性就是“集权和残暴的”。凡是了解近年来苏联人民的创造性和他们对他们自称的“自由”的热爱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看法。赫鲁晓夫和另外一些人几乎作了同样简单化的解释，即斯大林和“个人崇拜”应该负责。斯大林自然

必须负责，但是宣布他的错误并不就是最后的答案。因为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支持了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始的行动。牵涉到的有一整个掌权的机构。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说，斯大林在所有这些行动中，“认为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必须这样做。”我想，苏联在回顾和总结这些案件和历史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评价的。而现在，我把这事看作是“大疯狂”，并且尝试来探求它的发生有些什么线索。

所有的政府都有受到敌特或叛逆公民“颠覆”的问题。通过法律程序十分清醒地处理这个问题的情形是少有的。这常常引起捕风捉影和邻人疑惧狂。这在美国就可以看到。这种失常的情况无疑是由于以下事实所造成的，即犯者不是一般的刑事犯，不是那样容易加以区别和给以恰如其分的处罚。他们违背国家的要求，忠诚于别的东西和事业。一个稳定的或者有自信心的政权是不会为这些人而过分不安的，因为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战争时期，或是对处在紧急关头的政权来说，他们比普通刑事犯要令人不安得多。

三十年代末期，整个欧洲都处在这样的不安之中。西班牙内战期间创造了“第五纵队”这个名称来描写弗朗哥的秘密追随者，他们从内部帮助夺取了共和国的马德里。后来，希特勒的“第五纵队”钻进了欧洲的许多政府，以致战争一挨到它们，它们就垮了台。从广义上说

来，这个第五纵队包括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这样的人。他们破坏了西班牙的民主制度，后来又为了引诱德国军队东进而把捷克这一要塞送给了希特勒，从而削弱了他们本国的国防。第五纵队还包括那些美国工业家，他们把废铁卖给日本从而加强日本反对美国的力量。这帮人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卖国贼。奎士林、赖伐尔^①和其他以各种借口参加为侵略者服务的傀儡政府的人，大概也不会作这样的承认。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立场来说，他们是本国的卖国贼。从今天进步分子的立场来说，他们是人类的叛徒。如果希特勒胜利了，对他们的鉴定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历史总是由胜利者写的。

以此作为背景，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苏联。苏联在它最初的年代里受到由旧俄首领请去的许多外国军队的入侵，通过代价很高的战争才把它们赶了出去。可是资本主义各国继续施加着压力和威胁，利用着苏联国内每一类心存不满的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出现了高级工程人员的“破坏瘟疫”，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同当时已经国有化了的企业的前外国业主有联系。让我们瞧一瞧这种破坏活动吧，任何一个当年在苏联企业中工作过的美国人都能够为你举出一些例子。

最简单的方式，仅仅是暗中进行贿赂。有人告诉把机器卖给苏联工业部门的一家辛辛那第公司的代表说，

① 奎士林为挪威人，赖伐尔为法国人，都是二次大战时同德国法西斯合作的分子。——译者

你们的这些机器不好使。甚至为了从莫斯科到萨马拉去看一下那些“不好使”的机器所在的工厂，他都不得不同官僚机构的手续作斗争。当他到达那里时，必须得到政治警察的帮助才勉强进到里面去。他会见了一位惊慌失措的主管人，这个人承认那些美国机器还在箱子里，从来没有试用过。这个主管人受了一家德国公司的贿赂，送出了假报告，并且曾同莫斯科的一个官员串通，想阻止这个美国人来到萨马拉。告诉我这件事的美国人没有因此过分吃惊；他只对他所揭露的“诡计”一笑了之。对于付出高价来建设国营工业的俄国人来说，这种行为就是罪行。

我第一次亲自碰到外国间谍的阴谋是在一九三〇年，当时我访问了敖德萨附近的第一个拖拉机站。我在火车上两次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警察的查问。当我使他们确信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时，他们才离去。我问搬运工人说：“为什么国家政治保卫局警察在这里忙个不休呢？是不是因为这段铁路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缘故？”

他回答说：“是你的那件德国皮夹克。他们以为你也许是那些煽动门农教派^①信徒骚动的间谍之一。”后来，我从当地农民中了解到，德国间谍是大批日耳曼血统门农教农民突然决定“逃出这个不信神的国家”的一个因素。他们整村的人卖掉或者抛弃了房子和牛羊，前往莫

^① 基督教新教徒的一派，不相信“原始罪恶”，反对洗礼等仪式。——译者

斯科要求发给出国护照。宝贵的庄稼有一些就这样败坏掉了。

许多美国人把他们在工业中发现的破坏活动告诉了我。有一个人是一家汽车厂当监工。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个调查员召见了她，给她看一些金属零件，问她是否知道它们是什么。

他说：“当然，这是重机枪的零件。”那个调查员然后把一件使他吃惊的消息告诉了他，说这些东西是上夜班的时候在他的车间里制造的。后来查明工长和一个技术员是罪犯，其他的工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为叛逆的匪帮装配一个秘密的武器库。

另一位在炼钢厂检查故障的美国人笑着告诉我：“我在捉拿破坏者。我并不是去抓真正的人。但是当我打开一座出了毛病的机器的齿轮箱的时候（齿轮箱在一张要用起重机费半天功夫才能搬动的钢质工作台下面），发现齿轮让九桶污泥和钢屑片塞住了。我把这事报告了厂长，并且说：‘这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是个好人，不懂炼钢厂的业务，但是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知道该去抓谁。”

当更多的俄国人学会工业技术之后，破坏活动减少了，因为现在破坏活动比较容易识破了。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工程师也被争取过来了。一九三一年斯大林宣布，从前受到怀疑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正在“向苏维埃政府靠拢”，他们应该得到工人的合作。“破坏瘟疫”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外国间谍策动的更加隐蔽的破坏活

动仍然继续着。在一九三一—一三四年间，当这种活动提到法庭的时候，是受到越来越宽大的处理的。经济情况在进展着，少数破坏分子已不足为惧了。早期的“破坏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本来是被判处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监视下的一些工程上从事本行劳动的，现在又在寻常的工作岗位上出现了，有时还佩戴着他们在监督劳动中赢得的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局仍旧通过破获阴谋案件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判刑减轻了。一九二八年在“沙赫特案”中犯有破坏煤矿罪的五十二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被判了死刑，其中有五个人的确被处死了。两年以后对“工业党案”作了同样判决，这种罪属于当然处死刑之列，但是“鉴于悔悟”而予以减刑。不久，这批罪犯还获得了条件良好的工作。一九三一年间，犯了“勾结外国势力鼓动农民暴动”罪的孟什维克，只不过判以徒刑。据称，他们不再是危险到必须处死的程度了。

这种越来越宽大的政策是由于国家的自信心在增长。害怕日本进攻的心理在一九三一年是强烈的，但当日军到达西伯利亚边境而不曾入侵的时候就减轻了。自然，希特勒曾对苏联的乌克兰提出领土要求，但当时很少人认为希特勒会持久的。李维诺夫成功地同邻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看来苏联也许可以避免它一直在提防的战争了。当第一个五年计划转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在前一章所指出的轻松感觉增长了。特别是在一九

三三年的秋收以后，苏联人民对自己增长着的力量感到很有信心。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谢尔盖·基洛夫被刺，粉碎了这场安全的幻梦。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基洛夫是斯大林亲密的朋友和可能的接班人。他被一个利用党证出入总部的共产党员暗杀了。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一个共产党员居然恨透了领导以致进行谋杀。当原来认为是在保卫基洛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官员好象也牵连在内，并且调查结果发现案子的线索通过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同外国势力，也就是同德国有联系的时候，震动就更大了。随后是进行了一年半的调查，在这期间许多人已经把基洛夫忘记了。忽然宣布，党的高级负责人同这个案件有关。苏联检察长传讯了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团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旁的人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受审。他们被判罪并处死。接着是其他的审判，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而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军事法庭审判八名红军高级将领并按叛国罪予以处死时，达到了高峰。这大概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连串的叛国案审判。

最重要的那些案件是在一个大厅里审讯的。被准许进去旁听的有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外交使团和一批不时更换着的工厂和政府机关的代表。我坐在法庭里注视着整个故事的展开。一度是列宁的朋友和杰出的理论家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法官、听众和全世界说，斯大林上台后他们失去了权力，就阴谋通过间谍刺杀大概

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某些领导人来夺取权力。这些间谍如果被捕将不知道谁是最高的同谋犯，而只是以德国盖世太保的普通间谍面目出现。那时，主要的同谋者在名誉不受损伤的情况下，将号召“党内团结”来应付紧急情况。在混乱之中，他们将取得领导地位。他们中间有一个预定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巴卡叶夫，将把动手的刺客消灭掉，从而掩埋一切对领导人不利的证据。

这就是我在法庭里逐日看着它展开的故事。被告讲话很多，他们没有受过拷打的迹象。加米涅夫说，到一九三二年，清楚地看出人民已经接受了斯大林的政策，显然要通过政治手段把他推翻是不可能了，只能使用“个人恐怖”。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领导的极度不满和对权力的强烈欲望，这种权力一度已经接近落入我们手中。”季诺维也夫在法庭宣称，他已习惯于对大批的人发号施令，以致不这样做他就活不下去。次要的间谍供出了这个团体同盖世太保的联系。他们中间有一个纳·吕里叶自称曾“在希姆莱的私人代表弗朗斯·卫兹的领导下”工作。一些次要的角色显然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知道他们的头子为他们所安排的命运，这就使他们更加狠毒地攻击他们的上司。

被告兰哥尔德攻击同犯加米涅夫，他喊道：“不要让他装做这样清白的人吧！他原来打算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去夺取权力呢。”

这个故事是可信的吗？苏联境外的大多数报纸说它

是假案。列席法庭的大多数人，包括外国记者在内，却认为这是真实的。美国大使戴维斯在他的《莫斯科出使记》一书中说，他相信被告确是犯了被控的罪。著名的英国律师和议员丹·纳·普里特也同样地信服。太平洋学会秘书长爱德华·西·卡特写道：“克里姆林的案件是……非常真实的。它是合逻辑的……令人信服的。”即使赫鲁晓夫在对这个时期的过火行为作全面攻击时，他也没有说任何一件公开的审讯案是骗局。

当我常常是从近在咫尺的地方听着被告的发言时，过去的革命领袖转变为叛徒的这个过程，对我说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起初怀疑苏联人民没有外力帮助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在一九二四——二七年期间公开辩论过的。由于看到俄国的缺乏效率同德国人的有效率的组织之间的对比，他们的怀疑加深了。俄国的缺乏效率甚至造成了一九三二年的全国饥荒，而德国人的效率则是他们早已知道的。不难相信，俄国要是有了德国人那种用铁蹄强加的纪律，那就可以得到好处。在那些日子里，很多恼怒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①。最后总会发生德国革命的，他们自己可能从内部来推动它。同时，他们可以把

① 我在高加索曾听到一个发怒的农村妇女对一个官员叫嚷说：“让英国人来吧。让德国人来吧。让任何人来整顿一下这个该死的国家吧。”她没有被捕；那个官员设法平息她的气忿。如果一个城里的知识分子说了同样的话，他也许会被逮捕。

可恨的斯大林除掉。

如果我们承认第一批审判是真实的（有经验的外国观察家认为是这样的），那么就存在着一种足以驱使整个国家丧失清醒头脑的局面。他们不但受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他们自己的革命领导层似乎也已为特务所渗透，这些特务阴谋暗杀和推翻政府。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判罪以后，逮捕和审判的范围扩大了。工会中央理事会前主席托姆斯基被一名被告在法庭上告发而认了罪，并且为了逃避逮捕而自杀了。在高加索、中亚细亚和远东，开始了地方性的审判。在远东，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逃往日本，他的许多下属被作为日本间谍逮捕了起来。

下一步牵连到军队。军队的总政治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自杀。七月十一日，最近还担任国防人民副委员的屠哈切夫斯基元帅，同其他七名高级指挥官一道，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是第一个秘密举行的大审判。据宣布，被告供认他们为希特勒所收买，答应了帮助他夺取乌克兰。他们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的罪行为一些来自国外的消息所证实。《纽约时报》驻布拉格记者格·埃·鲁·吉地耶六月十八日电称，“两位布拉格的最高级官员”告诉他，他们“确知自从拉巴洛条约^①以来，德国总参谋部同某些俄国将领就有了秘密联系”。我自己后来也听到捷克官员们说，他们的军事人员

① 参见第九九页。——译者

曾首先得知并且通知了莫斯科：捷克的军事秘密被屠哈切夫斯基泄露给了德国司令部，这种秘密是根据互助同盟条约由捷克人供给俄国人的。

最使苏联人民吃惊的也许是终于把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雅哥达也拖进叛国审判的这个事实。当他作为叛国者被处死，许多保卫局官员以“逮捕无辜公民”和“用不正当手段逼供”罪被监禁起来以后，对政府侦察机关的怀疑就蔓延开来。究竟谁有罪，谁无辜呢？谁在逮捕谁呢？

一种缺乏安全的感觉在苏联人民中间蔓延开来，代替了一九三四年他们对进步感到的那种欢欣的情绪。这不单是由于，甚至不是首先由于，害怕自己被捕或是为朋友担心。这是因为知道敌人已经钻入领导上层，没有人知道谁是忠实的人。这是第一次一个国家同希特勒第五纵队致命的效率进行殊死的斗争。他们感到这是一场为争取国家生存的战斗，但却是一场暗中摸索的战斗。这场斗争的梦魇般的性质不但影响了人民，而且我认为也影响了斯大林。他拿出了一个理论：一个国家越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越多。

公开审判的那些被告远非唯一的受害者。那些年，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在全体苏联公民的记忆中是一个精神上非常苦恼的时期，这种苦恼是由许多不加说明的逮捕和这些逮捕引起的普遍猜疑所造成的。人们在夜间被抓走了，从此不知下落。有时他们也会重新出现。乔治·

安德列辛两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两次都很快回来并转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岗位上去。这样捕去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被处死，而是被送到罪犯劳动营，或是到远地去居住。这种“恐怖”的产生不是由于知道，而是由于不知道朋友们的命运。

我的最亲近的女朋友在结了婚搬到列宁格勒去以前，曾同我在一起住过几年，她被判决流放十年。九年以后，我在莫斯科又见到了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丈夫早已被捕，她从不知道他被控犯的是什么罪。她相信他是无辜的，就跑到保卫局去质问。这样，她自己也被捕了，定的罪名是“人民之敌的妻子”。她没有被送进劳动营，而是到了哈萨克的一个小城。她在当地的一个中学担任教员。每月她必须向当地保卫局的一个官员汇报一次，她同这个有头脑的人进行过“许多次有趣的讨论”。有好多回，他问过她对于自己被捕和她所知道的许多别的人被捕的看法。

她有一次回答说：“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纳粹第五纵队钻进了保卫局，而且钻到了上层，他们在逮捕不该逮捕的人。”她的讯问者回答说：“许多人有这样的看法。”他没有说什么样的人也有这种看法，他自己是否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理论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赫鲁晓夫所作的最骇人听闻的揭露，即在参加一九三四年党代表大会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中，后来有一千一百零八人被捕，而在

由这次大会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一百三十四人中，有九十八人即占全体百分之七十的人不但被捕，而且被枪毙了。把这件事归咎于斯大林的妄想狂的人，还没有能够说明，为什么一个妄想狂的患者甚至要消灭他的最有成就的和忠实的支持者。一九三四年的“胜利者大会”正是由坚持斯大林路线的人们所组成的，这个大会庆祝了社会主义在工农业中的胜利。这些人在三年之内被大批消灭这件事，只有在一种解释下才较为可信，即这是纳粹第五纵队企图消灭这个国家最能干的爱国分子的阴谋得逞的结果。

我亲身知道的一些案子可以支持这种看法，即被捕的常常是那些“不应该被捕的人”，这些人看来几乎是被专门挑选出来以达到瓦解的目的。我们的《莫斯科新闻》编辑部有三个人突然被捕了。如果要我们在我们的人中间挑选三个最有用、最积极的工作人员，那就是这三个人。他们是党员，一贯努力为报纸和工会工作，在赶任务的时候总是愿意工作到深夜。可是，人家还要我们编辑部去参加工会的一次会议，去“感谢政府清除这些破坏者”。我拒绝前往。我甚至就这件事向我们的总编辑提出了抗议。

他同意也许是有无辜的受害者。他说：“让他们向他们的苏维埃代表去进行交涉吧。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在处理许多这样的申诉。那些自知无罪并且进行斗争的人是会回来的。”所有的代表都在处理着选民的申诉，这是

确有其事的。我的选区的代表，著名演员卡察洛夫告诉我，这种申诉占了这一年工作的大部分。但并不真是所有无辜的人都回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在流放中死去了。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按照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时所揭露的，当时在党的上层领导中发生了什么事。他也认为过火行为开始于“罪恶地谋杀谢尔盖·基洛夫以后”，即发生于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八年。他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内，开始通过政府机构实行大规模的镇压……起先是镇压敌人……然后也镇压了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他透露，在紧接基洛夫被谋杀以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对法庭发出了加速调查、判决和处罚的指示。当时雅哥达是国家保卫局局长。斯大林发现他行动迟缓，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从索契打电报说，由于雅哥达不称职，应任命叶热夫为内务人民委员。叶热夫的任命和他的计划经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逮捕的数目立刻大增。赫鲁晓夫说，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间，逮捕增加为十倍。他说，施用了酷刑来逼供，这是斯大林授权的。在此以前，苏联人民曾以他们的监狱里不仅没有纳粹所使用的酷刑，甚至也没有象美国实行的那种逼供方法而自豪。

一九三七年是镇压高潮的一年。忽然，叶热夫不见了；谣传他已被送进疯人院。一九三八年初党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疯狂开始减退了。即使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人们也承认这是一种疯狂。我在四十年代中叶曾问

过保卫局的一个官员，一九三七年发生的某一案件能不能重新审查。他回答说：“一九三七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重新审查。”但一直到斯大林死后为止，成千的案件并没有重新审查。

赫鲁晓夫在确定一九三七年陷害好人的罪责时，曾作过一些断语。他说：“我们指责叶热夫应对一九三七年的暴虐行为负责，我们的指责是正确的。”可是他接着说，叶热夫准备了一些在没有审讯之前就决定了要予以判处的人的名单，并且把名单送给斯大林批准，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同意叶热夫是不能判处某些著名的受害者的。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有着病态的疑心。”他对所发生的事的确切总结是重要的：

“利用了斯大林关于越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会越多的这一论断，利用了二、三月间中央全会根据叶热夫报告所作的决议，钻进国家保安机关里的破坏者，同一些没有良心的机会主义者一起，开始以党的名义掩护大规模的恐怖手段。”

显然，事情并不简单是作为暴君的斯大林在拔除他的敌人。这是一种复杂的情况，是许多集团的行动的综合。斯大林的责任在于：由于“多疑和病态的疑心”——这对于一个自己的亲密朋友被刺并在公开法庭中听到暗杀自己的计划已订好了的人来说，并不是不自然的心境——他任命了叶热夫，下令加速调查和判决，并且创造了社会主

义接近成功敌人就增多的理论。后来被发现为疯子的叶热夫发出产生效力的命令。中央委员会相信了斯大林的论断和叶热夫的报告，也批准了这些行动。正如赫鲁晓夫所说，实际上的策动人是“破坏者”（纳粹法西斯间谍）同“没有良心的机会主义者”（那些捏造阴谋案件来谋求晋升的人）。

赫鲁晓夫的这一分析同我那位被流放的朋友的分析相差不大，我的朋友说纳粹第五纵队“钻进了保卫局机构的上层，逮捕了不该逮捕的人。”我把这个时期的行动叫作“大疯狂”，因为这些行动不是清醒的，但是有许多人参加了，并且还没有完全被了解清楚。我想，正在重新审查旧案的苏联调查员终于会把它们查个水落石出的。他们很可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纳粹第五纵队确实广泛地钻进了保卫局机构，在于确实有许多暗杀阴谋，以及在于这些事情对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所发生的影响，这个人看到了有人在密谋暗杀自己，并相信他是在用激烈清洗的办法来挽救革命。

如果以为在斯大林时代中，单是一九三七年左右苏联才出现过冤屈的逮捕和处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从革命初期一直到斯大林晚年，这种事情都曾以较少的次数发生过。在斯大林晚年，有一些医生被控阴谋损害苏联领导人的健康，似乎是在酷刑下招了供，后来被发现是无罪的。政治警察的专横权力是斯大林时代最大的祸害。这不是斯大林发明的，它是从沙皇时代的“黑百团”中产

生，并在列宁时代的“恐怖”中培育起来的。所有好的共产党员都说，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法律以外的工具来保卫革命。这样的恐怖曾经伴随其他革命而发生，其中包括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但是设立政治警察比废除它要容易。统治者发觉它有用，能够用来制止持不同政见的人。因此，在一九二二年本来准备把政治警察下放给地方政府领导时，斯大林却决定把它集中起来，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当我在苏联的那些年代里，曾经有三次决定要限制警察的权力，并且把国家保安机关置于法律管辖之下。每一次名称是更换了，但是权力还保留着。这种警察成了国中之国，它的利益就在于发现“阴谋事件”，有些阴谋事件也的确是存在的。这样的警察具有另一种危险，由于它的成员是秘密的，它成为第一个被敌性破坏者钻进去的组织。

是否需要任何政治警察呢？苏联人民似乎感到有此需要。我的丈夫听到我最好的女朋友被流放的时候，他只说：“她不得不受这样一个丈夫的连累，真是太不幸了。”

其他的俄国朋友甚至持有更加狠心肠的看法。我记得有一个人主张，如果政治警察抓到一百个嫌疑犯，知道其中有一个是危险的叛徒但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的话，他们应该把这些人都杀掉，而且那九十九个无辜的人应该宁愿死去而不让一个叛徒活着。

当我向编辑主任抗议我们的三个工作人员被捕的时

候，他对我讲了一番更加概括性的话来说明为什么苏联人民没有提出抗议的道理。

“你为什么不看一看基本的形势呢？我们的主要经济学家认为，全世界将在一九三九年左右遇到危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大斗争就要来到了。这个斗争将决定世界是沉沦到奴役和战争的黑暗时代，还是人类将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这个斗争中，哪里有可靠的基础呢？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尽管我们的技术落后，也许拯救世界文明的责任就落在这个国家的身上。人类的破坏力增长得很快，半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回到中世纪。过去的文明也曾经衰落过。对于即将来到的世界危机，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强大来对付它，拥有尽可能多的小麦，尽可能多的健壮的人和尽可能少的破坏者。我们正在做这件事。只要完成两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些怀疑或从中阻挠的人，不但是苏维埃国家的叛徒，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叛徒。”

这些话很有份量，使我哑口无言。这些话是米歇尔·姆·鲍罗廷说的，他在一九四九年大约和我同时被捕，并且死在远东的一个劳动营中。

* * *

世界上有有什么足以防止冤屈的保障呢？有的是得来不易的西方的民权——“一定的诉讼程序”、“人身不可侵犯权”、“陪审制度”等等代价很高的权利。这些权利是

穷人不容易得到的，并且是俄国人从来不曾有过的。一九三六年的斯大林宪法许诺了比这还要多的权利，但在同一年却被这个宪法的作者自己违反了。他还认为他这样做是在拯救革命（甚至他的主要诋毁者也是这样说的）。我想，俄国人所得出的结论是对的，不应该象神化斯大林那样把任何人神化。诚然，他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甚至一九三七年的大疯狂也是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批准的。但这是未经一个勇敢的反对派的考验而得到批准的；所有表示过同意的人都同斯大林一起负有责任。世界上没有完善无缺的公道。永远警惕是获得自由和公道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甚至更是如此。赫鲁晓夫演说的价值不仅在于继这个演说之后，政治警察的权力受到了法律的限制，而且在于它使苏联人民大吃一惊。知道真实情况的人民对于冤屈经常保持警惕，这才是唯一可靠的保障。

在大疯狂中，苏联人民学会了某种警惕性。这是俄国人需要学会的东西。当时报纸上充满了诉诸“人民的警觉心”来抵制间谍和破坏者的呼吁。“不要在公共车辆上谈论你的工厂，你也许会提供有助于敌人判断我们企业的位置和估计它们的重要性的情报。”人民听从了这些呼吁；快活和爱说话的俄国人变得对外国人沉默了。我记得我曾为一家美国杂志写过一篇关于“我的苏联女儿”的文章，描写了我的继女喜爱她在那里工作的化学工厂的

情况。我的丈夫要我把它改作一个发电厂，以免我泄露离我们家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个化学工厂。

另外两件私人轶事说明这个时期对人民的心理起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一次“五一”游行之前，我听说有几十个美国人很着急，因为他们为了看游行来到莫斯科，而红场上的观礼台却没有空了。我向“国际旅行社”建议，他们可以同《莫斯科新闻》的工作人员一起游行经过红场。“国际旅行社”的代表回答说：“我们表示感谢，但是你是否充分了解他们，能保证他们不带手枪和炸弹？”这就完了。所有的记者都知道，在这种游行检阅时，斯大林是站在多么显露的地方。我早已知道东欧国家的间谍常常装作“美国游客”来到苏联。对于这些未曾谋面的美国同胞，我拒绝一律予以担保。

那年夏天我曾在莫斯科河岸的小城郊菲立附近避暑。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大工厂，因为我看到过成千的菲立工人的游行队伍。过了几年，在德苏战争开始后，我在纽约一份报纸上读到著名的六引擎轰炸机就是在那家工厂制造的，这种轰炸机比得上并且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的“空中堡垒”。如果这是事实，我想每一个菲立工人一定曾是多么想在我这个美国人面前夸耀它的。可是从来没有有人这样做过。

这种沉默对俄国人来说是不自然的，对他们的朋友来说也不愉快。但在那些年，这也许有决定生死存亡的价值。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临到苏联的时候，世界各国看到在苏联希特勒第五纵队是相对地少，而它却曾推翻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霍华德·克·史密斯评论道：“如果俄国不曾清洗掉几千个文武官员，无疑红军在两个月内就已崩溃了。”^①这是别人的判断，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知道苏联人民之所以忍受了那些疯狂的年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准备着决死的防御战，相信他们已在同一个隐蔽的敌人进行搏斗，并且相信每消灭一个叛徒就可以在以后挽救成千人的生命，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种在黑暗中同高踞领导地位的敌人作着斗争的感觉，使这些年代具有梦魇的性质。

^① 霍华德·克·史密斯《从柏林开出的最后列车》第三二五页。

第六章 争取和平的斗争失败了

一九五五年初，在莫斯科撤销了对我的指控后的那个轰动一时的短短期间，我曾多次在电视节目中回答问题。几乎每个采访记者都问我是否认为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领袖真的要和平。他们显然感觉到，这个问题对听众说来是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人们对它存有疑问的问题。

每次我都回答说：“他们要和平，比任何美国人更渴望和平。任何苏联领袖，如果苏联人民不相信他是在促进和平的话，是不能继续执政的。这里，在美国，战争使人繁荣；失去儿子的家庭是不多的。在苏联，每个家庭都受过重大的损失。他们都曾挨过饿，许多人失去了家，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家庭都丧失了一些男人。曾有二千五百万人无家可归。每个苏联人都感觉到弥补损失的工作是何等沉重。”

令人惊奇的是，美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一无所知。这种对和平的渴望从十月革命就开始了，十月革命本身就是由于厌倦战争而产生的，它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革命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颁布的第一个正式法令，就是“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议，立刻谈判不兼并和不赔款的、正义民主的和平”。这句话后来由于威尔逊总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借用而成了名言。

当时无论是威尔逊也好，英美协约国或德国人也好，都没有让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得到和平。协约国甚至谴责布尔什维克提出这个建议；他们要求俄国继续作战。在无法作战的情况下，列宁不得不同德国单独缔和。用列宁的话说来，这是“强盗的和平”。根据和约，德国占领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国。德国打败后，协约国战胜者和德国还继续同俄国打了两年仗。

在那些日子里，俄国人是这样渴求和平，以致列宁有一个时候甚至愿意分裂俄国来换取和平。一九一九年三月，威廉·克里斯琴·布利特以威尔逊总统的半官方代表的身份到莫斯科，建议将俄国的领土按当时各地方政府所据有的地区割裂开来。这意味着在远东建立一个日本傀儡政府，在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北冰洋各港口设立英、法的属地。列宁甚至同意这种骇人听闻的勒索，因为俄国人正在因饥饿、瘟疫和战争而死去。但是那许多傀儡政权不同意这种做法，而且参加凡尔赛会议的列强也不肯让布尔什维克得到和平。他们想彻底消灭布尔什维克。

和平不是靠呼吁或割地的办法，而是靠俄国人民的勇气和牺牲赢得的。真正的和平来得很慢：首先是停止

真枪实弹的战争，然后是缔结贸易协定，然后——经过许多年之后——才有外交上的承认。最后的两次武装进犯是一九二〇年波兰人在法国支持下发动的进攻，和一九二〇——二一年芬兰人在曼纳海姆男爵领导下，得到德国和协约国双方帮助发动的进攻。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十月，日本人才被赶出海参崴。一直到一九三三年，美国在罗斯福任内才承认了苏联。

这个新的国家在一九二二年的热那亚会议时才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协约国想把战后的经济负担加在德国和俄国身上，因此把这两个受害国召来。苏联马上提出了限制军备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团长齐切林说：“只要欧洲和世界笼罩在新战争的威胁中，恢复世界经济的力量便将被扼杀。”齐切林在得不到响应之后，便和德国签订了著名的拉巴洛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会议的这两个弃儿“在平等的基础上”恢复了友好关系，并且相互撤销了对方的债务。这是简单、正派而有效的做法，是各国第一个帮助德国人重新站立起来的行动。那时德国正企望着民主，如果其他国家也象苏联那样做，希特勒德国可能永远不会兴起。

苏联外交就这样带着两项政策大步跨上了世界舞台，这两项政策就是：通过限制军备达到和平；同有困难的国家建立平等关系。这种政策是从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和苏联本身的需要产生出来的。苏联强烈地渴望和平，和平将带来重建家园的机会。和平受到的最大威胁是各

大国的贪婪无度；因此苏联的盟友自然是那些战败国或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苏联首先寻求在它的四邻建立和平，其次，尽可能地寻求世界和平，因为任何地方的战争都有扩大的可能。

苏联外交代表李维诺夫大声疾呼说：“和平不可分割”。他出席了许多国际会议，并且宣告说，裁军的办法就是裁军，这使旁的外交家们很为尴尬。

苏联第一个在美国建议的凯洛格非战公约上签了字。它经常是在任何和平建议上首先签字的国家，有时在未被邀请之前就签了字。李维诺夫得到一些和平组织的赞扬，但是没有能够怎样影响大国的政策。不过许多较小国家的政府却从苏联的外交中得到好处。土耳其之所以成为一个现代的独立国家，部分是由于苏联在一九二三年洛桑会议上支持了它。现代中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处在台湾的日渐消逝的力量在内——是由于苏联在二十年代初期给予孙逸仙博士援助而兴起的。

芬兰的独立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所直接给予的礼物。当沙皇被推翻后，曾是俄罗斯帝国一部分的芬兰要求获得独立。克伦斯基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无论英国、法国或美国都不愿芬兰独立，因为芬兰独立将意味着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沙皇帝国的解体。布尔什维克一得到政权以后，当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就提议满足芬兰的要求，他说：“既然芬兰人民肯定地要求独立，无产阶级国家不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希特勒的兴起改变了全欧洲的政治力量对比。历年来，苏联一直支持德国关于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要求，认为这是个会挑起战争的坏条约。但是希特勒比凡尔赛条约更能挑起战争。德、日退出国际联盟后，苏联就抱着建立反侵略的集体协议的公开目的参加了这个组织。从那时起，李维诺夫便努力寻求把“民主力量”结成联盟来遏制纳粹的战争倾向。

但是，以张伯伦为首相的英国却扶植了希特勒，把十年来拒绝给予德意志共和国的东西一下子全都给了希特勒，这些东西就是：重新武装莱茵区、在纳粹恐怖下在萨尔进行公民投票、德国重整军备、扩充海军、希特勒—墨索里尼共同干涉西班牙。英国金融集团以前曾索取巨额赔偿，从而窒息了德国的民主，现在却用投资和贷款来帮助希特勒。世界上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英国保守党之所以给希特勒这些好处，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反苏运动中的“打手”。假如对英法外交部当时的目的还有任何怀疑的话，慕尼黑会议使这些怀疑烟消云散了。嘲弄全世界的、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一举是他们诱使希特勒东进的王牌。

任何人象我那样注意英国在那些日子里的一举一动，就可以看到张伯伦虽然谈的是“安抚”希特勒，实际上却是在怂恿他。在德国还没有人敢要求获得捷克的苏台德区之前，张伯伦就建议把这个地区给希特勒了。当捷克人民似乎宁可作战而不让希特勒长驱直入时，英、法驻

布拉格的大使使用那已经谋害了西班牙民主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来威胁贝奈斯总统。纳粹军队最后占据了捷克的土地，那时人们获悉，伦敦的金融资本家们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同德国工业家达成协议，由他们来出钱资助被这样掠夺得来的企业。

苏联是唯一建议援助捷克人抵抗这次出卖的盟国。慕尼黑会议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北高加索的一个休养地休假。听说捷克人要进行抵抗，大家便都愉快地表示赞同。有几个军官预定了到莫斯科去的飞机票。他们说：“我们可能要去援助捷克人。”后来，消息传来，说贝奈斯在英法压力下屈服了。于是预定的机票也退掉了。一个军官在吃饭时对我说：“我们现在不能做什么了。还不如休息，好准备对付下一次侵略——对波兰或者法国的侵略吧。”

他们讨论了出卖捷克的幕后势力。为什么张伯伦和达拉第愿意牺牲二十七个捷克师和欧洲的一条最好的防线？什么东西使他们把欧洲的一个最好的兵工厂——斯科达工厂送给希特勒？他们是有意识的叛变，还是软弱？一个地方企业的经理说：“你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他们害怕布尔什维主义。”

希特勒的侵略魔手接着迅速东进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军队横蛮地违反协议开进解除了武装的布拉格。苏联通知德国说，它“不能承认”这种侵占捷克土地的行为。它向英国建议马上召开英、法、波、罗、土、

苏六国会议来抵抗进一步的侵略。张伯伦回答说这个建议“时机尚未成熟”。看到这一个信号后，希特勒便夺取立陶宛的主要港口麦默尔并威胁波兰在波罗的海的出口但泽。到四月中旬，有七个德国师驻在波兰国境上等候着向前进的命令；挑衅事件增加了。美国国务院接到它在欧洲的代表报告说：“法国最高级官员估计战争的可能性是十比一。”

英法舆论要求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制止希特勒。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说：“同苏联团结可以挽救和平。”法国前空军部长皮埃尔·戈特说：“俄国的援助对民主国家是极为重要的。”四月间，在英国人中间进行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是：百分之九十二的人赞成同苏联结成联盟。苏联曾几次建议缔结三国联盟来保证东西欧免受纳粹侵略，每一次建议都受到张伯伦政府的冷遇，经过拖延后，建议便被拒绝了。张伯伦宁可同希特勒取得协议；在五月三日他说他准备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使英国下院大吃一惊。两天之后，他拒绝了苏联关于缔结军事联盟的建议。

连保守党员也开始抗议张伯伦的做法。五月七日，邱吉尔在下院要求同苏联结盟。在这种压力下，英法驻莫斯科大使终于在五月二十五日接到指示，要他们同苏联“谈判”结盟事宜。自从捷克斯洛伐克受蹂躏以来，十个至关紧要的星期已经白白过去。接着又有三个星期浪费在等待一位名叫斯特朗的先生抵达莫斯科。这位英国

外交部派来“处理谈判”的代表到了，但却无权签订任何东西。“谈判”继续进行了一百零五天，其中英国人用了五十九天去写建议，而被认为缓慢的俄国人却只用了十六天。苏联人显然要赶紧办事；英国人显然要拖延。后来莫斯科突然获悉，英国海外贸易部政务次官已经在同一个德国官员商谈一笔五亿或十亿英镑的贷款。

在莫斯科的领导人看来，英国显然不是在开玩笑，便是在设法把战争推向东方。他们害怕战争被强加在他们头上，不仅是同希特勒单独作战，而且要同得到英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支持的希特勒作战，这种战争是他们一向害怕的。英国大多数人受到谈判的哄骗，以为协议正在趋于达成。劳合·乔治眼光比较敏锐，他说：“世界正在巨大的悬崖边上颤抖着。”

莫斯科曾两次向英国人民示意，谈判毫无进展。第一次是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五月三日的辞职。十年来，他对全世界已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通过反侵略的集体协议建立和平的计划。莫斯科用李维诺夫的辞职来说明，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在满洲，在阿比西尼亚，在西班牙，在中国，在奥地利，在阿尔巴尼亚，在捷克斯洛伐克，在麦默尔，它都失败了——由于西方民主国家政府首脑对侵略者的绥靖或鼓励，这个计划遭到了八年的失败。这就是李维诺夫辞职所给予的信号，但是西方报纸惯于把苏联的事务等闲置之，以致认为李维诺夫必然是因为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清算了。

六个星期后，莫斯科又发出另一信号。最高苏维埃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七月二十九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同英法进行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认为不论英国或法国都不想同苏联结盟，也不准备制止希特勒，它们可能仅仅是为了要在希特勒准备攻击俄国的时候使俄国人保持安静才进行谈判的。这篇文章在国外曾引起暂时的轰动，但是多数评论家都认为日丹诺夫是个鲁莽的人，他说的话不算数。

七月底，所有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都知道希特勒打算在一个月內夺取波兰走廊。这时，苏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建议英法两国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规划共同保卫东欧事宜。英法两国的代表团等了十天才出发，而且采取了需要走最长时间的路线。当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发现他们原来无权同意任何东西。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带领着一批出色的苏联高级将领向英法代表团提出了认真的建议，但英法代表团并没有权力接受任何建议。伏罗希洛夫建议，假如希特勒攻打波兰，由苏联派遣两支军队，一支在北部攻打东普鲁士，一支通过波兰南部攻打德国的中部。英法代表团回答说他们必须征求华沙对这个建议的意见。后来他们通知说，波兰政府拒绝了苏联的援助。曾经不惜用威胁手段迫使捷克人向希特勒屈服的英法，现在倒不肯使用任何压力来促使波兰人接受苏联的援助了。

谈判就此破裂了。伏罗希洛夫在八月召开的最高苏

维埃会议上报告时，把英法的做法称为：“轻浮的假谈判。”

这样苏联便作出自己的决定。希特勒曾建议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后来在向苏宣战时承认这个建议是他提出的）。八月二十三日，苏德签订了这个条约。这不是苏联向英法建议的那样一种盟约，而仅仅是一个申明中立的条约，其实苏联和德国从一九二六年起就有了这样的条约，只不过在希特勒上台后被弃置一旁罢了。莫洛托夫说，苏联之所以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不能期望（同英法两国）缔结互助条约”。

正当欧洲每时每刻等待着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苏德条约的签订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东欧最初的反应是良好的。保加利亚来的消息说：“紧张局势缓和了。”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来的电讯说：“既然我们的两大邻国已经协议维持相互间的和平关系，波罗的海沿岸的紧张局势缓和了。”波兰外长认为局势“无改变”，因为“波兰从来没有指望苏联的援助，而且也不要这种援助”。东欧国家显然希望苏德条约即使不能制止希特勒进攻波兰，总可以阻止战争向东扩大。

希特勒的盟友则大发雷霆。墨索里尼和弗朗哥公开表示不同意。这个条约对东京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日本已经在蒙古边境同苏联作战，据说它并曾告诉希特勒它在八月就可以参加“大规模的推进”。在对德国同苏联签订这个条约的激烈谴责声中，日本内阁倒台了。伦敦的

支持希特勒的保守党员脾气发得最厉害。他们第一次叫唤要索取希特勒的命。但是在张伯伦政府中希望和习惯很难于改变。其后十天中，甚至在希特勒进军波兰之后，张伯伦仍然寻求召集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四国（英、法、德、意），来商讨同希特勒取得协议以解决波兰命运的问题。只是在这种尝试遭到拒绝后，张伯伦才同波兰签订了久经延搁的同盟条约，并且敦促波兰进行抵抗。

波兰人怎能进行抵抗呢？英国没有送来援助。波兰空军两天之后便不起作用了；两星期内，有组织的波兰军队已不复存在。波兰政府已经逃到罗马尼亚边境上的某地，只留下英勇的华沙市长把一些宁死不屈的市民召集起来进行最后的抵抗。本来唯一能够及时赶来的援助是苏联的援助（甚至给予这种援助的诺言原就可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犯），但是这种援助受到一个憎恨布尔什维克甚于憎恨希特勒的波兰政府的拒绝。英国顽固分子在保守党报纸上没有表示希望拯救波兰，反而仍旧希望在东欧的废墟上“把战争转向”苏联。

在这个波兰解体的悲惨时候，一个苏联外交家曾对我说：“要是没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现在就会受到德、意、日同盟从欧洲和亚洲两面夹攻。英法会据守马奇诺防线并且资助希特勒。美国会成为日本的兵工厂来反对我们，就象它反对中国那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我们就在希特勒、日本和支持希特勒的伦敦人士之间引起了矛盾。要制止对波兰的入侵已经太迟了。张伯伦甚

至没有尝试这样做。可是我们已经分裂了法西斯世界阵营，我们将不需要对整个世界作战了。”

这样，通过组织民主力量之间的集体协议来争取和平的长期斗争宣告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但是苏联由于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赢得了差不多两年的喘息时间。不仅如此，它还使希特勒在整个战争期间和他的西方支持者发生分裂。

第七章 使希特勒止步的条约

“华沙，作为波兰国家的首都，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人知道波兰政府的下落。波兰已经变成了可以对苏联形成威胁的偶发事件的肥沃土壤。”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莫洛托夫在给波兰大使的照会中和以后对全世界的广播中，用这些话宣布了红军正在向波兰进军。

对这次进军的意义英国人比美国人认识得清楚一些。美国人到现在还把斯大林说成是希特勒冷酷瓜分波兰的“帮凶”。但是邱吉尔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的广播中说：“苏联人已经在波兰东部挡住了纳粹分子；但愿他们是作为我们的盟友而这样做的。”萧伯纳在《伦敦时报》上对斯大林“欢呼三声”，因为他使希特勒遭受到“他的第一次挫败”。连张伯伦首相也在十月二十六日不好意思地对下院说：“红军占领了波兰的一部分来防备德国，这是必要的。”当时经罗马尼亚逃走而在几个星期以后到达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从来没有敢于把苏联这次进军宣布为战争行为。

当地居民并没有反对苏联的军队，而是高兴地欢迎了他们。许多人并不是波兰人，而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美国大使比德尔报告说，人民接纳了俄国人，认为他们是“在执行警察任务”。据新闻报道说，前进的俄国军队同撤退的波兰军队并肩而行，乌克兰姑娘们给俄国坦克挂上花环。利沃夫地方的波兰守军司令曾经接连几天对三面进攻的德军作战，而当红军从第四方面出现时，很快就向红军投降了。他说：“现在已经没有波兰政府可以对我下命令了，而我也没有奉到命令要对布尔什维克作战。”红军后来所发表的伤亡数字——死七百三十七人，伤一千八百六十二人——表明虽有抵抗，但只是遭到小股部队的抵抗。这些伤亡中许多是在攻取维尔那城时发生的，当时有一支不大的摩托化部队奉命从七十英里以外“在午夜以前到达维尔那”。

美国人认为斯大林和希特勒事先已约好瓜分波兰，这种看法并没有为瓜分实际进行的方式所证实。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分界线，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一次会议上确定以前，曾经变动过三次。看来德国军队不会路远迢迢地打到了利沃夫城并且进攻了好几天，只是为了把它交给苏联人。而如果维尔那城事先已经划归俄国人的话，他们也不必急急忙忙地向维尔那进军，从而遭致了伤亡。看来苏联可能曾经声明对波兰的非波兰人地区表示关心，但实际发生的这次进军却并非事先协议好的。

东欧的看法认为，希特勒原来打算不仅要占领波兰，

而且要往东南插到巴尔干，还可能要往东北插向波罗的海各国，尽可能地深入，把利沃夫城当作纳粹乌克兰的首府。德国人的战略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在粉碎了波兰前线以后，德国人并没有停下来收拾波兰战场，而是横扫波兰向前进军，朝东南到利沃夫，朝东北到维尔那。据说罗马尼亚的“钢铁近卫队”曾经计划举行广泛的暴动以迎接德国军队的到来。德国军队接近时，卡利奈斯库首相就被刺杀了。靠近波兰边境的一个罗马尼亚城市确实爆发了暴动，然而一看到河对岸是俄国军队而非德国军队时，暴动就消沉下去了。这些事情都是证明。

据九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的电讯说，伦敦方面认为“苏联人的行动已经制止了希特勒对于罗马尼亚所抱的任何野心”。九月二十七日美联社从东欧发出的一条电讯说：“对俄国的尊敬已经大大增加了；毫无疑问，农民们宁愿要俄国人而不要德国人呆在他们的边界上。”

所以，向波兰东部进军这件事看来并非同希特勒狼狽为奸，而是苏联根据互不侵犯条约加于希特勒的第一个重大的约束。这件事是在最恰当的时机做的。要是早半天的话，就有可能在波兰某地发现一个波兰政府仍然在行使着足够的职权，可以宣布俄国这次进军是一项战争行为，从而使俄国对波兰的盟国英国进入战争状态。要是晚半天的话，俄国人可能就会发现德国人在南方已经溜进了罗马尼亚，在北方已经溜进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红军正好是在波兰政府已经逃走，下落不明，而德军

还没有攻占战略要地利沃夫和维尔那城的那个半天进军的。

从那个时候起，俄国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给予的喘息机会，不仅准备了防御，而且也通过战争以外的一切措施来阻挡德国人渗入东欧各国。希特勒后来在他对苏联的宣战书中透露了这一点，并且极为愤恨地列举了俄国人阻挡他的那些行动。

莫斯科的头一个措施是通过缔结一些同盟的办法沿着俄国的西部边境建立一条很宽的缓冲地带。在把二十年前波兰违背国际联盟的意旨而夺走的立陶宛故都维尔那交还给立陶宛，从而打下了友好往来的基础以后，莫斯科邀请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派遣它们的外交部长到莫斯科去讨论缔结一项同盟的问题。他们分别来到莫斯科并且在文件上签了字。到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离苏联人把军队开进波兰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已经同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结成了军事联盟，而这三个国家过去曾经是敌军入侵的大道。原来是彼得大帝建造的一系列强固的海军基地，就这样归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虽然大多数美国评论家谴责这种行动，但是沃尔特·李普曼抓到了问题的所在，他说：“一天一天更加清楚，俄国正在建立一片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黑海的巨大的防御地区。”波罗的海各国本身对于英美报界加给它们的“仆从”一语表示愤慨。它们认为它们过得并不坏。它们的内部组织当时并没有受到影响；它们不过是给了俄国人一些基地，

以换取对它们的防务的帮助。

随之而来的是戏剧性地把五十万日耳曼人从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驱逐出境。希特勒的宣战书中表明了他对这件事多么切齿痛恨，他说：“远比五十万为多的男女被迫离乡背井。对这一切，我保持了缄默，因为我当时不得不如此。”这并不是一个心满意足的胜利者所说的话。波罗的海日耳曼人是那些波罗的海国家中的上层，其中有一些人几世纪来一直都是食采邑的贵族。在俄国革命时，就是这些人把德国军队引进来推翻当地的红色政权的。驱逐了他们，也就驱散了对苏联最危险的欧洲方面的第五纵队。

在保障了南波罗的海地区不受突然袭击之后，莫斯科就开始同把着北方门户的芬兰进行接触。虽然芬兰的独立是俄国革命的赠物，然而芬兰却是波罗的海国家中最敌视苏联的。早年的民主芬兰已被前沙皇将军曼纳海姆侯爵依靠德皇军队的帮助血腥地推翻了。芬兰已经成为反苏国际行动的一个基地。曼纳海姆防线——设计得很好的、可以在进攻列宁格勒时掩蔽大军的一系列碉堡——是在英国人指导下修建的。后来，芬兰的机场又是纳粹所建筑的。当时芬兰只有一百五十架飞机，而这些机场却足以容纳两千架，因而它们显然是为了一个大国的使用而设计的。

莫斯科知道芬兰不会欢迎缔结同盟。然而苏联人是有交换条件可提出的。芬兰当时的对外贸易由于英德战

争封闭了波罗的海而遭到破坏。为经济萧条所袭的芬兰要求同苏联贸易，并且想要利用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铁路来外通世界。因此，当莫斯科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邀请芬兰派遣全权代表讨论“未决问题”时，其后果是出乎意料的。芬兰政府在答复之前先宣布了局部动员，派遣了大批武装部队到边境上去，关闭了股票交易所，要求妇女儿童撤离首都赫尔辛基，并向美国呼吁给予“道义支持”。苏联报纸对于这种“有意制造的惊慌”表示了讥讽和不满。

芬兰代表团在十月十一日抵达莫斯科。苏联人提议缔结同盟，但由于芬兰人不愿意而放弃了。随后他们又提议交换领土以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他们要求把边界后移，使列宁格勒处于大炮射程之外，并要求把一些屏障海道的小岛让给苏联。他们提出以同样富庶只是战略意义较小而面积大两倍的领土来交换。他们还要求把汉哥或者处于通到列宁格勒的狭长水道芬兰湾入口处其他一个地点租给苏联三十年作为海军基地。芬兰的卡詹德尔总统广播了一项声明，认为这些条件并不影响芬兰的主权完整。

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月，莫斯科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了。芬兰在领土交换中将得到差不多三与一之比的便宜；汉哥基地的租让期将不是三十年，而是只到英德战争结束就可连同全部设施交还芬兰。许多芬兰人当时都在吹嘘他们的外交代表所要作成的“漂亮生意”。然而，芬

兰的谈判代表突然中断了会谈，并且神秘地提出什么情势将会决定会谈在什么时候以及由谁来予以恢复。《纽约时报》报道说“华盛顿外交人士”认为芬兰人是受了能从美国得到贷款的希望的影响。由于芬兰国会并未召开，莫斯科认为这表明，芬兰内阁是在西方想要“转变战争方向”的势力的秘密压力之下这样做的。

所以，在十一月末芬兰越境开炮并杀死红军士兵时，莫斯科就提出强硬抗议；芬兰对抗议置之不理，苏军就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入芬兰。芬兰随即宣战并呼吁外援。国际联盟指责苏联“侵略”，将它开除。苏联所采取的行动中很少有比苏芬战争使它失去更多的朋友了。俄国人自己也并不以此自豪；谁也不会以打先发制人的战争而自豪的。俄国人认为这是为了保卫列宁格勒而打的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

为了了解苏芬战争，我们必须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来加以观察，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在一九三九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不是全面战争。希特勒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巩固战果。俄国的推进已经阻止了希特勒在东方的进一步的计划。希特勒和西方之间彼此还没有认真地打过仗。西线处于当时所谓的“假战”状态；双方都蹲在自己的防御工事里面。希特勒还没有准备好向西的全面出击，要组织这一攻势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希特勒也明白，在英法上层阶级中有他的朋友，这些朋友可能接受他的条件。英、法、美报界的重要喉舌

竭力主张：已经开始的乃是“错误的战争”，战争应该转向更大的敌人苏联。

这一宣传攻势并不是由芬兰战争引起的。它甚至早在希特勒在波兰境内推进时就开始了；它是张伯伦路线的继续。因此在芬兰破裂谈判时，莫斯科就设想芬兰人计划在冬季制造一连串事件，使边境处于动乱状态，以便导致强国在春季来进行干涉。瑞典外交部长根瑟在战后为瑞典的中立政策辩护时曾经解释说：“出兵援助芬兰的想法为盟国开辟了新的前景。西线的僵局是不得人心的，法国报界当时已在谈论寻找新的战场了。”

在那年冬季的后一段时间中，西线战事一直不是头版新闻。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芬兰战争和西方想把它变成对苏联合进攻的企图上。莫斯科的目标是想在主要列强进行干涉之前结束战争。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在军事和政治上都犯了错误，但并没有像美国评论家所设想的那么多。

这个战役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在于把边界推得离列宁格勒远一些，并夺取芬兰的北冰洋港口，以便世界战争不致经过芬兰涌入苏联。这一目标在两星期中就达到了。陆地上的边界从列宁格勒推远了四十英里，芬兰的北冰洋港口佩萨莫也夺了过来。第二阶段由于遇上了几十年来最冷的冬季而比较沉寂。第三阶段是空袭芬兰的军事设施——兵工厂、铁路、港口、机场等。平民的伤亡很少。芬兰宣布在整个战争中由于空袭而死亡

的平民只有六百四十人。

第四阶段是突破曼纳海姆防线——“在某些方面比马奇诺防线还坚强的”^①碉堡群。尽管它被认为是无法攻破的，但却在一个月内就被一项精明的计划所突破了。这是第一次这样坚强的防线为突击所攻克。首先是用重炮轰击防御工事四周的土地，以打乱防线上的炮位，然后就直攻防线本身。曼纳海姆防线粉碎之后，芬兰的抵抗就垮了。和约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在莫斯科签字。

伦敦和巴黎曾竭力阻挠那次签字。英国拒绝转达芬兰的求和，因而瑞典当了中间人。法国总理达拉第告诉芬兰说，一支英法远征军已经整装待命，准备前往救援，而如果芬兰人不申请救援，盟国就连芬兰在战后的继续存在都不愿保证。张伯伦和达拉第压迫瑞典同意让这支远征军过境赴芬，虽然这将使瑞典也卷入战争。三月十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说，他正在考虑打破瑞典的中立和迫使芬兰战争继续下去的办法。三月十一日《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说：“伦敦盛传将发生具有更广阔的战线的战争，也许是对俄国的战争。”

这种谣传来得太晚了。由于瑞典坚持了中立以及曼纳海姆将军低估了苏联的兵力，“转变战争方向”使之成为全世界联合反苏大战的企图失败了。曼纳海姆曾经告

① 见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四日《纽约时报》詹姆斯·奥尔德里奇所撰文。

诉英法盟国，他在五月之前不需要援助；而张伯伦原期望到那时就可以迫使瑞典同意军队过境。芬兰人和英国人都梦想不到，曼纳海姆防线在冬季进攻中就会被突破。在曼纳海姆预定援军到来时刻之前两个月，芬兰人就求和了，苏芬战争就此结束。

在和约条款中，苏联人取得了曼纳海姆防线和汉哥海军基地，从而在陆地和海洋上防御了通向列宁格勒的通道。但是他们归还了佩萨莫及其镍矿；他们不但没有要求赔偿，还同意供应粮食给饥馑的芬兰。作为和约条款，这不算苛刻。一九四〇年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曾在一次使馆茶会时告诉我说，俄国人可能有一天会后悔他们在可以做到的时候没有取得更多的东西。他想到的是佩萨莫，这个地方不久之后就成为了阻挠盟国船只开往摩尔曼斯克的纳粹基地。然而，克里普斯爵士错了；斯大林的政治感比他强。苏联人提出容易接受的条件是英明的。如果他们提的条件超出列宁格勒安全的明显需要的范围，瑞典的中立就可能发生动摇。要是那样，最后形成为反对希特勒的世界统一战线可能早一年就形成为反苏的统一战线了。

芬兰战争也在芬兰境外获得了胜利。从进军波兰到同芬兰签订和约这一系列的苏联行动，使东欧信服苏联是强大的，而且知道苏联所要的是什么并且会认真到不惜用战争来得到它，同时苏联的要求又是有理有节的。在一九四〇年苏联所明显要求的一件事，是从波罗的海

直到黑海的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

因此，罗马尼亚知道把比萨拉比亚归还给苏联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块地方是它在一九一八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还软弱无力的时候从它那里夺过来的。比萨拉比亚的居民不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在六年中曾掀起过一百五十三次反对罗马尼亚的起义。苏联从未承认过这一夺取，但也不认为值得为此一战。苏联为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已经等了二十年。在希特勒忙于征服法国的时候，莫斯科向罗马尼亚索还比萨拉比亚，而且不经战争就得到了它。俄国的船只重新又能驶进多瑙河了，多瑙河三角洲的一道河汊成了苏联的国界。

这样，当希特勒从蹂躏西欧转向东方的时候，从波罗的海的海岸的汉哥直到黑海岸的多瑙河口这一跨越欧洲的绵长的缓冲地带已经完成了。

* * *

根据希特勒的说法，苏联的进入比萨拉比亚挽救了英国，使它免于遭到德国的入侵。希特勒的话有点夸大，并且是在为他入侵俄国寻找借口，但是他的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过头去看一看西线的战事。

在芬兰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由于上面已经谈过的原因没有认真地进攻西方。但是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国人对西方发动了迅速的、胜利的闪电战；他们占领了丹麦、挪威；攻破了荷兰、比利时，在十一天内粉碎了

法国的陆军。德国人占领了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做好了入侵英国的准备。由于在法国吃了败仗而溃散的英国军队，已经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丢弃了他们最优良的装备。那年夏天，我在去莫斯科的路上经过柏林，发现德国人在吹嘘他们在初秋就会到达伦敦。各国的军事专家都预期着这个入侵，而且大多认为英国的防御力量是不足的。英国的黄金储备撤运到加拿大去了，专栏作家们在谈论着英国政府也可能撤离。

突然，希特勒从大西洋沿岸抽回了他的主力部队，跨过欧洲向东南方把它投入了巴尔干地区。希特勒后来举出的理由是：当俄国人正在他的后方随意取得领土的时候，他不能耗费入侵英国所必需的巨大力量。比萨拉比亚产谷物很丰富；它落入苏联之手一方面扰乱了希特勒的经济基地，同时也鼓舞了巴尔干的反纳粹力量。他必须首先肃清巴尔干半岛。^①

希特勒并未预料到巴尔干地区的战役是一个长期战

① 希特勒在对苏宣战时所用的辞句是：“当我们的士兵们从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起在西方击破着英法力量的同时，俄国的军事部署日益发展到威胁人的程度。……因此我从一九四〇年八月起就认为德国的利益不能再容许我们的东部各州处于无保护的情况下……这样就产生了英苏合作……在东方牵制住了这样多的力量，以致根本结束西方的战事，对于德国最高统帅部来讲已经没有把握了。”

役。在这样一个他赖以取得粮食和石油的地区中进行长久的战争，对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他有利的是靠经济渗透而控制这个地区，或者是通过一次不会破坏庄稼和工业的闪电战来占领它。他的目的是要巩固巴尔干半岛来与苏联对抗，粉碎在希腊的英希联军，然后通过土耳其和非洲同时进军以占领东地中海地区和苏伊士运河。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正在日益增加，冲突可能拖得很长，因此希特勒需要近东的石油。

里宾特罗甫后来宣称：“从那时起，苏俄的反德政策就更加明显了。”他叙述了苏联怎样牵制和阻滞了德国的巴尔干战役。苏联的行动是通过外交照会来进行的：抗议保加利亚对纳粹让步；同南斯拉夫缔结互不侵犯协定；向土耳其说明，土耳其如果拒绝德国军队通过，将获得“同情的谅解”。里宾特罗甫指责苏联人“暗中协助南斯拉夫武装起来”。那年秋天在莫斯科的记者都知道苏联人在向希腊和南斯拉夫运送粮食。即使他们输送武器，那也是他们作为中立国家的权利，并不违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苏联允诺了不参加对德国的侵略，然而帮助希特勒所侵害的人不能被认为是侵略。

与此同时，为了控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小国，进行着迅速发展的内部斗争。这些小国同苏联订有军事同盟并且对苏联提供了海军基地；然而这几国的政府却都是半法西斯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是亲纳粹的。希特勒的东进鼓舞了这些国家中的亲纳粹

集团。苏联提出“鉴于欧洲日益动乱的形势”，要求派遣更多的军队进驻这些国家。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根据条约作为盟军的红军大量部队开了进去。当地的亲德官员逃跑了。

在维尔那的一个记者说：“斯大林以比希特勒早二十四小时的先机进入了波罗的海地区。”我所遇到的立陶宛人大都同意这种说法。

我很幸运正好在从柏林到莫斯科的途中经过立陶宛。当我听到这里所发生的情况时，我就留下来并得以看到一幅从内部接管的惊人情景。过程是很合乎宪法并且是很顺利的。亲德的总统逃跑之后，副总统就当政。他任命了一个总理之后，自己就辞职了。这就使一个进步的记者尤斯塔斯·帕列兹奇斯当了政。政治犯从狱中释放出来了；工会得以自由地组织了；各种团体都活跃起来。在首都考那斯，歌唱之声昼夜不息。为了成立“人民政府”进行了新的选举。参加投票的人数达到惊人的程度。新的议会开了会，宣布立陶宛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并申请加入苏联。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欢乐的工农大众为亲纳粹专政的垮台而高兴，并且以为他们只是在表达着自己的愿望。除了在“兄弟般平等的”基础上同立陶宛军队相互邀请参加舞会和观剧之外，红军并没有干预政治。

只有一次我听人谈到莫斯科的作用。一些考那斯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都进展得太快了。他们要求慢一点举

行选举，要求组织政党和进行辩论。工农大众则毫不在乎，他们在工会中提名并进行投票。可是，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却要求更多的时间。

电报局长向一个抱怨的妇女说道：“我们不少人都认为太快了。据我了解，帕列兹奇斯想用六个月的时间把我们并入苏联，可是莫洛托夫说那就来不及了。”

听的人群倒抽了一口气。那个提出异议的妇女发言了，她说：“你是说希特勒可能搞我们吗？那还是让俄国人赶快把我们拿去罢！”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一日立陶宛申请加入苏联。我搭乘立陶宛代表团的专车一起去莫斯科，代表团沿途都受到各地代表团欢迎和献花。八月初最高苏维埃在莫斯科接纳了三个新的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帕列兹奇斯说：“我们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最容易的了。……我们是根据立陶宛人民的意志通过宪法形式做到这一点的。……从今以后，从考那斯到海参崴，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再也没有国境线了。”

那是莫斯科的政治计划的一个杰作，是由立陶宛人民的意志来完成的，而莫斯科是知道如何来鼓动立陶宛人民的意志的。

苏联现在在波罗的海边上站稳了脚跟，准备接受任何未来的考验。

* * *

德国在巴尔干的战役旷日持久。德国军队打垮了希

希腊人并把英国人从希腊南部赶下了海。他们用恫吓制服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于进行抵抗的南斯拉夫则大肆破坏。他们一直打到了土耳其边境。专家们预言德国人的下一着将会是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然而莫斯科对土耳其的压力，再加上英国的压力，起了作用。专家们预言苏伊士将要陷落，还有谣言说，希特勒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叙利亚。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向另一个方向——向着苏联边境去了。

希特勒看出来：苏联作为一个中立国家乃是他走向世界霸权的直接障碍。在互不侵犯条约存在的二十二个月里，苏联已经三次阻止了纳粹的前进。苏联进军波兰把希特勒的东进阻止了一年。苏联收复比萨拉比亚牵制了希特勒对英国的入侵。莫斯科在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强权政治把他拖住在达达尼尔海峡。

希特勒看出来：苏联的中立的孤掌，比之于波、丹、挪、荷、比、法、希、南、英等整个欧洲的武装部队加在一起，对他是更大的阻碍。因此他回转头来，用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进攻来打击苏联。

第八章 全民战争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黎明，希特勒出其不意地向苏联发动了进攻。成千的德国飞机轰炸苏联的飞机场；成千的德国坦克冲过边界，后面跟着成百万的摩托化部队。希特勒声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进军”。他并没有夸大。由于那次进攻，世界上最大的两支军队进行了对全人类最有决定意义的搏斗。

德国人是在刚刚征服了欧洲之后进攻苏联的。他们为这次进攻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工作。他们在波兰修建战略公路，占领了罗马尼亚，并且派军队到芬兰去，从而逼近了全长一千八百英里的苏联整个西部边界，其长度相当于从温哥华到布法罗的加拿大边界。在北面，他们从芬兰攻向列宁格勒和北冰洋海港摩尔曼斯克。在中部，他们从波兰攻向莫斯科。在南面，他们从罗马尼亚攻向基辅和敖德萨。希特勒声称有九百万人参加了实际战斗，另有成百万的后备军在等待着。

柏林、伦敦和华盛顿以为俄国的抵抗会在一个月的闪电战中被粉碎。但是两个星期以后，华盛顿就谨慎地承认：“俄国人进行了德国人所曾经遭遇到的最强有力的

抵抗。”过了六个星期，美国和英国开始对这场冲突重新加以估计。当时已经成为英国首相的邱吉尔在广播中赞扬俄国人的“伟大的献身”，并且提到他们的军事组织的效率。《世界电讯报》的雷蒙德·克拉珀八月二十日从伦敦发电说：“俄国创造了争取胜利的新的范例。以前……从没有为反抗希特勒而投入足够的而且是愿意承担起这一工作的人力。”

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攻击斯大林时说：德国的进攻使斯大林措手不及，他未曾进行适当的准备，甚至当德国人侵入苏联国土时，他还认为这只是“挑衅性的、无纪律的行动”，并且拒绝还击。赫鲁晓夫应该是了解事实真相的。当时德国人的确击毁了许多停在地面上的苏联飞机，正如日本人在珍珠港对美国人所做的那样。任何侵略者都占了这种便宜的。但是红军并没有把六月二十二日的进攻置诸不顾，它的防御战震惊了全世界。如果斯大林并不重视最初的边界事件的话，他有着一定的理由，而赫鲁晓夫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就是，**这场战争将不单纯取决于军事力量，而是取决于整个世界的力量组合。**

斯大林在他的战时第一次广播演说中表明了这一点。那是在德国人入侵两个星期之后。他告诉苏联人民说，敌人已经占领了相当多的土地，并且暗示敌人还会占得更多。但是他说没有理由因此而惊慌。“没有，并且也未曾有过无敌的军队。”德国由于突然袭击而获得了重大

的军事上的利益，但是它“在政治上失败了，它……暴露了自己是嗜血的侵略者”。苏联的对策必须是“**全民战争**”。军队必须“捍卫每一寸苏维埃土地”，而“在不得不实行退却的时候”必须撤走或破坏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相信“欧美各国人民”将是可靠的同盟者。“我们为保护祖国自由而进行的战争，一定会同欧美各国人民为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汇合起来”。他号召苏联人民不但要抵抗，而且要“前进，争取胜利”^①。

苏联人民为对付这一进攻，已经准备了二十多年。但是这次进攻并不是他们所最担心的那种进攻。他们所最担心的是遭到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他们担心形成一条世界的反苏统一战线。如果早两年，当张伯伦执政的时候，在波兰打起来的话，他们所担心的事是可能发生的。如果芬兰战争一直拖到英法联军开到芬兰的话，他们所担心的事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如果象一个英国外交官对我说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在希特勒为历次胜利所加强之前”，在希特勒进行巴尔干战役时，俄国就对希特勒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他们所担心的事也可能发生。

斯大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毫无疑问，他看到希特勒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二十二个月时间来搜括欧洲的财富和军火，但是这二十二个月也教育了欧洲

^① 以上引语见世界知识社出版《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五——一一页。——译者

和世界的人民，使他们认识到纳粹统治的性质。当希特勒的征服开始时，欧洲上层阶级的某些人是支持的。甚至许多老百姓也试图去适应德国的“新秩序”，希望它能够统一欧洲。但是那两年证明了纳粹并没有带来“欧洲合众国”，而是给占统治地位的“日耳曼种族”以外的一切人带来了严酷的奴役和饥饿。成百万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死在集中营里。在促成世界联合阵线的过程中，欧洲的日益成熟的仇恨是起了作用的。美国承担义务成为反希特勒斗争的兵工厂的情况也起了作用。同时，正如斯大林所预言的，对苏突然袭击这种公然的侵略行为，对于世界联合阵线的促成也起了作用。

当希特勒号召进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圣战”的口号失败时，新的世界联合阵线就显露了端倪。许多人料想教皇庇护十二世会谴责布尔什维克分子，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其他一些人以为邱吉尔这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宿敌将采取中立。但是邱吉尔却用响亮的词句宣布支持俄国人。他说：“任何对纳粹主义作战的人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俄国的危急就是我们的危急”。在第四个星期，英国同苏联缔结了同盟。在这一方面，各欧洲国家的“流亡政府”很快地都效法了英国的榜样。这些流亡政府当时在伦敦避难，它们现在第一次看到了日后回家的一线希望。

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俄国六个星期的坚持不屈改变了伦敦、华盛顿和流亡欧洲

的前景。”它也改变了“牢狱中的欧洲”的前景。它使欧洲地下抵抗运动活跃起来。到一九四一年秋天，欧洲的地下战场已居重要地位。俄国的反抗希特勒以及它同各流亡政府缔结同盟，就把欧洲一切反纳粹者——从共产党员到保皇党人——都联合到抵抗运动中来。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反苏势力在美国、英国和欧洲曾经是何等强大，回想一下当时任参议员的哈里·杜鲁门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所说的话：“如果德国人占上风，我们应该帮助俄国人，如果俄国人占上风，我们应该帮助德国人，这样来让他们尽可能多地互相残杀”^①，我们就可以看出，斯大林等到希特勒的突然袭击已经深入俄国国土时才应战，这并不是愚蠢或者疏忽。

世界的军事专家们并不赞成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所提出的关于红军缺乏准备的看法。反之，他们情不自禁地赞扬了红军。乔治·菲尔丁·埃利奥特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写道：“德国人第一次碰到了一支不是为一九一八年的战争而是为一九四一年的战争而训练好了的军队。”他指出苏联运用了“到处顽强据守的纵深防御阵地，保护大炮免遭空袭的巧妙的伪装，对付德国装甲纵队的机动反攻部队，和一支充分支持地面部队的空军”。马克斯·沃纳在八月十一日的《新共和》杂志上也写道：“这支军队在结构上是现代化的，在战术上是高效率的，

^① 见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纽约时报》。

在战略上是现实的。”

专家们特别对红军的现代装备感到惊奇。他们报道了大规模的坦克战，指出俄国人拥有强有力的坦克，这些坦克在同德国坦克正面相撞时常常把后者撞碎或者撞翻。一位纽约的编辑问我：“那些俄国的农民，过去如果给他们一辆拖拉机，他们还不知道怎样去驾驶，而会让它在田里锈掉；可是现在却熟练地操纵着成千辆坦克出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告诉他这是由于五年计划的缘故。但是，当莫斯科承认它在战争开始后的九个星期内所遭受的损失包括七千五百门大炮、四千五百架飞机和五千辆坦克时，全世界都为之大吃一惊。在承受这样巨大的损失之后仍然能够作战的一支军队，一定是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或次大的物资供应。

随着战争的发展，军事观察家们宣布：俄国人“解决了闪电战”——德国人所依靠的战术。德国的做法是：用优势的坦克和飞机突破对方的防线，紧接着由摩托化纵队在“软的”不设防的后方作扇形展开，从而使前线失去来自后方的供应。过去它用这种办法曾经很快地征服了对之一试的每一个国家。一个美国记者在柏林曾对我说：“人的肉体是抵挡不了它的。”可是俄国人用两个办法对付了它，而这两个办法都需要极高的士气。当德国的坦克突破防线后，俄国的步兵在这些坦克和它们后面的支援步兵之间重新组织起来。这就制造了一个混乱的战线，在那里德国人和俄国人都在向四面八方作战。俄国

人能够依靠当地居民的帮助。德国人所碰到的并不是“软的、不设防的后方”。他们所碰到的是组织成为游击队并同俄国正规军相互配合的集体农庄农民。

这样，希特勒所赖以取得速胜的闪电战没有能够搞垮俄国。希特勒被迫进行了德国的经济所难以支持的长期战。《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希特勒是第一次在一个新的空间作战。”作者在这里谈的是地理，但是“新的空间”不仅仅是地理。希特勒是第一次同组织起来进行全面防御战的整个人民在作战。在苏联的战术中，军队的活动是同人民的活动相结合的。当时的口号是：“前线不光是大炮轰鸣的地方。前线就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农庄。”

俄国的巨大的人力是大家所承认的。但是很少人认识到这支人力在质量上已经起了怎样大的变化。社会化的医疗、对妇孺的照顾以及青年所开展的体育运动增进了民族的健康。军队的统计显示出身高、体重和胸围的不断增长。应征入伍者的文化和军事知识水平也逐年在提高。成百万受过训练的妇女参加到防务中来。她们充塞了军队的卫生、通讯、后勤、工程等部门。平民也在体格方面为同军队合作做好准备。六百万人通过了获得劳卫制徽章的测验（它要求在竞走、跑步、游泳、跳跃、划船、滑雪等方面都能全面合格）。许多人参加了免费的跳伞和滑翔训练。甚至儿童也喜欢从文化公园的跳伞塔上跳下来。

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是非常适合防务的需要的。每一个农庄分成若干工作队，每一个工作队设有队长。它们可以充作军队的劳工大队（甚至带来自己的炊事员和炊具）。每一个农庄有它自己的夏季托儿所，由老妈妈们在受过训练的护士指导下负责管理。这个机构可以看管成批的儿童，并且利用运军队到前线后往回开的有篷货车把儿童撤退往内地。每一个农庄还有它自己的民防队。他们受过狙击的训练并且拥有武器。这等于是早已组织好的游击队。

当德国人进入乌克兰时，一场抢收谷物的竞赛开始了。农民们的首要任务是抢救谷物。教员、学生、机关干部都到农庄去帮忙。甚至部队也在战斗间歇期间参加收割工作。到九月十日，当德国人到达乌克兰的心脏时，百分之六十的谷物已经东运。那时成百万的农民也驾驶着卡车和拖拉机或者乘坐军用火车撤往东方。他们并不象欧洲的难民一样成为失业者。他们带着自己的工具，在其他种植粮食的地方获得工作。有些农民则由于自己的选择或者由于需要而留在德占区；他们成为非正规军，从背后打击德国人。

第聂伯大水坝的炸毁震惊了世界，使人们认识到俄国人是比其他国家远为认真地对待这次战争。那次的炸毁仅仅是西方新闻界马上称之为“焦土”战略中的一个当然的事件。俄国人并没有用“焦土”那样不祥的字眼。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把任何东西弄“焦”，而是在于为自己

之用而抢救这些东西，使它们不致落入敌人手中。当敌人迫近的时候，每一个工厂的工人都组织起来，拆散机器，擦上油，把它们装箱东运。工人们同他们的机器一起往东去，并且在西伯利亚或乌拉尔的指定地点把工厂重新建立起来。

当德国人占领哈尔科夫城时，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以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制造坦克来反抗希特勒而感到骄傲。这个厂的绝大多数工人都同他们的机器一起往东去了，但是在哈尔科夫留下了足够数量的工人把已经制造好的部件装配起来，并且驾驶着最后的一些坦克去同敌人作战。在哈尔科夫的生产还没有停止以前，他们的主要厂房已经在东部地区制造出坦克了。

霍华德·克·史密斯在他所写的《从柏林开出的最后列车》一书中描述了苏联的这种战略如何使德国困顿不堪的情况。德国的战争机器和德国人靠掠夺欧洲而养肥了自己；但是当希特勒进入俄国后，他们就挨饿了。史密斯写道，当德国军队到达第聂伯并且看到在被破坏的水坝的那一边还耸立着伟大的第聂伯工业的魁伟建筑物时，他们高兴极了，因为这是他们在苏联第一次看到的完整无损的工厂。但是当他们走进这些建筑物时，他们却发现每一部机器直到最后一颗铆钉和螺丝都已经运往东部去了。史密斯说，“这就是防卫战”。

一个德国飞行员被俘后在莫斯科说：“当我从空中看到这大群大群的工人时，我感到很害怕。”他自己是被用

来在奔逃的平民中间散布恐怖的。但是当他看到那些有信心劳动人民组织在自己军队的周围，为自己的土地修筑防御工事的时候，他自己倒感到恐怖了。

几年以前，当英、法的军事专家还在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战壕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红军的杂志已经预言到闪电式的战争，并且说这种战争能够很快地压服一个软弱的敌人，而使胜利者损失甚微，但是如果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国家，而闪电战没有立即奏效的话，那将将进行一场长期战，而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将是双方的经济资源、战争储备和人民士气的对比。俄国人和德国人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考验。

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富饶的乌克兰并且洗劫了基辅。他们包围了列宁格勒这个北方的堡垒。他们进逼到莫斯科三面的郊区，看到了莫斯科的塔尖。争夺大城市的战斗开始了。

现代城市本不是能够期望它们保卫自己的。在多数国家里，平民是不准备打仗的。巴黎曾宣布自己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德国人打败法国军队后，是长驱直入走进巴黎的。当华沙的英勇的市长在波兰政府和将军们蹒走后仍然继续抵抗时，全世界都感到惊奇。我们已经忘记中世纪的城市在进行防御时是何等地强有力。斯大林却没有忘记。他进行了芬兰战争，为的是使列宁格勒成为一个可以防守的堡垒。在莫斯科，在兴建住房的同时，斯大林也不声不响地修筑了世界上最坚固的城

堡。

莫斯科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城堡。围以围墙的克里姆林宫是它的中心，宫外一英里有一圈石墙，两英里以外又围以土垒。那石墙和土垒早已被两圈环行大道所代替。十条主要的马路象车轮的辐条一样从莫斯科向外伸出，这些马路被那两圈环行大道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十一条铁道象树枝般分叉出去，这些铁道也被一条环行铁道连结在一起。在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沿那些大道和马路两旁建起了为防御俄国的严冬而特别厚的混凝土的四层楼公寓大厦。为了加宽环行大道，把沿路的树木移植到房子的后院或者公园中去。爱美的人曾经为此而叹息。可是当战争到来时，莫斯科发现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能够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六列并进地调遣到市内任何地点，并且从莫斯科向任何方向驰出，而不致引起交通的阻塞，还到处受到四层楼高的混凝土公寓大厦的坚固行列的保护。现代的堡垒不能仅靠墙壁构成——马奇诺防线和曼纳海姆防线的陷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现代的堡垒必须给予它所保护的巨大兵力以机动性，而莫斯科做到了这一点。所有的军需品都是在市内制造的。动力厂所依靠的是城背后的褐煤矿层。防空所依赖的飞机场也是处于市内和城市的东郊。

苏联政府和外国使馆迁到了远处后方的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儿童随同教师撤到了象乌拉尔那样遥远的地方，在那边住了两年。凡是工作并非战争所需要的平

民，也被送往东部。莫斯科是前线，居民的口粮被减到每天一千六百卡路里热量。住家和学校都没有煤，煤要供军事工业之用。在下午四点钟开始的漫漫冬夜里，住家是不供电的，电力必须用来制造军火。人们工作十二小时后回家，在黑暗中摸索上床，和衣而睡，在最危急的几个星期中，我的一个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的女朋友索性把铺盖搬到办公室去，一次就值二十四小时的班，替换出两个男人到城外去挖工事。

斯大林留在莫斯科。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当德国的大炮在城郊吼叫而希特勒宣布莫斯科已被占领时，斯大林在红场检阅了军队。这增强了莫斯科人的信心；这告诉他们：他们同他们的最高统帅是整个国家的保卫战的中枢。在那一个冬天，莫斯科把德国人赶退六十英里，并且把他们挡住在那里。

列宁格勒的情况更加困难；它处在包围和炮火之下达两年半之久。有的时候，人们每天靠五薄片黑面包和两杯热开水过活。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制造军火和打德国人的。在列宁格勒死于饥饿的人比死于德国炮火的人还要多。他们死于缺乏蛋白质，而不是如同中世纪被围城市的居民那样死于坏血病。苏联的科学家们教他们从公园的松针取得维他命C。有名的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担任了防空哨；他的任务是把德国人扔下的燃烧弹从房顶丢开。空闲时他就写他的献给斗争和胜利的第七交响乐。从那次围困中活过来的每一个人，都得到

了上面刻有“列宁格勒保卫战”字样的纪念章。

德国人在战争的第二年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他们在北面被列宁格勒挡住了，在中部被莫斯科挡住了，但是，在南线却跨过了干燥的、开阔的平原，一直推进到北高加索的农田和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坐落在缺乏天然屏障的平原上。它由沿伏尔加河延绵三十英里的许多工厂所组成。斯大林格勒成了苏联防线在南端的支柱，正如列宁格勒是北端的支柱一样。

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夏天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拿下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将为德国人从南方包围莫斯科开辟道路，也将为通往巴库油田、伊朗、印度乃至让德国人在新疆同日本人会师开辟道路。一千架飞机和一千辆坦克日复一日地袭击这一座城市。到九月中旬，增加到两千架飞机和两千辆坦克。德国人把斯大林格勒切成了两半，切成了十几块。希特勒不止一次地宣布他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他的确占了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但是没有能征服斯大林格勒的人民。

* * *

在斯大林格勒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伏尔加河对岸没有我们立脚的地方。”他们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从一所房子到另一所房子、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地战斗着。他们用的是步枪、手榴弹、刀子乃至厨房里的椅子和开水。坦克工厂继续生产坦克，并且把它们从工厂停车场里直接开向敌人作战。德国人报道说：“没有一所建

筑物是完整无损的了。”然后人们就从地下室和地洞里同德国人作战。当时人们这样说：“只要有足够的勇气，每一堆砖头都可以成为堡垒。”斯大林打电报告诉他们说：“夺回每一个小山包都有助于赢得时间。”斯大林格勒人就这样战斗了一百八十二天。然后，远在西伯利亚组织和训练好的崭新的后备部队横过平原，用巨大的钳形攻势围住了这座城市。三十多万德国军队落在这个陷阱中。他们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投降了。

在斯大林格勒，漫长战线的整个局势扭转了。在这里，德国人征服世界的攻势为一个英雄的伏尔加城市的儿女们所挫败。

这以后，还经受了两个多严酷战争年头。但是从斯大林格勒开始，德国人不断地被迫后退了。一九四三年，他们被赶过乌克兰。一九四四年夏初，他们被赶出苏联国境。到七月底，苏联军队已经在华沙同德国军队对峙。一九四五年四月，红军打到了柏林。六月，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开始擘画战后的世界。

在苏联国内，人民开始回到德国人蹂躏过的土地上。他们看到了从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未有的彻底的破坏。打败了的德国人屠杀那些不让他们征服世界的平民来泄恨。他们用酷刑和毒气室杀死了成百万人。他们把这些人的尸体扔进灌了水的矿井，或者关在房子中烧死。他们赶走了或者屠杀了所有的牲畜。他们带走了三百万人作为奴隶。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田野上，有二千五百万人

无家可归。

当时有一个措施是必须提到的，虽然这个措施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在战争期间，有七个少数民族被整个地搬到东方去。这件事当时没有宣布。我们驻莫斯科的新闻记者听到过一些谣传。当我们去打听时，有人告诉我们说：德国和土耳其的特务想收买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以及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某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至于详细的情况则属于军事秘密。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中，全世界才得到官方的消息说：卡尔梅茨人和卡拉柴耶人在一九四三年，而契钦人、印古斯人和巴尔卡人在一九四四年初被迁往了东部。赫鲁晓夫并没有提到在一九四二年被移送的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这点上没有任何说明。但是，我们注意到，正是在一九四四年初那个时期，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宣布：今后将允许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机构；由于各加盟共和国曾经非常好地共同作战，它们应该得到这种作为国家的最后标志。显然，在战争期间对民族分布曾作了某种调整。究竟这一调整在多大程度上是带惩罚性的，在多大程度上是预防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战争为借口使人口分布得更合理，我们还不知道。

* * *

在结束这一章以前，我不能不略为提一下苏联的军队，当时我曾眼看他们扫过波兰去攻克柏林。我从后方

的城市华沙和罗兹观察着。他们是最强大的军队，把三年前曾是最强大的德国军队赶向后退。三个残酷的年头把俄国人锻炼成形了。他们和德国人不同，有着那些在前几年培养起来的“新人”的品质——广泛的个人主动性结合成一股牢固的集体力量。我不是战争的拥护者，可是我只能把苏联军队在行动时的准确、和谐比作一首伟大的交响乐。

一九四四年深秋，苏联军队进驻维斯杜拉河畔，面对着华沙。河西是广阔的、支持不住坦克的重量的沼泽地。大攻势等待着封冰季节的到来。由苏境波兰难民中招募来的波兰第一军据守着战线的中心，正对着他们残破的首都，当时德国人正有计划地把这个城市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炸毁或烧毁。一个波兰军官告诉我，他们每隔七英尺就安有一门大炮，准备用来摧毁德国人的工事，为自己部队的长驱直入打开道路。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那一天，科涅夫元帅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从波兰南部发动了进攻，突破了九道碉堡防线，两天内前进了二十五英里。到星期天，两支新的方面军向西挺进，参加了战斗。朱可夫元帅的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包括波兰第一军在内，从中央切入，在两天内拿下了一千二百个居民点。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越过纳留河流入维斯杜拉河处的冰冻的沼泽地从北面插进去。在突破敌人防线以后，那些装甲的先头部队迅速地前进。朱可夫的坦克在惊人的一天中挺进了

七十英里。铁路工程队一边前进，一边改变着东西向铁路的轨辐。这样，供应就从远离前线两千英里的乌拉尔一直运来了。那象流水般不间断的炮弹和汽油的供应，震惊了世界上的军事专家。

甚至象我这样的平民，在把军事发展标在地图上的时候，也不会看不出那些伟大的军队包围城市的完美的节奏。他们总是从最出人意料的方向攻占那些城市，而且总是指靠着彼此给予的恰如所需的援助。朱可夫从北面、南面和西面三管齐下占领了华沙，唯独没有从众所预料的东面下手。科涅夫的军队直驰过波兰的南部，绕到德国边境上的一个堡垒城市背后，从来自柏林的方向占领了它。当时甚至连犹太区的工厂都还在开工。这样，他们就拯救了八千名犹太人，也是在波兰境内所救出的最大一批犹太人，因为德国人按惯例总是在撤退前把拘禁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全都杀死的。然后，科涅夫的军队的一股折回来收复了克拉科，这一着是如此出其不意和避免了破坏，以致克拉科象是座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城市一样。朱可夫也以类似的方式从“错误的方向”完整无损地一举占领了罗兹。当我紧接着随同波兰政府迁往罗兹时，我的旅馆房间的衣橱中还留有德国军官的一些衣箱。

为俄国的进军所释放而穿过波兰退向后方的美国战俘们，在罗兹告诉我一些使他们得到深刻印象的小事。俄国人除了通常的办法外，还运用种种新方法的创造性，

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俄国人不但用通常的油车来装运汽油，而且从地下挖起油箱，把它们缚在平板车上来输送汽油。由于铁路运输需要供装甲部队之用，步兵就利用了许多马匹。那些美国人曾看到步兵坐着农民的大车，一辆车上两个人睡着而其他的人则赶着马，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往前进。当马累垮的时候，他们就到农民的院子里去换取新的马。结果是波兰所有的马都集中到西部的几个省里去了；波兰新政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马匹赶回来以便在波兰中部进行春耕。那些美国人说：“关于战争，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

交付给波兰第一军的任务显示出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政治头脑。波兰人获得了收复华沙的荣誉。他们在数量上是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的，因此朱可夫的俄国部队在二十五英里以外包抄了这个城市并且切断了德国人的交通线，而由波兰第一军进攻华沙本身。波兰人也组成了突入波麦拉尼亚和占领柯尔伯格海军基地的先头部队。波兰人还同俄国人一道打下了但泽，由波兰人攻占但泽市的中心区，在市政厅上面升起波兰的国旗。这些胜利对波兰人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德国人和波兰人曾经争夺这块海岸区达一千年之久。与此同时，在解放了的波兰新征集的波兰第二军也离开训练营地而担负起所有波兰大城市的警备任务。所有这些城市从解放之时起就交付给了波兰人。两个月以后，波兰第二军帮同强渡尼斯河，并且参加了首先进入柏林的朱可夫的部队。这是他

们的权利，战争原是从希特勒侵略他们的国土开始的。

这一个大进军把波兰西部解放得这么快而且方式这么巧妙，以致德国人还来不及进行多少破坏。华沙是一个重大的例外；在这里，时机尚不成熟而且没有同一九四四年夏天俄国人的军事行动相配合的波尔将军的起义，激起了在我所描述的这次进军开始以前就发生的对波兰首都的彻底破坏。当华沙解放时，人民开始从四面八方回家来。他们所找到的只是瓦砾堆。所有的街道都被倒塌的建筑物堵塞住了。市政厅和歌剧院已经是断墙残壁。华美的教堂、宫殿以及萧邦和哥白尼的纪念物，都只剩下些碎片和记忆。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煤气。地下室和下水道里塞满了尸体。一月十九日，也就是华沙解放后两天，贝鲁特总统在废墟中检阅了波兰的军队，宣布了重建华沙为首都的意图并且号召全波兰对此加以协助。当时已经有几千人回来住在地窖里。他们聚集在讲台周围并且发出欢呼。在那冬天的废墟中还设法找到了一束花，由一个小女孩献给了贝鲁特。

我眼见它解放波兰的那次进军在奥得河畔停了一下，在那里建立了桥头阵地，并且积累起军需品以供进攻柏林之用。这次进攻在四月十八日开始。

苏联摄影记者卡尔曼在《消息报》上写道：“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忘记奥得河上的那个黎明。在成千尊大炮的轰鸣中，整个苏维埃国家沿着二十几条路压向敌人的首都。”其他的记者记下了那些道路两旁盛开着的樱桃花和

随风招展的白桦树，记下了波兰人越过奥得河时用河水互相干杯的情况。六天以后，红军的炮兵已经以腓德烈大街为目标。卡尔曼记下了这个时刻，那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八时三十分。

所有苏联的作者都提到从德国工厂涌出的俄国籍、波兰籍和南斯拉夫籍的奴隶的数目。军队往往不得不慢慢地逐退敌人以免杀死自己人。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德国人从一家制造降落伞绸的大工厂的屋顶上进行射击。突然间一群俄国妇女从工厂冲脱出来，拥抱起刚刚来到那里的军队。

一个老大娘逢人便问：“孩子啊，哪是往奥列尔的路啊？”

战士们笑了。“老大娘，我们会把你送回去的。”他们让她搭上了一辆驶向后方的卡车。

第九章 第二次建设

在莫斯科，一九四五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使人想起那支听来总觉得有些过分伤感的歌子：“当全世界灯再点亮的时候”。事实超过了歌子。为了准备“五一”节，四月三十日取消了灯火管制。人们拥到了街头，从一个广场跑到另一个广场，欣赏着阔别四年的明亮的电灯。人们在街上通宵地走着，以此表示戒严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拉开了窗帘，不在乎在公众的视线下列进餐和穿衣服。

在“五一”游行中，人们谈到上一次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红场举行的游行，当时德国大炮在郊区轰鸣着，斯大林在红场检阅部队，给人们增强了信心。现在，红军已在柏林近郊作战，而莫斯科已经卸去了她的盔甲，穿上“五一”节的盛装——红色的旌旗、横幅和领袖们的肖像。夜间，红宝石般的巨星再度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放出光芒；辉煌的灯火再度描出了大街和莫斯科河上的桥梁的轮廓。

在柏林，五月二日下午三点钟“停火”实现了；消息在傍晚时分到达莫斯科，成为两天假期的高潮。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陷落了；从东方，从西方，苏、美、英等联

盟国家的军队淹没了德国的土地。莫斯科的上空升起了多彩的焰火，应和着的是街上的爆竹。人们就寝时疲乏而快乐，他们知道醒来时将面临一个新的时代的问题——修复破坏了的东西和建立和平的问题。

破坏是严重的。两千五百万人民流离失所，一千七百座城市和两万七千个乡村被大部或全部毁坏。大约三万八千五百英里的铁路被毁，比绕赤道一周还长得多。顿巴斯矿井百分之九十遭到破坏和水淹。巨大的第聂伯水坝以及周围的工业消失了；急流重新在河道上出现，航行已经停止。七百万匹马、一千七百万头牛、两千万只猪被屠宰或者抢走。三千多个工厂必须予以重建。

最严重的是人力的损失。牺牲的人数有各种说法，从七百万到二千万不等。如果再加上平民中的额外死亡数，那就又是二千多万。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在我的丈夫的兄弟姐妹各家中，八个男性家长中死去了三个，包括我的丈夫在内；没有一个被算在战争伤亡的数字内，因为他们都是直接死于战争的平民。苏联的损失远比同盟国合起来的损失为大，比起美国的损失来大一百倍。在南方有一些村子里，可以同年轻姑娘结婚的男人一个也没剩下，占领期留下许多没有父亲的孩子，无人管教。

胜利到来以前重建就开始了。前一章提到了拖拉机站如何向后转移，在撤退着的大炮的吼声中耕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破坏了，但是把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赶跑以后三个月内，坦克重新从它的传送带上开了出来。

第聂伯水坝和它周围的企业重建在一九四四年就开始了，当时军队还在俄国的边境作战。

当胜利到来的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毫无震动地转到了和平生产。一个新的五年计划提出在一九四九年把解放区完全恢复旧观，而在一九五〇年把这些地区的工业产量提高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这意味着在许多地方从头来过，正象十月革命后一样。不过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他们是在封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废墟上建设，现在却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这个经济基础虽然被打得残缺，还是经受住了战争。他们有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伟大的工农业基地，这些基地在战时的惊人成长的情况现在已予公开。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三年，乌拉尔的电力增长了一倍；生铁产量增长了一倍多。而且这个第二次建设从一开始就有着前次建成的经济所训练出来的熟练人员。

莫斯科急速地向战后重建猛进。出席最高苏维埃胜利大会的代表在街上出现了。在十月革命节，象往常一样庆祝了生产记录。转入和平生产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宣布了第三千辆拖拉机的出厂，作为献给节日的礼物。另外一个几乎全部平毁了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宣布了它的发电厂和最大的造船厂重新开工了。列宁格勒庆祝了它的最大的造船厂的恢复。同时，在定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举行的选举的巨大准备工作中，代表们到处向选民报告他们在战争中的功绩，告诉选民们他们做过什么使他

们有资格在一九三九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选举中再度当选。

建设战后的世界并不那么简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艾森豪威尔将军对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指导俄国外交政策的，莫过于俄国想同美国和平相处的愿望。”他的话是正确的；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在那里。我看到过庆祝胜利的人群把美国人和英国人抬起来抛到空中，这是他们表示敬意的典型方法。我所认识的所有俄国人都热烈希望，现在希特勒既然已被打倒，战时的盟国可以继续他们的友谊，维持长远的和平。

当然，他们知道——他们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一直知道——美国有一些破坏这个同盟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宁愿看到希特勒打赢的人。当俄国人成百万地牺牲的时候，有两年的时间，他们眼看盟国拖延开辟他们许诺了的西线“第二战场”。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到华盛顿同罗斯福讨论过这个问题；美国报纸的大标题说，已经“答应”在那一年的秋季实现。邱吉尔虽然拒绝作出许诺，但曾经给了莫洛托夫一件“备忘录”，其中说，“我们正为在一九四二年八月或九月登陆大陆进行准备。”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俄国人承受了战争的主要冲击，等待着。英美的登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才实现，当时俄国军队已经解放了苏联的大部分土地并正在穿越波兰。许多俄国人愤慨地怀疑盟国进行拖延的目的是在于让俄国承受损失，而他们最后在诺曼第登陆则是因为他们不甘心让

俄国人独自取得柏林。

当后来战略是在一起计议的时候，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后来又在雅尔塔会晤，来安排战争的结束和战后世界的时候，这些怀疑消失了。邱吉尔在他写的战争史中讲到，斯大林在雅尔塔几乎是天真地“为我们三大国的巩固同盟而干杯”，并且说“但愿这个同盟坚强而稳定。但愿我们尽可能坦率地相处……盟国不应该互相欺骗……在外交史上我不知道有过这样密切的三大国同盟”。

老牌帝国主义者邱吉尔评论道：“我想不到他竟如此热情洋溢。”斯大林在这些话里表达了全苏联人民的渴望。俄国人在他们胜利的时刻，真实地希望他们的长期孤立已经结束，他们的可怕的战争损失已经为他们赚取了美国和英国的友谊以及世世代代的和平。

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看到他们脸上的希望逐渐消逝。变化开始于我们在广岛掷的原子弹。恐惧回到了刚刚才看到和平的眼睛。恐惧之后是思索：为什么在日本已经求和的时候，美国要在两个日本城市杀死二十五万居民呢？华盛顿是否要垄断胜利，把俄国摒除出远东问题的解决之外呢？紧跟着的几天内，美国在东西方的两个行动使得俄国人的幻想破灭，他们说：“原子弹外交开始了。”

在东方，华盛顿不仅单独处理了同日本的停战，把俄国和中国摒除在安排之外，而且同日本的将军们商订了

附带条件，按照这些条件，日本人将继续对中共作战一直到美国耗资三亿美元的空运把蒋介石的部队送到华北去接受投降为止。在西方，华盛顿命令保加利亚在它的内阁中安插某些美国所选择的人，如果它希望得到承认的话。俄国人大为吃惊。他们说：“我们并没有告诉法国、比利时、荷兰改变它们的内阁。保加利亚是我们的范围。”

下一个打击落到了俄国人自己的建设的身上。在战争期间，他们曾被引导期望从美国得到一笔庞大的“建设贷款”来重建在共同的战争中遭受的破坏。一九四三年，作为罗斯福的特使到莫斯科去的唐纳德·纳尔逊说过，六十亿美元将是恰当的数目。其他美国代表在以后几年中证实了这种说法。俄国人把这看得很认真；他们当时是饥寒交迫。然后罗斯福死了，而杜鲁门甚至把租借法案的物资援助也停止得如此突然，以致已经装船预备运往俄国的物资在纽约港卸了货。当俄国开列了它的损失，要求给予那笔贷款的“第一批十亿美元”时，国务院“丢失”了那封信将近一年。由于没有那笔贷款，许多俄国人在那胜利年中死于饥饿。

很快地，事情已经很明显，遭受破坏的东欧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希望从华盛顿得到建设贷款，除非它们把政府改组得适合美国的口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愿意这样做的。保加利亚按照华盛顿的命令改组了它的内阁，并且当美国对选举的方式提出异议的时候，推迟了选举。所有东欧国家都希望得到美国的贷款，并且愿意作

一些调整。他们向外国资本提议租让企业；他们准备延缓社会主义，就象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代所做的那样。莫斯科对这也不反对；莫斯科一点也不急于要在自己的经济问题之外再承担东欧的经济问题。假如这些国家能够以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来换取美国贷款的话，莫斯科不准备进行干涉。

胜利后的头几年中，莫斯科比较放手地处理着东欧事务。美国人以为红军到达后会立即把这些东欧国家“苏维埃化”，把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美国记者惊异地发现，红军连米歇尔国王囚禁共产党人的事都不禁止，他们说这是罗马尼亚自己的事。一九四五年我在波兰的时候，主张农业集体化是“叛国行为”，唯恐这会疏远农民。莫斯科愿意看到邻国都是“友好国家”，但是莫斯科在一九四五——四六年的所有行动——容忍米歇尔国王的残酷的反动统治在罗马尼亚长期存在，对希腊共产党的战斗不予支持，保加利亚由于美国的抗议而取消选举，华沙的内阁接受三名来自伦敦的波兰人——都显示斯大林会在东欧作出许多让步来维持他同英美的战时友谊。

这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的逻辑发展。不顾一切地忙于建设的苏联，二十年来对国外的革命曾经越来越不关心。早先期望德国工人阶级来拯救自己的“黑暗的俄国”已经成为强国，认为它担任社会主义的榜样的角色已经够了。在外交上，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促进革命，而是避免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对它作战。当这

一点避免以后，当斯大林已同邱吉尔和罗斯福结成同盟的时候，他促成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德黑兰会议中，早先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发展成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了。在雅尔塔，斯大林更进了一步，梦想着继续保持“坦率友谊”的三大盟国可以共同维持世界和平。

对于一个久经锻炼的布尔什维克来说，世界和平可以建立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想法，真是一个奇异的梦想。但是联合国就是建立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之上的。在战后最初几年，莫斯科在东欧的政策也是建立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的。

莫斯科所作的让步对于美国来说还不够。罗斯福可能懂得这些让步，因为他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他懂得历史。但是随着杜鲁门继任总统，美帝国主义的全部狭隘性和贪婪性就在这个掌握着原子弹垄断权而毫无历史感的小城市政客身上找到了它的工具。杜鲁门忽略了，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百年来一直是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它们作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世纪前俄国同土耳其打仗的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专制暴君，他们是反苏的，但是以农民为主的人民从来没有失掉过对俄国的感情。因此当红军把德国军队赶跑时，亲纳粹的官僚们逃跑了，新的政权就建立了起来，开始同俄国人并肩作战。

华盛顿——以杜鲁门为代表——把这一事实只看成为颠覆活动。

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质的华盛顿，对所有解放了的国家中所出现的反法西斯阵线无不加以反对。在西欧，美国的压力成功地分裂了这一阵线，把共产党从他们根据所得选票有资格参加的政府中赶出来。在东欧国家中，美国的这一目的并未达到。所有这些国家，根据它们自己在战争中所得的经验，采取了共同的型式。这些国家都有过同纳粹勾结，然后随着德国军队跑掉的大地主；这就有利于早就该实行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工作的进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德国人曾控制了大工业；他们逃跑后，留下了无主的和破坏了的企业。因此大工业国有化不但是容易的，而且实际也是必需的，除非美国人愿意承租的话，而美国人并不愿意。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战争毁掉了以前的政治领袖们，使他们信誉扫地，剩下的只有一种分野——曾经同纳粹合作过的人和曾经抵抗纳粹的人。因此政府在最初是由许多小党派联合组成的，这些小党派包括每一个曾经对德国人进行斗争的人。但是美国大使馆却扶植心怀不满的从前的领袖们，并要求把这些人纳入政府。有的时候，东欧国家屈从了，希望博得美国的青睐。但是在华盛顿看来，他们从未作过足够的让步。

所有东欧国家都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并未兑现。东欧各国只能依靠被战争消耗得精疲力竭的俄国给予经济

援助。这引起了物资和价格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足够的。这就导致莫斯科在分配物资的时候加强了控制。随着华盛顿的冷战政策的深化，莫斯科在东欧的政策改变了。

这一改变的标志就是突然粗暴地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大家庭，由于它要求了仅仅在两年前还是所有东欧国家的福音的那种“民族独立”。斯大林个人同铁托的不和以及南斯拉夫叫嚷着坚持要进行莫斯科感到难以供应的更快的工业化，都起了作用。但是这一改变的基本原因并不在于南斯拉夫，而在于哈里·杜鲁门。他在不断地刺激俄国人以后，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并且宣布他要派军队到希腊和土耳其去“遏制共产主义”。越来越抱有敌意的美国对东欧实行包抄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理所当然的结果。莫斯科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企图把它熔合成一个坚强的军事集团，并且当南斯拉夫反对的时候，对它进行了诅咒。

这里没有篇幅来详细回顾华盛顿的“强硬”政策，这些政策粉碎了斯大林的——同时也是罗斯福的——关于苏美两国长远友谊的梦想。在莫洛托夫去旧金山出席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的途中，杜鲁门侮辱了他。美国唆使一届联大诬蔑苏联进行“侵略”，因为苏联军队撤离伊朗太慢，虽然美、英、法军队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并未受到责难。“柏林封锁”最初是莫斯科为了保护东德经济免受美占区发行的新币侵入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但却被华盛顿利

用来显示美国过多的飞机和物资，作长时间的示威。华盛顿作为“和平姿态”所宣布的管制原子能的“巴鲁克计划”，在每一个俄国人看来，是企图通过华盛顿控制的联合国机关来占有苏联的天然资源。

美国评论家们越来越多地抱怨俄国“在战争中夺取了大片土地”，这差不多是在火上加油。对俄国人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领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失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只收复了一部分。俄国人在第一次大战中失去了或者割让了三十三万平方英里，而在第二次大战中收复了二十五万平方英里，合计损失八万平方英里，大致相当于让给芬兰和波兰的土地。当二次大战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转变成为“美国湖”的时候，俄国人并没有抱怨，但是当这些夺取了所有的海洋并在它们的岛屿和海岸上建立基地的美国人把俄国人收回失地称之为贪婪的时候，这是引起怨恨的。

在苏联内部，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和苏联渴望与之友好的美国对它不断的欺负，引起和激发了偏激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把任何以为除了俄国以外，别的国家也曾经发明过好东西的想法斥为“世界主义”（差不多等于叛国罪）。这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是惨痛经验中产生的自卫感情，这种经验就是：他们为了共同的胜利付出了比所有盟国加在一起还要多的代价，而胜利却没有使他们能够参加建立世界和平，反倒使他们陷入一种新的敌意的包围，这种包围是由那时尚握有原子弹垄断权的美国

所建立的基地构成的，而且美国竟把任何除了美国自己的扩张以外的扩张都诬蔑为“侵略”。

在同一时期内，滋长了反犹太主义，其原因我现在还不能全面分析。这种行为从来不是官方的；把反犹太主义定为一种罪行的法律从未取消过。但是发生的事件中不但有个人的而且还有政府机关的反犹太和反犹太文化的许多行为。这些行为总是被认为非法的，因此是躲躲闪闪的。当意第绪语^①的报纸和戏院在一九四八年停办的时候，所宣布的理由是“对它的需要不多”。鉴于犹太居民曾从德国占领区撤出，并散居在西伯利亚各地，而还没有全部返回，这一“理由”至少部分是可能真实的。但是当时的过分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无疑起了作用。一九四九年，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也停刊了，它的编辑人员被逮捕。

反犹太主义的原因是很多的。当政府从希特勒侵占区撤出居民的时候，有意识地给予犹太人优先权。理由是正确的；犹太人肯定将被德国人杀死，而俄罗斯人得以幸免的机会较大。这一政策拯救了约二百万犹太人免于死难，但是却使他们同留下的俄罗斯人疏远了。这一政策还增加了所有东部地区难民中犹太人的比例；难民对当地居民来说是一种负担，因而是从来不受欢迎的。此外，以前是东部波兰的那片土地割让给苏联，增加了一批反

① 中欧各国和美国犹太人所用的一种语言。——译者

犹太主义情绪强烈的居民。政府人士则大概受了以色列的兴起以及犹太居民在以色列大使到达时表示的热烈欢迎的影响。这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显示了一种双重国籍的情况。

在学校中对犹太人的歧视究竟有多大很难说。这些歧视从来不是普遍的，但是肯定是有的。它是躲躲闪闪的，而且经常有反对它的斗争。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有一个时期感到她在大学里的工作受到阻挠，因为她拒绝向反犹太主义屈服，这种反犹太主义好象是由学校的党委书记所倡导的。有一天她回家时很高兴。她说，“我现在知道了，党并不支持反犹太主义。他们把安某某撤了职。他是代表中央委员会负责这里各大学的，他是这种反犹太主义的幕后人物。”这件事说明了当时存在的混乱情况。反犹太主义有时是由职位相当高的人推动的，但是始终是躲躲闪闪的。宣布反犹太主义为非法的法律从未遭受过攻击、责难或废除。

反对世界主义的病症终于过去了，反犹太主义也随之而过去了。这不是由于法律或者法令，而是由于三个事实。一九五〇年，苏联达到历史上最高的生产量，有了比较充裕的物资。苏联而且还有了原子弹——美国垄断的威胁消除了。还有，一九五〇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并立即同苏联结成了同盟。由冷战培育起来的病态的、过分的爱国主义，在同一个东方的平等盟国密切接触之后无法继续存在下去，这个盟国的一些发明比俄国

早一千年，它的目前的才智和成就，即使最成功的俄国人也不得不加以赞扬。

那种认为每一个民族将找到它自己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学说，在战后头几年曾经为东欧暂时宣布过，后来被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所埋葬，这次重新出现了，并且继续存在了下去。斯大林曾经希望通过同罗斯福和邱吉尔结成同盟来逃脱三十年“资本主义包围”的恶梦，这个恶梦终于因为同北京结成同盟而告终了。美国空军基地仍然威胁着苏联，但是包围圈远了，他们再也不能“遏制俄国”了。苏联的加强了的经济和在原子弹和氢弹方面的发展已经预示了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僵局，在这种僵局中贸易和经济援助成了决定性的武器。

还有一件发生在一九五〇年的事，也加快了这一发展。华盛顿把联合国拉入了朝鲜战争，全亚洲都看到这个战争是干涉新中国的一种尝试。从这个战争起始，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在亚洲，然后在欧洲。苏联人民终于不仅看到了繁荣而且也看到了和平的曙光。甚至可能是长久的和平，这个和平不是基于同华盛顿和伦敦的同盟，而是基于前殖民地和世界上新近独立的各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巨大渴望。

车轮就这样转了整整的一圈。在一九二七年从推进世界革命退缩了回来并且将自己隔绝起来，在一个孤单而受敌意包围的国土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苏联，再次开始了世界性的进军。不是为了世界革命，而是为了世界和

平；不是为了“实力地位”的和平，象帝国主义者杜勒斯那些人所经常宣称的那样，而是为了通过全世界人民经由政府和超越政府而积极施加压力来争取和平。苏联以它的“和平攻势”出了名。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说道：“克里姆林的和平攻势给西方出了难题。”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坚持“和平共处是可能的”的谈话，曾经三次震撼了股票市场。苏联也成了要求禁止原子弹的和平呼吁书的创始人；苏联，作为一个国家，通过外交途径为此进行了斗争。苏联的公民，重新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在一起，通过斯德哥尔摩和平呼吁书、五大国和平公约建议、和平保卫者宣言而为此进行努力。在这些呼吁书上，他们收集到了世界上几乎一半成年人的签名！

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这一政策不仅是由外交和宣传，而且是由苏联的增长着的经济力量加以支持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不顾美国对苏联集团强加的贸易封锁，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国际经济会议，来讨论世界范围的贸易而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在四百多名代表中唯一破坏全体一致通过的不谈意识形态问题的议事规则的，是一个来自旧金山的人，他硬说：“自由企业的制度最好。”俄国人好象只冷笑了一下；他们现在能够这样做了，因为正如霍华德·史密斯在那一年所指出：“莫斯科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到无法辨认的程度了。”

苏联代表们有条理地、顺利地达到了他们的目标。美

联社说：“全苏商会主席涅斯捷洛夫挑出了其他国家经济中的弱点，并且建议同苏联进行贸易作为解决办法。”《华尔街日报》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五日写道：“他们建议购买滞销的英国货和日本货；供应西亚和欧洲迫切需要的粗粮、木材和原料。他们愿为印度提供建筑钢材。……他们接受外币的付款。……他们建议以货易货。……所有这些都是吸引人的。”《纽约时报》在四月二十日写道：“它击中了西方最大的弱点，因为由于缺乏市场，失业已在欧洲发展起来了。”

换句话说，苏联愿意帮助资本主义世界活得稍许长久一些。这是为什么？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为了使世界不致动荡，让世界人民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之间进行选择。俄国人终于不怕等待了。

斯大林最后发表的著作是他为一九五二年十月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所写的五十页长的报告。离开前一次在一九三九年举行的代表大会已经有十三年了；苏联差一点没有全部被毁，但是已经重建起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代表大会是在具有极大信心的气氛中召开的，人们相信苏联集团能够对付和经得起将来可能带来的任何考验。”格·马林科夫代替了斯大林的主要报告人的位置；苏联人民把这件事看作斯大林在提拔马林科夫为接班人，准备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给他。

斯大林自己发表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章，论述了世界形势和它的发展前途。他说，第二次世

世界大战的经济结果是“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以及为“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所代替。苏联集团，为西方所强加的封锁所迫，已经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填补了空缺，现在有了“它自己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由于它自己拒绝同苏联进行贸易而缩小，还将更趋缩小，而这将加剧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他说道，“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它们也知道这一点。”这句话他过去曾经讲过，但是他第一次加上了这样的预言，即资本主义各国“将害怕进攻苏联，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毁灭”。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比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当麦卡锡关于冷战的极端主张仍然在华盛顿喧嚣的时候，作出这样的预言，在很多人看来是有些荒诞的。但是斯大林看到了出现军事僵局的迹象，这种军事僵局后来导致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召开。而亚洲中立集团的兴起和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已经使他预感到了当时尚未召开的万隆会议。

列宁的最后遗言为他的同志们分析了党的各个领导人的特点。斯大林的最后遗言却是分析了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

在他领导的三十年中，他的祖国已经走过这么多路程了。

第十章 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

“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只有人民是不朽的。”

这是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对苏联金属工人演说时的话。一九五三年三月初旬，斯大林去世了，而人民则留着。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要由人民来评定。

在莫斯科，妇女们围着扩音器站在雪地里，红着眼睛。美联社报道了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的感想：

“怎能想象草原没有辽阔的空间？

伏尔加没有流水？

俄罗斯没有斯大林？”

这位美联社记者是在汽车里听到消息的；泪水从汽车司机的脸上滚下来。司机说：“请原谅。他是一个好汉子……那时候他在挨近前线的一所小屋里指挥莫斯科战役。”稍后，传来消息说，东部的一个罪犯营中的囚徒们欢欣若狂，他们喊着：“老头儿”死了，自由快来了。斯大林已经把他自己揉进了俄国的全部生活；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已经成为俄国的成就和祸害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个人都迅速地按照他们的态

度分成了类别。北京的报纸镶上了黑框。法国根据国防部的命令下了半旗；当赫里欧表示向“曾经参预把我们从纳粹手中解放的领袖”致敬时，国民议会全体肃立致敬。华尔街股票市场跌落了十亿美元；两天之后才回升。哈里·杜鲁门用这样的话把自己记载在历史上：“听到一个熟人逝世的消息时，我总是感到难过的。”

美国的许多评论比较不客气。《洛杉矶时报》的虔诚的评语是：“斯大林去地狱的路条生效了……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发生争夺继承权的内战。”艾森豪威尔总统着手去实现这个残酷的愿望。在官方表示了吊唁之后——报纸标题着重指出这“只是官方的”——据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利用苏联的处境——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及其他来煽起俄国内部的纷争，并且使俄国的卫星国脱离俄国”^①。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利用了共产党世界各地静默五分钟志哀的时机“发射了猛烈的排炮”。

美国的反应是使西欧震惊的。欧洲人，不论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尊重一个伟大民族对他们的领袖的哀悼，而这位领袖曾比任何人作出更多的贡献来使欧洲取得对纳粹分子的共同胜利。同美国的态度相对照，人们回想到莫斯科是如何对待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死讯的。莫洛托夫在清晨两点钟立刻赶赴美国大使馆，他的毫不掩饰

^①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华尔街日报》。

的悲哀使美国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感到意外。连旅馆的侍者都对美国人表示了他们受了震惊的同情。大家都悼念这位具有世界理想的人，他曾同斯大林一起寻求稳定的世界和平。斯大林的死给予美国一个用礼貌来医治旧创伤的机会。但是华盛顿的态度却显露了恶意。

无论哀悼死者的人还是对哀悼者给予侮辱的人都一致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甚至《洛杉矶时报》也感到有必要连续好几天用五版的篇幅刊载有关斯大林的病情和逝世的细节。如果在一九二四年，他们连五行地位都不会给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我曾为《赫斯特国际杂志》写过一篇文章，那是美国刊登的第一篇有关斯大林的文章。我写道：“斯大林在政府中没有职位，但是假若要谁来继承列宁的话，那就是斯大林。”这是俄国共产党人对我讲的。当时这些话在美国好象石沉大海，无人注意。但是在二十九年后的今天，霍华德·史密斯从欧洲报道说：“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斯大林比任何人更多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就让这句话留作斯大林在全世界的墓志铭吧！

斯大林把俄国建成了一个强国，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他也加速了和有助于形成了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西方的“福利国家”运动。霍华德·史密斯指出：“他使西方对工人的整个态度起了变化。”因为凡是有关政府计划的想法、美

国的“新政”和英国的“福利国家”的想法，都是由于要同俄国的五年计划相竞争而产生的，为了使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至于导致革命。

就是这样，斯大林在所有国家内创造了历史，不管赞成他的也好，反对他的也好。

在后来的年代中，当苏联人民回顾他们对斯大林去世的哀悼时，他们似乎记得在他们的悲哀中掺杂了一种感觉，觉得俄国已经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而这个新时代将会有许多地方与前不同，特别是，生活将比“老头儿”时代更自由一些。不论这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觉，或者只是把他们现在的感觉反射到过去，但这一点是确实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斯大林不得不随着它而消逝。人民的生活往往是随着完成一项工作的个人的死亡而前进的。摩西看到了上帝许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但是却没有福分进去。斯大林预言了将来，但他自己却不能去领导它。斯大林肩负的历史太多了。

我想凡读过斯大林的最后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会认为斯大林的智力已经衰退。这部著作中的细节可能有可以抨击之处，但这部著作是一个清晰而全面地观察世界的人的预见。他看出了：他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已经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使一切问题起了变化，也使一切答案起了变化。

他的智力领悟到了这一点，然而他的其他部分却跟不上。人人都会轮到的老年的僵化已经降临到他的身上。虽然他眼光敏锐地瞥见了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将来，但他的本能和习惯却仍旧停留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时代，那时候，孤立和猜疑是他首要的防御武器。这些习惯已经僵化了；随着年龄和权力的增加，他变得更加多疑、更加专断、更加确信反对他的最轻微的一句话就是反革命。有人会诊断说这是妄想狂；我认为这个名字不恰当。我宁愿说：“权力是会腐蚀人的；在我们的时代里——也可能是在任何时代里——没有任何人象斯大林一样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握有这样大的权力。”该他离去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乘他的头脑依然敏锐，他的国家正在前进的时候，新时代对一个已经失去灵活性的人会给以严峻的考验，那就晚了。有一些不祥的朕兆已经出现——那件荒诞的医生案和斯大林对它的显见的轻信，似乎又回到一九三七年的疯狂时期了。

因为这些理由，苏联人民甚至在哀悼自己的领袖的时候，已经认识到他们已该超越他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 * *

斯大林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全世界所熟知的照例由莫斯科发动的“和平攻势”加紧了，以致不止一家美国报纸把这种攻势称之为“和平闪电战”。看来好象莫斯科和北京发起了一个调整它们与西方之间的分歧的全面运

动。三月二十二日，莫斯科电台几次重复广播：“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和平方法求得解决。”三月二十八日，莫斯科宣布在苏联全境实行大赦。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几乎完全按照美国的条件建议交换在朝鲜的病伤战俘。两天后，北京又建议按照同联合国所通过的印度方案相接近的条件解决整个战俘问题。在三天内报上出现了其他三个和解性的标题：“俄国人在裁军问题上让步”、“莫洛托夫保证协助朝鲜停战”以及“俄国对德国表示善意”——这是一篇关于缓和交通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的报道。这个运动以四月四日的新闻而达到了顶点：“莫斯科释放九名医生，宣布他们无罪。”

这时甚至连瞎子和聋子也知道莫斯科发生了一些事情。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任何政府承认：“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宣布的那些供词是捏造的”？《新闻周刊》宣称：“华盛顿方面觉得，俄国的和平攻势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宣布苏联有了氢弹。美国的广播节目接连疯狂地描述了俄国人将如何来毁灭我们的城市，“大概从北极过来”，而且“可能就在明天早晨”。五角大楼谈论到先发制人的战争：“我们不能让俄国储存氢弹”，“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在年内制止俄国的军备扩张”。但是俄国却沉着地把几个坦克制造厂改装成拖拉机制造厂，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且第六次削减了消费品的价格。这种稳健、镇静的态度比氢弹更

使资本主义世界恐惧，因为这是根据下面这一个事实来的：俄国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品生产已超过了意大利而与法国相接近了。^①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而使和平继续取得进展。这次会议中国参加了，而杜勒斯则曾试图加以阻挠。然而在一九五四年年终，华盛顿的主战派获得了一些胜利，这使全世界都感到忧虑。欧洲大多数人所害怕的重新武装德国的协定在美国的压力下终于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议会上通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它未来的战略将以原子武器为基础；全欧洲从这个宣言上看清了在未来任何战争中，不论哪一方获胜，欧洲将不能逃避毁灭。最后，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美国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可以对中国发动他所选择的任何类型的战争。毁灭全世界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人来自由处置，看来我们这个星球正在冲向它的最后一场战争。

莫斯科以比它过去所发动的更有效的“和平攻势”来回答。这次的第一个行动是迅速缔结了由于东西方分歧而延搁了十年之久的对奥和约。四月初，奥地利总理应邀去了莫斯科；在一个星期内他带回了一个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俄国作了这样多让步，以致所有国家，不顾华盛顿方面感到有些迷惘，都在五月十五日签了字。苏联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奥地利在东西方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

^① 见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新政治家和民族》。

奥地利人很乐于做到。同月，莫斯科又提出一个裁军建议，这次是以英法以前的方案作基础。但是由于华盛顿的拒绝，这个建议没有成功。

俄国人的工作不仅限于奥地利。布尔加宁总理和赫鲁晓夫总书记接着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们对于同南斯拉夫的不幸的破裂向铁托作了有些过分的道歉。通过这次不寻常的、但是愉快的丢面子的行动，苏联在东南欧的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地区赢得了另一个中立国家，这个国家同苏联的友谊可望增长起来。到一九五五年春末，可以清楚地看出，莫斯科正在建立一条纵贯欧洲的、能够防止东西方之间发生边境挑衅的中立地带。在德国内部增长了压力，要求通过同样的中立道路而不是通过重新武装来统一德国。

也在一九五五年的四月和五月，亚洲和非洲的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开会，一致通过了一个互助的纲领。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占人类多数的十四亿人民的代表，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来到这里的有伟大的中立国家——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会议是在它们的发起下召开的。来到这里的有封建的阿拉伯国家，有非洲丛林里的人民，有工业的日本，还有各种各样仰华盛顿之鼻息的小国，它们试图用攻击共产党来制造摩擦。来到这里的也有中国的总理、共产党人周恩来，他拒不发怒，而却说：“我不是来吵架的，我是为这里所有的人们的成功而来的。”由于他和印度尼赫鲁的政治家风

度，所有这些十分不同的人一致同意：（一）互相贸易，互相给予经济援助；（二）交换情报和学生；（三）为实现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而努力；（四）反对生产、试验或使用原子弹和氢弹。

苏联没有被邀请参加万隆会议：这个会议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事。但是苏联的主要首脑们，在访问了铁托之后，又飞到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受到极殷勤的接待。在加尔各答出来欢迎他们的群众比之出来参加甘地葬礼的还多。印度人喜欢俄国人的不拘礼节。他们喜欢看到布尔加宁在他感到他们给他戴上的花环太重时，就套了几个在主人的脖子上。他们喜欢看到赫鲁晓夫抓过一把农民的镰刀来显示他也会收割庄稼。他们尤其喜欢看到显要的外宾也戴上甘地帽和行着双手合十的印度礼节，而不用西方的握手礼。他们问道：“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西方人这样做过？”答案看来是清楚的。没有一个西方人是把印度人平等相待的，也没有一个西方人曾经出于礼貌在他们的土地上模仿过他们的礼节。俄国人似乎是很自然地这样做了。

这次旅行的结果是缔结了贸易协定和由尼赫鲁和俄国人签署的联合声明。声明里说中国必须取得它在联合国里的“合法席位”和“对台湾的权利”。原子弹和氢弹必须“无条件禁止”；通向和平的道路“不是在于军事同盟而是在于经济和文化交流”。在万隆会议宣言之后，又签署了这一项声明，人类的三分之二已经明文接受了这些见

解。

苏联为这些政策所作的努力曾如此有效，以致那年春天英国大选中的主要问题成为：“艾登是否作了充分努力使我们避免热核战争？”为了帮助艾登在选举中获胜，同时也由于艾森豪威尔收到了潮涌一般的人民来信，美国终于同意举行华盛顿拒绝了十年之久的四国首脑会谈。这次会谈定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在日内瓦举行。

在此期间，联合国在六月底在旧金山举行了十周年纪念会。按照原来的计划，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周年纪念，然而，由于三方面的压力，它却成了一次世界和平的集会。世界人民要在原子时代生存下去的要求集中在联合国身上。比联合国有着更多会员国人数的万隆会议仍然想通过联合国的途径来追求它的目标。最后，苏联派出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一个八十人的代表团。莫斯科这样重视这次纪念会，使华盛顿也认真起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两人都去了；所有这些领导人物的出席导致了对日内瓦会议计划的商谈。

过去一直主张四大国会议是同联合国无关的新闻界，忽然注意到全世界的希望和祈祷都通过联合国的演说聚集在即将召开的首脑会议的周围。华盛顿避开联合国的倾向就这样被挡了回来；日内瓦会议的技术准备交给了联合国来办理。联合国的威信空前高涨，但这并不是由于它自己的成就，而是由于莫洛托夫和万隆会议参加国所带来的全世界的希望。

大国首脑终于在七月下旬在日内瓦会面了，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艾森豪威尔和布尔加宁的友好会谈激起了全世界的希望。《日内瓦日报》欢呼道：“冷战被埋葬了。”德尔·伐育在《民族》杂志上表示同样的意见，他说：“这是对冷战的一个致命打击。”

杜勒斯向一位记者恬不知耻地总结道：“我们没有放弃多少东西。”布尔加宁从历史的角度向最高苏维埃会议总结报告说：“它和缓了国际紧张局势……标志着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事实出发总结道：“日内瓦会议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它从来也没有打算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只同意了试图取得一致意见。但无论如何，它也许标志着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所有这些总结都是对的。双方都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但是双方多年来第一次用客客气气的措词来讨论政治。双方都公开承认不能通过热核战争来实现它们的政策，因为这会毁灭双方的国家。这样，双方都答应用其他的方式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冷战就这样垮台了。它原来是建立在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的基础上的；它是从原子弹落在广岛的时候开始的。但是十年之后，由于苏联在经济力量和原子弹、氢弹方面的发展，由于一个同苏联结盟的新中国的兴起，以及由于亚洲中立集团的兴起，冷战终于被迫结束了。首脑会议承认了原子僵局，它就解除了冷战的武器。

莫斯科用行动宣布了它对冷战已经结束的信念。它把波卡拉海军基地归还了芬兰，说明这已经不再需要了；它一下子裁减了六十四万军队，到一九五六年初又裁减了一百二十万。华盛顿没有作出同样的表示，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巨大的军事计划却从内部萎缩了。人们到处开始承认，不是军事竞争，而是经济竞赛，已经成为今天新的议事日程。

* * *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历史的新时期进行了估计。赫鲁晓夫的主要报告列举了苏联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工业产量在五年中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为一九二八年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的二十倍。农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通过号召爱国者开垦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的处女地，已经弥补了农业生产的不足。这种号召志愿人员开发共同富源的办法是从列宁的时候传下来的，现在仍然有效。

记者们注意到，根据赫鲁晓夫讲话的口气，似乎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公认的“历史规律”了。苏联的领袖们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处于消亡的过程中。他们关心的是怎样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使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以及同世界各国发展能增强和平的广泛联系。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中包括提高实际工资百分之三十，缩短工作时间到每天七小时或者每星期四十小时，不仅在小学实行免费教育，而且在中学和大学也

实行免费教育。政府的权力将要分散一些。在阿塞拜疆，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大石油工业归阿塞拜疆人所有，而不归中央政府所有。最重要的是限制政治警察的权力和逐步扩大公民权利。

最具有世界意义的是对新的世界形势的估计。报告里说，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包括人类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体系。通过社会主义体系和中立集团之间的友谊，可以建立一个包括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其力量足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地区”。因此战争被宣布为“不再是不可避免”。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被否定，但是补充了这样的说法：非资本主义世界如果能够明智地和灵活地运用它的力量，现在就可以强大到足以防止战争。

另外，还提到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可以不一定走俄国所走过的道路。每个国家会找到它自己的道路，有些国家也许还可以通过议会的方式。社会主义靠工人的武装起义而取得的原理并没有被否定，而是过时了。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存在，使新的方式成为可能。这一原理仅仅说明了已经发生的事。所有的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走俄国的道路。在东欧，社会主义是通过联合政府而产生的。在中国，共产党曾同蒋介石联合过；在蒋介石破坏了这个联合，向共产党发动内战以后，共产党又同反蒋的力量——甚至包括“民族资本

家”——联合，从而取得了胜利。

（承认了这些变化，随着也就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时代已经过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斯大林主义，乃是过去一个时期的战略，现在需要新的战略和方法的时候已经到来。）同时，大会对过去的时代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大会的许多发言者参加了这个工作。

这种批判大部分是有节制的和有益的。过去的外交政策被认为太死板，是孤立主义的。同南斯拉夫破裂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中立国家的作用没有正确的估计。有些发言者批评了对战争的指挥。最尖锐的批评是关于政治警察的专断权力，它曾把成千的无辜的人定罪并且践踏了“苏维埃民主权利”。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被归之于“个人崇拜”，即对斯大林的神化，这使个人决定问题的做法（特别是在斯大林的晚年）得以任意发展。

以上的批评，即令出人意外，还并不骇人听闻。但在大会结束的时候，赫鲁晓夫专门向代表们做了一个秘密报告。这一报告没有向报界发表；赫鲁晓夫本人说这个报告是不得向报界发表的。这个报告显然是一种感情的爆发，也许是由于最近批阅了前三年中重新审查的成千件冤案而引起的。几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据称是、而且大概确实是这个秘密报告的一部分。苏联政府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正式承认。根据这点，人们认为这里面有着太多的事实以致难以否认，但由于这报告还不是全面的，所以不能作为正式讲话来发表。

我在本书中采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来列述一些重大的弊病，并且在有关的地方讨论了报告的若干部分。我没有把它作为最权威的材料来用，因为这里面的证据还不完全，而且也不是结合条件和时间而加以充分估计的。我们甚至不清楚，赫鲁晓夫用暗示的方法归咎于斯大林的那些过火行为，斯大林是否全都知悉。也必须考虑到，国务院是为了诋毁苏联而发表这个报告的，而这个文件也已经很广泛地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我不能把它作为苏联的最后的意见来看待，因为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都没有这样来发表这个报告。

今天没有人能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断。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价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离现在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清楚。我们至少知道，他从一九二八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他进行工作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他是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曾经五次被放逐，并且一定多次被人出卖过。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

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这些暴行看来还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猜疑的倾向和中央委员会不加审视地批准斯大林所说的一切的倾向。尽管有着这些侵害个人的罪行,仍然不乏证据说明:斯大林所说的“人”是任何国家中最宝贵的因素的话并不是虚伪的。他终身从事于审慎地消除妨碍工人、农民和工程师们实现他们的理想的障碍,如果没有他的远见,他们会继续陷于失望中和没没无闻;但是,由于他的了解,他们成为了农业、工业和航空方面的领导人。

随着战争的拖长,随着他的年龄和权力的增长,同时也随着争取世界前途的斗争的担子的加重,据说斯大林变得更加专断了,只相信他自己一人。然而,现在被斥为过去一切坏事的根源的“个人崇拜”,不但是被崇拜者身上的缺点,也是崇拜者身上的缺点。当把所有能对斯大林提出的批评都加起来以后,我仍然很怀疑:任何小于斯大林从一九二八年起驾驭俄国所用的巨大鞭策力量是否有可能把俄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顾过去,人们可以看到其他的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是怎样会把俄国引向毁灭的。我认为他们这些人既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对于人民的需要的洞察力,也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必要的魄力和意志。

在早期,俄国国内外许多最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说,这件事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些俄国人在三十年代

初期对我说：“对于世界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要建设在我们这个黑暗的国家里，是很大的不幸。如果由你们美国人，或者甚至由勤劳的德国人来建设它，那也许是一件合适的工作。但是我们，愚昧的人，我们能建设什么社会主义呢？”

斯大林说：“建设吧，不然就要在十年内被外国侵略者搞垮。”

他们建设了，而且在外国侵略临头的时候经受住了考验。这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但是那些怀疑者的话也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这样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绝不是人们所梦想的社会主义——给一切人自由和富裕生活的社会主义；它沾有许多的缺点。对这些缺点的产生，斯大林的个性起了多大作用，俄国的黑暗的过去起了多大作用，纳粹的第五纵队和四十年的战争威胁又起了多大作用，这是未来的历史学家的课题，而且大家分摊过错的方法将是各各不同的。

有一点他们是不会不同意的。就任何个人能自称对他领导下的事态发展起了决定作用而言，列宁创造了俄国革命，斯大林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缺点可以在现在加以纠正。

* * *

严重的问题不在于纠正苏联本身的缺点；一个被动员起来的人民和有相当智力和忠诚的政府工作者是能够完成这一工作的。宪法的形式存在着；物质力量和意志

也具备着。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在东欧苏联集团中所遗留下来的错误。当近来报纸上的标题大叫“波兰发生叛乱”、“匈牙利发生内战”的时候，我们西方的专家们幸灾乐祸地以为“莫斯科权力的末日到来了”。华沙和布达佩斯的政府回答道，它们同苏联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它们要求的仅仅是“主权”和“平等”。这些字眼是什么意思呢？它们已经等待得太久了——时间已经迟了。

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什么“主权”呢？一个像波兰那样大小的国家同占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的二亿人民发生双边争执的时候，有什么“平等”可言呢？必须给这些字眼下个定义。在历史上它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被下过定义；但是在新的条件下，它们总是必须重下定义。现在它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给下定义。除非这样做了，而且很快地这样做，否则一切关于“友谊”的表白都是空话。国与国之间的友谊起着变化；同盟者可以疏远。看一看过去十年，谁能够对此有所怀疑呢？

这是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就等待着人们去完成的任务，特别是从一九五〇年以来，而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以来更成为迫不及待了。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一任务；他的思想陷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旧轨道里，不能从人类的三分之一已经社会主义化这个角度来进行创造了。赫鲁晓夫没有解决这一任务；在目前他把事情搞得更糟。他对铁托的道歉、他对斯大林的攻击，鼓励了东欧的一切离心倾向。这种倾向是强烈的，但是社会主义各

国团结的倾向也是强烈的。在差异中求团结的方式还有待研究解决。

让我举一件旧事来作例子吧。十年前，我在莫斯科遇见一个捷克人；他是来同苏联订立一项经济协定的。我问他：美国人说莫斯科在剥削东欧国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他回答道：“当我们同苏联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做生意的时候，他们讨他们的价，我们讨我们的价。他们是顽强的生意人。但如果他们压得太凶的话，哥特瓦尔德就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政治解决’，说那样的条件将使我们破产。……于是斯大林就给我们帮助。”

斯大林个人对哥特瓦尔德的让步并不能代替经济计划！在苏联，国营铁道和煤矿对煤价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下列这些机构来解决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苏维埃、共产党。对苏联集团来说，存在着什么计划委员会；什么最高苏维埃；在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之后，存在着什么共产国际呢？在“主权”的波兰和“平等”的苏联之间，光有双边条约就够了吗？华沙条约有必要的权力机构吗？

由谁来设计意识形态基础和实际的形式，以调和波兰人对自由的需要和他们对于同强大的、能给予帮助的社会主义集团团结的同等需要呢？由一个男人来做，由一个女人来做，还是由一个委员会来做？由一个俄国人，一个波兰人，还是一个捷克人来做呢？我想不会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俄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内已经有巨大的任务要继续完成，这个任务的根源深处在“斯大林时代”里。可

能要由一个中国人来做这件事——迄今为止，刘少奇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论上做了最出色的工作。可能是意大利人陶里亚蒂，他在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在适应新时代的新条件的新结构和新政治形式的问题上，提出了也许是最新颖的和最有创造性的想法。但是我想也可能是一个捷克人，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经历过欧洲角斗场中所有大国的多次进攻，而同时既维护了对自由的热爱，又保存了合作的精神。

无论谁设计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形式，无论他是俄国人、中国人或捷克人，他在历史上就将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新时代的工程师。不仅如此，他还将不仅奠定社会主义在差异中求团结的结构，而且也奠定某一天必定会出现的世界政府的基础。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